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1月30日第30期 总第17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76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七）

目 录

【专 稿】

胡鹏池 但 燊 蒋南峰

夏雨遍地流 ——评秦晖的《血腥之夏》 2-63

引言：郑重建议

一、秦文关于“清华727事件”的混乱与错误

二、秦文关于“清华—北航黑会”的混乱与错误

结语：著书立说者应该有怎样的坚持？

【评 论】

陆伟国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理论分析 64-71

【述 往】

吴 琼 难忘的燕园·1969年（二） 72-82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四） 83-91

——红卫兵运动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 92-110

——“五七干校”（上）

王复兴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11-126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五）

【本刊声明】

【专稿】

夏雨遍地流 ——评秦晖的《血腥之夏》

胡鹏池 但燊 蒋南峰



作者简介：胡鹏池：1945年生，江苏人，清华大学精仪系1968年毕业于。当过工人、技术员、工程师、车间主任、大专教师、政府官员、企业经理。2012年开始从事历史研究及文学创作，在《经济观察报》、《炎黄春秋》、《记忆》、《共识网》上发表文章百余篇。2013年出席首师大举办的《创伤记忆与文化表征》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创伤记忆的文学表达》。2015年出席中山大学举办的《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周有光的话是用来想的》，发表论文《“常识的社会功能”浅论》。著有《通俗政治》天地图书，2015；《芦花瑟瑟》海天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但燊，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1981年清华大学工学硕士。曾任无线电厂技术员，电力科学研究院计算所工程师、副所长，某大型中外合资企业高级工程师。



作者简介：1942 年在父母逃难途中，出生于江西南丰县。1960 年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六年制）学习。1966 年毕业前夕遇上文化大革命，成为 414 派核心成员之一，后留校任教，经历了清华大学文革全过程。1984 年去深圳大学工作。1993 年离开深大转往民企，退休后一直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本文目录：引言：郑重建议

第一部分：秦文关于“清华 727 事件”的混乱与错误

01：秦文“开场白”的笔法

02：从“再三联系无果”到“工人伤亡”的因果关系

03：“校园被占领”的真相，蒯大富“撤出清华”的原因

04：“杨余傅黑后台”与“黑手”之间的区别

05：几十年来，蒯大富就靠这几段话混日子

06：吴德回忆与“728 召见”插话，相互呼应、互为佐证

07：蒯大富究竟是什么时间回到清华园？

08：又一错误的因果关系

09：727 上午与中午，团派武装对工宣队的三次抵抗

10：冲突升级与蒯大富离校有没有关系？

11：9003 大楼的团派武装抵抗到什么时候？

12：蒯大富从未说过“他没有收到过任何通知”

13：727 晚 11 点，一个尴尬的时间点

14：毛“保密指示”一共就 54 个字，不要添油加醋！

15：关于“路线”问题，秦文的一处大硬伤！

16：对“造反派，真的反了”的过度解读

第二部分：秦文关于“清华—北航黑会”的混乱与错误

一、有没有“清华会”？

- （一）秦晖兜来兜去，始终没有兜清楚
- （二）钱文俊网文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
- （三）秦晖往前再走一步，就看见真相了

二、“清华—北航黑会”开了几天？

- （一）秦文似是而非，“对了”以后又搞乱
- （二）“阿陀访撰”中的叙述已经相当清楚
- （三）我们对“会期”的修正

三、“清华—北航黑会”的起因

- （一）秦文关于朱仁的研究是本末倒置
- （二）我们从武传斌与朱仁的相识，说清会议的起因

四、“清华—北航黑会”与全国形势背道而驰

- （一）从会议起因看
- （二）从会议气氛看
- （三）从会议焦点看

五、韩爱晶与“黑会”的关系并非如他所言

- （一）韩爱晶是怎样说的？
- （二）武传斌是怎样说的？

六、蒯大富与“清华—北航黑会”的真实关系

- （一）五点理由，蒯大富“泼冷水”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
- （二）反复唠叨，秦文竭力淡化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
- （三）蒯大富与《黑会》关系的探究

结语：著书立说者应该有怎样的坚持？

引言 郑重建议

秦晖先生的大作《血腥之夏：从“七·三”到“七·二七”——广西与北京造反派的覆灭》（以下简称“秦文”）发表于《记忆》第162期（2016年7月31日）。该文曾于今年6月下旬在某微信群中发表并讨论过，胡鹏池与蒋南峰都参加了讨论，并都曾对该文发表过批评意见。当时，胡鹏池更是发表了一则“郑重建议”如下：

经过再次详细阅读秦教授的这篇文章，考虑到秦教授是国内外知名学者，也是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我们清华学人的骄傲，他的文章的影响力非我等所比，所以，我们要有一份更多的责任心。为此，我郑重提出建议：

秦教授的这篇文章应当撤回重写，或者暂时放弃，等到功课做得更充分、条件更成熟时再写。

其它理由我就不说了。

此帖事关重大，我贴两遍。

胡鹏池 2016-6-26 21时40分

当时因为发现秦文的“混乱与错误”实在太多了，“数量与程度”上也有点说不过去，胡鹏池出于爱护秦先生学术声誉的考虑，试图拖延或阻止该文的发表，并希望秦先生继续“做功课”。当时我们以为这只是一篇在微信群里征求意见的“底稿”，现经“记忆”发表，这才明白原来这已是秦先生提交德国科隆大学于2016年4月22日—24日举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一篇学术论文，并在4月24日的会议上作了演讲。也就是说该文已是“定稿”，且早在今年4月份已在国外公开发表并演讲了；“记忆”的发表表明该文也在国内发表了。

我们无从知晓“科隆本”与“记忆本”有什么差别，但注意到“记忆本”与“微信本”是有差别的，但差别不大。

“记忆本”的《血腥之夏》约37000多字，分11节，全文以“清华727事件”为主线展开铺陈。其内容主要由三个板块组成：①清华727事件；②清华—北航黑会；③其它：广西文革与上海文革等，总的写作风格是“以史带论”。其中“清华727事件”与“清华—北航黑会”两部分的文字占全文五成以上。

我们对于第三板块，即涉及“广西文革与上海文革”的内容不准备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们原来就不甚了解，也没有作过系统研究，不能只凭一知半解进行评论。这是我们对“未知领域”持有的谨慎、敬畏的态度。

本文三作者都是当年在清华的学生，但、蒋二位更是“清华727事件”的亲历者，我们对“清华727事件”与“清华—北航黑会”作过一些研究。面对国内外媒体与广大读者，针对秦文在这两部分内容中的“混乱与错误”进行“指谬”，“指谬”的同时阐述秦文中所涉及到的有关“清华727事件”与“清华文革”的一些历史事实，发表看法，就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第一部分：秦文关于“清华727事件”的混乱与错误

01：秦文“开场白”的笔法

【引文】1968年7月27日，三万名工人、解放军在中南海御林军8341部队军官带领下，以人海之势闯入清华，当时正在“武斗”的清华“井冈山”与“四一四”两大派都不知怎么回事，在校内处于优势的“井冈山”派头头蒯大富多方与北京及中央文革当局联系了解缘由，但所有电话都不通。在再三联系无果后，蒯认为自己已被封锁，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镇压”，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伤亡。……建立了后来史家所称的“后文革秩序”。（《记忆》第162期第28页。以

下凡出自该期的引文只标页次。)

通观全文，这段文字既为全篇“开场白”，也为全篇“定调子”。

“开场白”的写法形形色色，或开门见山，或故设悬念，或平淡开篇，皆因人而宜，因文而宜。无论是怎样的写法，一般都认为处于如此重要位置及重要地位的文字需具有史实的可靠性、语言的准确性以及表达的简洁性。

然而秦文的这段“开场白”除前面几句“起承”外，从“在校内处于优势的——”后的几乎每一句话都没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据，表达上是不正确的。

我们认为秦文既是一篇系统阐述“清华 727 事件”的长篇学术论文，应该做到“论从史出”，应以一件或几件相对权威、鲜有质疑的历史文献作为论文的坚实基础。现有两份“历史文献”可以充当此任：

(一) 校史记载

蒯大富 12 时后回校在静斋召集团派总部头头开会，指责这一行动是“杨余傅黑后台背着中央搞的阴谋”，“是来支持老四（414）压团派的”。会议决定：① 紧急请示中央，问清情况；② 坚守已有据点，不让工人进楼，如果工人硬攻，就抵抗还击。团派通过电话、广播以命令方式，将第二条决定向武斗据点下达。¹

(二) 法律文书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蒯大富的《刑事终审判决书》：

1968 年 7 月 27 日上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同“总部”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作出“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的决定，并传达给各武斗据点。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拚了”，并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发给武斗人员。任传仲等按照“抵抗、还击”的决定，

¹ 《清华大学一百年》第 292 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带领武斗人员手持枪支、长矛和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袭击，致使宣传队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731人受伤。¹

秦文“开场白”完全置上述两份历史文献于不顾，使用一连串似是而非、带明显倾向性、情绪性的叙述，不惜歪曲历史事实，从而一开始就将文章导向了大量“混乱与错误”的不归之路。

02：从“再三联系无果”到“工人伤亡”的因果关系

用不经意的笔法，不断地制造一些既不明确也不成立的“因果关系”，这是秦文的一个特色。

“开场白”中“在再三联系无果后，……造成了工人的伤亡”就是这种特色“因果关系”的第一例。

实际情况是：

① 在蒯大富于中午12点多回到静斋前，11点半钟时北京卫戍区军代表刘丰曾主动给团派总部打电话，要他们“大力支持宣传队，并积极与宣传队合作”²这是市委、市革委、北京卫戍区的主动联系，这个联系始终是存在的。蒯大富后来的所谓“联系无果”并不能说明刘丰的电话联系不存在。

②从蒯大富于中午12点多回到静斋后，到1点左右召开的临时总部会上作出“紧急请示中央，弄清情况”的同时就已经作出“抵抗还击”的决定了。会议前后只有很短的时间（半小时至1小时左右），所谓的“再三联系无果”，实属夸大其词。

③“再三联系无果”并不是特殊的非正常现象。即使是在蒯大富处于得势的“巅峰”时期，蒯大富与中央高层也并没有建立“热线联系”。按照蒯大富自己的说法，在整个文

¹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判决书（83）刑终字第42号1983年6月25日。

² 《清华大学一百年》第292页、《清华蒯大富》第342页均有记载。许爱晶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革期间，蒯大富与江青只有过一次电话联系，那是在1967年1月6日“智擒王光美”事件发生当天，而且还是江青受周恩来委托主动给蒯大富打的电话。¹而蒯大富主动打通江青的电话，一次也没有。所以，蒯大富打不通周恩来、江青等的电话是正常现象。

与市委的电话是打通了的，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声称她不知道“工宣队进校”这件事，这也不能算是多么不正常的情况。

④在刘丰打电话后到蒯回到静斋前，这短短的半个多小时内，团派广播台已经将工宣队定性为“杨余傅黑后台操纵的”了。

这个调子究竟是谁定的？这成为至今未能揭开的历史之谜。蒯在各种访谈、文章中、及与韩爱晶合撰的《清华蒯大富》一书中，话里话外都一再表示这个调子不是他定的。但是第一、他始终没有说明是谁定的？第二、他始终没有表示过反对的态度，甚至始终没有表示过任何一点点不满的态度；第三、他在727的全部言行都是与这个调子高度一致的。

⑤“黑手”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蒯大富与团派广播台一般都不简单地用“黑手”两个字，而用“杨余傅的黑后台”。两者是有差别的。

⑥至于“甚至怀疑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政变”一事，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任何文献资料或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录。虽然在一些团派校友的回忆中出现过，但那是在28日凌晨蒯已作出“撤离清华”决定后，在下达通知时口头陈述的内容。²不能用于上午或中午说事。

¹ 《清华蒯大富》186页对此事有记载；《岁月流沙》中也有记载：周总理的电话刚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我说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² 据守旧水的马同学回忆说：（727）深夜，蒯大富通知：北京可能发生政变了，毛主席可能被软禁了，要求所有同学立即撤出学校。马同学后来补充道：“这是当天晚上总部派人来传达的。”据守9号楼的张同学支持了马同学这则回忆，他说：“有此事。所谓‘深夜’，应该是在晚12点前后，总部以某种方式（可能是各分部的人去总部，然后回来传达）传达了这种意思（还有：避免被他们全部消灭掉）。

03：“校园被占领”的真相，蒯大富“撤出清华”的原因

【引文】“校园被占领后，蒯大富等人狼狈逃出……”（第28页）

（一）“校园被占领”的真相

“撤离清华”是在28日凌晨1点左右在明斋召开的有30多人参加的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各据点接到通知后开始撤离是在凌晨2点半左右；有一些重要据点如化学馆、生物馆、明斋、9003大楼等并没有放弃；一些重要的骨干人员如任传仲、周大卫、邢晓光¹等也没有撤离。蒯大富一行是在凌晨3点左右才撤离清华的，他也没有带领大部队或任何一支小分队一起行动；他们一部车载有5个人单独行动，没有任何其它人员与车辆跟随。²

蒯大富作出“撤离”决定时，团派武装已经收复了曾被工宣队一度占领的几乎所有据点，控制了清华西区、大礼堂区、东区宿舍区，并于27日晚10点半左右又武装攻克、重新占领了曾被工宣队占领的9003大楼。当时团派所控制的区域约占全校面积三分之二左右。

工宣队控制的是二校门前小桥以南的照澜院附近区域，另有原四派占据的二校门东沿动农馆、焊接馆、铸工车间至主楼的一长条区域，四派称为“主楼根据地”。从727上午10点工宣队与四派达成停止武斗的“四项协议”后，四派“主楼根据地”随即也成为工宣队的大后方。“照澜院区域”与“主楼根据地”加起来仅占全校面积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秦文关于“校园被占领”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

¹ 任传仲：团派总部核心组成员、文攻武卫指挥部副总指挥，作战部长。由于总指挥鲍长康在下午1点半至2点时乔装解放军在前往大礼堂区的路上被工宣队识破而被抓走，所以任传仲成为727抵抗还击工宣队事实上的总指挥。

周大卫：机械系0字班学生；邢晓光：无线电系0字班学生，二人均为团派“文攻武卫指挥部”东区负责人。

² 同行5人是蒯大富、陈育延（女，总部委员）、段永基（蒯大富秘书）、张树友（总部第三动态组组长）与司机。令人不解的是在蒯的回忆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张树有的名字。

（二）蒯大富“撤离清华”的原因

蒯大富作出“撤离清华”的决定并不是工宣队的要求，双方达成的协议中根本没有这一条。那么，蒯大富为什么要“撤离”呢？其真实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① 出于恐惧的心理

由于团派武装在727全天“打死5个人、打伤731多人（包括重伤149人）”（当时对打伤人数不可能有这样的精确统计），在此情况下蒯大富心生恐惧，担心工宣队会采取报复行动。

事实上，那天晚上有一辆一辆的军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开进清华园，解放军战士头戴钢盔，手握钢枪，就像雷锋标准照中那样横跨冲锋枪的姿势。军车在清华园内进行了一番示威性的巡游，¹后来又开走了。毫无疑问，这对蒯大富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震慑，增加了他的恐惧感。

② 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

用蒯大富自己的话说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清华蒯大富》第P346页记载了蒯在明斋讲话的一小部分内容。他说：“我们打死了工人，打伤的工人特别多，北京大医院已经住不下了。我们今天已经闯了大祸，若不死人，还好办，打死人，就不好向中央交待了。现在，工人对我们恨极了，要和我们拼命，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留在校内继续和工人打，要么就是退出清华，别无出路。……现在只能把武器藏起来，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唯一的活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③ 企图用“空城”证明工宣队的失败

工宣队是来制止武斗和促进两派联合的，蒯大富企图用“空城”证明工宣队的失败。

④ 出于“伪装弱者，以搏同情”的计谋。

《清华蒯大富》一书隐瞒了蒯大富在会上讲的另外一些话，其中有：“我们跑出去，

¹ 根据沈如槐《清华大学文革纪事》第416页的记载，以及蒋南峰对此的亲眼所见所综合。

我们就是弱者，这样，在中央面前，我们就好说话。”¹

蒯大富企图用“伪装弱者”的办法在毛泽东及中央高层面前，在全国人民面前摆出一副无辜遭受镇压的受害者的样子来，以搏取同情。

他在凌晨给毛泽东及中央拍的电报中就是这样说的：“我井冈山战士数百人遭毒打，伤亡数十人，许多人被捕未放。为避免跟工人阶级再发生冲突，我井冈山战士已全部撤出清华，衣食无着，生命安全无保证。清华井冈山生命垂危，形势万分危急。向中央呼救！向毛主席呼救！”

几小时后，蒯大富在毛泽东面前的诉说再次体现了他的这一计谋：“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²

用伪装弱者，以搏同情，在被动中争取主动，这才是蒯大富作出“撤离”决定的主要动机。

04：“杨余傅黑后台”与“黑手”的差别

【引文】蒯大富见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后放声哭诉“黑手”的行为，不料毛声称“黑手”就是自己，并严厉训斥了蒯大富等人。（第28页）

实际情况是：在728召见现场“蒯大富走进来，号啕大哭。——他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毛主席转过身，把手伸出来：‘你要抓黑手，黑手

¹ 唐少杰《清华七二七事件》。

² 【注10】韩爱晶《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

就是我。工人是我派去的。’ ”¹

在《岁月流沙》²中蒯的陈述更夸张、更肯定。他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

由此可见，蒯大富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仍然咬定是“杨余傅黑后台”。

对于我们这些当年清华文革的亲历者，很多人都很清楚蒯大富所说的“杨余傅黑后台”就是指周恩来。

从1966年8月初周恩来亲自到清华开大会为蒯大富平反，到1967年5月底周恩来用一张“纸条子”使得蒯大富成立一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梦想破灭到永远，在短短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蒯大富对周恩来的感情与态度有一个从感激 → 不满 → 怨恨 → 反对的复杂演变过程。其原因固然与蒯大富自身的文革经历，以及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有关，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了江青的影响。

在整个文革期间，真正有“篡党夺权”野心的无疑首推江青，而江青始终将周恩来视作夺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江青的“反周”之心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蒯大富作为江青与中央文革的“鹰犬”（蒯自称是“马前卒”），始终死心塌地站在江青一边。可以说蒯大富就是江青的“包衣奴才”，蒯大富的“反周”之心和他的主子江青同样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毛泽东当然听得明白蒯所说的“杨余傅黑后台”是指谁，但这不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战略部署，所以故意没有正面回答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问题，而转化为“黑手就是我”。

05：几十年来，蒯大富就靠这几段话“混日子”

¹ 同（注10）

² 米鹤都、张琦采写《蒯大富口述 岁月流沙》。

【引文】几十年过去，蒯大富对这段戏剧性变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忆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说……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怎么会进行抵抗，以致造成伤亡铸成大错？（第28-29页）

这段话始见于《岁月流沙》。几十年来蒯大富总是翻来覆去地“炒冷饭”，无非是用于遮人耳目、掩饰并淡化他在“727事件”中犯下的罪行。

除了这句话外，蒯大富还常说这样几句话：

- ①“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指在文革中的表现）；
- ②“没有抵挡住诱惑”（指主动挑起清华武斗）；
- ③“要讲出历史的真相其实很难”（指反思文革）等。

几十年来，蒯大富就靠这几段话“混日子”。

其实蒯大富不是没有脑子的人，他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也不错，什么“头脑发昏、全身膨胀”，都不是当年蒯大富下令对工宣队“抵抗还击”的真实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是合理解释。

蒯大富是有脑子的人，遇上这样的大事，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联想与分析。

①正如韩爱晶所说：我想起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跟我们讲过的话：“我可没你们那么大的胆子，一声令下，随便就在北京开十万、二十万人的大会。我开一万人的大会都要请示毛主席。”¹韩有这样的联想，同为市革委会常委的蒯怎么可能没有？

②参加工宣队的解放军多数是8341部队的；谁都知道8341是毛主席的警卫部队，工宣队的领导层有杨德中、张荣温、迟群、谢静宜这些人，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蒯大富不可能完全不知道。

③团派在静斋、明斋、新水等处都抓了许多工人和解放军。据唐少杰有关文章披露被

¹ 同（注10）

抓者 143 人，其中工人 109 人，军代表 34 人。静斋、明斋、土建基地都曾关押过很多解放军，明斋是团派的一个重要审讯点。有一位男同学审讯了几个军人，他告诉在明斋另一个房间里同样参加审讯的沈昆同学说：一般部队的军人也和工人差不多，只说上面让来宣传“七三”布告就来了，究竟是谁派的就不知道了；八三四一部队的则不同，不管怎么问，都一口咬定是毛主席派的。¹

如此重要的信息不可能不向总部汇报，蒯大富也不可能毫不知情。

各种各样的与往日不同的现象与信息从方方面面聚过来，身为决策者的蒯大富却并没有如秦教授所说“如果有人通知一声‘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他定会全力配合”，而是变本加厉地继续抵抗还击。

任何人都会问：“这是为什么？”

这说明在蒯大富的脑子中还有另外一种联想与分析。而当这后一种联想与分析占了上风时，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蒯大富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居然感到特别敏感、十分美好了。²

整个文革期间，蒯大富经常有这样的“佯装不知、装傻充楞”的表演。

比如在工作组时期，他明明是认识王光美的，却佯装不认识，故意怀疑工作组是在“搞阴谋”，后来虽经工作组的镇压，但最终结果是他吃到了“好果子”；

又比如 1966 年 12 月，蒯大富只听张春桥的，不听周恩来的，佯装不知当时中央的内部规定，进行“1225 大行动”，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全北京。结果他又吃到了“好果子”；

这一次他在“727”的行为不过是这种手法的又一次重演。

所以，他在行动前期与中期才有“特别敏感、十分美好”的感觉。

¹ 沈昆：团派“洋枪队”队员，“清华 727 事件”的一名当事人。2011 年所撰网文《我所经历的七二七》约 6000 多字，是迄今为止团派亲历者中罕见的相当真实的回忆文章。

²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 343 页：“我们思想上特别敏感，自我感觉特别美好。”

06：吴德回忆与“727 召见”插话，相互呼应、互为印证。

【引文】（吴德回忆说：）“清华、北大的武斗制止不下来，毛主席决定同时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华、北大。……决定以后，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让他表态服从这一决定。我派人找蒯大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他找到，他不在清华，跑到北航去了。他来后，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要他拥护、执行这个决定。蒯大富答应得很好，说一定执行。当时，想不让蒯大富很快回去，拖住他，利用谈话的时间使工宣队、军宣队顺利进去。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蒯大富提出他要回去了，就让他回去了。哪知道蒯大富回去后，让‘井冈山兵团’拒绝这个决定，并且用他们自己制造的土武器和手榴弹打死了四、五个进行劝导的工宣队的成员，同时还打伤了几个。……工宣队进驻，遭到了‘井冈山兵团’的武力对峙。这样不行，毛主席就召见‘五大领袖’。……主要是说服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也安慰了几句。”¹

秦文对此评论说：“吴德的说法符合迄今认为蒯大富对流血应负全责的官方说法。但是这个说法的逻辑却十分混乱。”

秦文对此分析道：按此说，蒯大富在七·二七当天是从北航被吴德找去，在清华以外的某个地方接受通知的。而且“我们在谈话时，工宣队就进去了”。这也就是说通知蒯大富与工宣队的行动是同时发生，而不是事先通知的。这本身就与决定派工宣队后“赶快”通知蒯大富的说法相矛盾。既然这天直到工宣队进去时蒯大富还根本就不在清华而且也没有被通知，他怎么能够“一定执行”配合工宣队进驻的决定就令人费解。何况吴德下文又明言，当时他们本来是想借谈话“拖住他”不让他回清华的，只是后来轻信了他的假意承诺才放虎归山（从而由于他的背信弃义导致了流血）。那么按吴德等人的原定安排，应该是一开始就没有指望他“执行”什么决定的？（第 29-30 页）

¹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第 44-45 页。当代中国出版 2013 年 1 月第 3 版。

（一）吴德这段回忆的每一句话都表明时间是上午

吴德这段回忆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明确注明时间。也许是疏忽了，也许他认为没必要。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段回忆的每一句话都指向7月27日上午。

吴德讲得很清楚：他之所以寻找蒯大富是因为谢富治“让我赶快找蒯大富”，这当然是指赶在工宣队进校前，或进校同时或前期，什么时间找到了就什么时间通知。

吴德主观上是“赶快”的，客观上却没能“赶快”得了。这并不是出于他故意拖延，而是因为蒯大富从早晨6点多就离开了学校去火车站接人去了。吴德虽然不清楚蒯不在学校的具体原因，但他没有放弃“找”，结果“等了很长时间”才在北航找到蒯大富，然后约到了市委大楼谈话。

吴德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哪儿有什么逻辑混乱。混乱的是秦教授。

即便耽搁了一些时间，仍然是在工宣队进校的同时，时犹未晚。

虽然通知了蒯大富，却为什么还要“拖住他”呢？那是出于吴对蒯的“不信任”。

吴德为什么不信任蒯大富？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已有详细论述。¹此处毋须赘述。

（二）吴德的行为来自于谢富治指示，而谢的指示又来自哪里？

吴德之所以通知蒯大富，来自谢富治的指示。那么谢的指示又来自哪里？

无非有三种可能：毛泽东的指示、江青的擅自指示、谢富治自己的擅自决定。

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还是毛泽东对谢富治的直接布置。

（三）吴德回忆及“727召见”时插话，相互呼应、互为佐证。

如果谢富治接受的指示直接来自毛泽东，那么谢会告诉吴吗？吴德知道吗？

¹ 《清华蒯大富》第350页。

我们认为吴德是知道的。吴德在“728 召见”时的唯一插话也佐证了这一点。

毛主席：“……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黄作珍说：……

吴德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¹

吴德是“728 召见”时 15 名官员中级别较低的官员之一，一般不容易有发言的机会。吴德很有心地抓住时机作了插话，实际上是在向毛汇报：你要谢富治赶快通知蒯大富的事，谢交给了我来做。这个任务我是完成了的，但蒯大富不听。

从而证明了“间接打招呼”的一条路径：毛泽东 → 谢富治 → 吴德 → 蒯大富。

虽然通知了蒯，蒯也答应得好好的，但出于对蒯一贯的不信任，所以不仅拖了他一段时间，而且在蒯走后又迅速地告诉了在同一座楼里办公的刘丰，要刘以北京卫戍区的名义再给团派总部打电话。

这样做的目的也不难理解：一是防他回去不传达；二是加大通知的力度。

有了刘丰的电话，“间接打招呼”又增加了另一条路径：

毛泽东 → 谢富治 → 吴德 → 刘丰 → 团派总部：让团派总部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件事，并转告蒯大富。

秦先生对毛泽东所说的“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的说法不能接受，也就罢了，居然还特别反感。他愤愤不平地说：这叫什么话？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没打就是没打，什么叫“间接打招呼”？谁都知道那时要打的不是什么毛主席希望停止武斗实现联合这种关于领袖“伟大战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关于 27 日三万人进清华出于毛主席指令，要求清华配合这种“战术部署”的招呼。这样的招呼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的，有过吗？显然没有。（48 页）

¹ 同（注 10）

其实“打招呼”有多种形式，多种层次，这也是生活常识。有了以上所说的两条路径，毛泽东的“间接打招呼”不仅有，而且足以算。

秦先生之所以“愤愤不平”，是思想方法的问题；情绪也有问题，“小造反派”的情结太浓了。

07：蒯大富究竟是什么时候回到清华园？

【引文】而蒯大富和其他人的回忆则相反。按蒯的说法，当天上午“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他与团派的几个人到北京站接人，11点回来时工宣队已经大量涌入。（第30页）

在这一段里涉及到“清华727事件”中一个重要时间点的辨正问题。

秦文所说“11点回来时”，这个“11点”从何而来？

据我们查证，它可能来自于米鹤都、张琦采写的《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其中蒯大富说：“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

《岁月流沙》是一个采访记录形成的书，我们怀疑它并没有经过蒯大富或其它知情人的校核，里面的时间、人名及其它各种错误相当多。比如将“七二七”写成“七一七”；捉鬼队67年1月6日“智擒王光美”写成“66年11月6日”；沈如槐写成“沈荣槐”，鲍长康写成“鲍长安”等，还有一段：“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居然3个人名全是错的，应为“任传仲、刘才堂、陈继芳”。

即便如此，我们认为《岁月流沙》叙述蒯大富文革前期的经历，还是相当清楚的。当然其中已经掺杂有蒯大富的不少的谎言与隐瞒，但那是被访人的事。

借此机会，顺便谈谈我们对史料的态度。史料一般都是丰富多彩而良莠不齐的，正确的态度可归结为“博采”和“善择”四个字。既不能因其有错误而忽略了它也有正确；也

不能因其有正确而看不到它有错误。错误的多与少，大与小，涉及其整体价值，但对单条史料的却不能轻易下结论。即使有100条错误也不能排除第101条可能是正确的；即使有100条正确也不能排除第101条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史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两条原则。“博采”是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的基础，通过“博采”过程中不断的比照与思考，逐步地提高史识水平。史识水平的高低则体现在“善择”的准确率，以及对史料诠释的准确度与穿透力等。

《清华蒯大富》成书稍晚，共同的作者韩与蒯已在书中将蒯大富回到学校的时间明确的写成“中午12点多”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改？因为“11点”不符合事实，有太明显的“自相矛盾”，尤其说不清刘丰11点半打电话时为什么蒯大富不在学校？

我们应当相信哪一个呢？当然应该相信合理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同时也是“校史”明确的，而“校史”则是根据多方考证的结果。

秦晖先生采用“十一点”的说法，既违背当事人自己的正式出版物，又违背“清华校史”。

我们希望他能纠正，或补充说明理由。

08：又一错误的“因果关系”

【引文】最初团派广播还说热烈欢迎，后来就发现工宣队以50倍于清华人员的人海，把清华的各个楼分割包围，而且开始抓人，把团派的二号头头鲍长康和总部委员高季宏等都抓走了。（第30页）

这段话似乎没有说完，也没有表达完整。

如果按照秦文的思路，应该在“最初……都抓走了”的后面加上这样一句话“团派广播这才说‘工宣队是杨余傅黑后台派来镇压造反派的。’”

加上这句话，意思才算完整了。

可是，如果加上这句话，他会认账吗？

他当然不会认账的。他会说：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这样说。

我们在前面说过：用不经意的笔法，不断地制造一些既不明确，也不成立的“因果关系”，这是秦文的一个特色。

此处是又一例。

实际情况是：高季宏（高继洪？）并没有被抓，¹而“鲍长康被抓”是发生在下午1点多。此时临时总部会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开过了，“抵抗还击”的决定在半小时前就已经出笼了，广播基调更是在一小时多前就已经改变了。

秦文处心积虑地要为蒯大富的“杨余傅黑后台操纵工宣队”的调子和“抵抗还击”的决定寻找“因果关系”，不惜粗制滥造、前后颠倒，因果颠倒，将捕风捉影的事当作实证，将后面发生的事情移到前面来；这样的“混乱与错误”在秦文中比比皆是，所以我们才称其“夏雨遍地流”。

民谚：春雨贵如油，夏雨遍地流！

遍地流的“夏雨”不仅没有价值，甚至会造成“涝灾”。

09：727 上午及中午，团派武装对工宣队的三次抵抗

【引文】到下午三时团派冲出楼外进行“突围”反击工人，蒯大富乘机出清华赶到市革委会，找谢富治未果，找到吴德。（第30页）

秦文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727事件”中大量的时间问题，但他没有自己的研究，所

¹ 高季宏（高继洪？）团派“大礼堂区”武斗主要负责人。他曾在校友网上发帖否定了自己“被抓”。当时，蒯大富也在网上。“高季宏”这个名字在各种资料中都不一样，有的写作“高继洪”，还有的写作“高继红”、“高季洪”、“高季红”等。故加上一个疑问号。

引用的“时间”全是抄来的。别人对了，他也许对；别人错了，他也跟着错。

更有一种奇怪现象：如果同时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可供选择，他往往会选择那个错误的。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身不由己！

秦文此处的写法容易地让读者产生一种误解，似乎团派是从下午三时才开始“突围”反击工人的。

实际情况是，在 727 上午及中午，团派武装对工宣队已经有了三次抵抗与反击。

第一次：上午 10 点左右，工宣队的主力队伍约 1 万多人已经集结在西校门外，他们故意继续着前几天所进行的迷惑性宣传。当时蒯大富与鲍长康都不在家，团派总部核心组成员、文攻武卫副总指挥、作战部长任传仲亲率一支几十人的长矛队到西校门阻挡宣传队进校，将工宣队阻拦在门外 1 小时左右。这次对抗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第二次：中午 12 点左右，在明斋。

工宣队于上午 11 点左右全线进入清华园后，采取的方针是分割包围，但在下午 3 点之前的总方针是“围而不攻”，无论是对团派总部静斋，还是对团派的其它据点，包括外地造反派集中的 10 号楼，基本如此。只有对明斋有所不同，明斋广播台是团派总喉舌，而且又在不断地广播呼叫，工宣队领导决定要先将明斋拿下。工宣队砸开了明斋大门，数以百计的队员冲进楼。武装保卫广播台的负责人王文（化名）带领长矛队退守至 3 楼，向楼下无人处扔了两颗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弹片四处飞，炸碎了许多玻璃窗。工人们就全都撤下去了。长矛队冲到楼外，工人们就往东、往北逃。

明斋的“武装反攻”发生在中午 12 点多，双方都有人受了伤，但没有具体记载，而王文扔了两颗手榴弹是有记载的。¹

第三次：发生在团派总部静斋。

¹ 内部资料

明斋“反攻得手”的消息传到静斋，刚从市里回到静斋的蒯大富很受鼓舞，守卫在静斋的任传仲也跃跃欲试。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拚了”。蒯大富话音未落，任传仲率长矛队冲出了静斋后门。手无寸铁、手捧宝书的工宣队员们见势不妙，慌乱撤退。由于静斋后门地域狭窄，有些工宣队员就掉进了荷花池。静斋后门就此解围，整个静斋也随即解围。

蒯书 343 页中说：下午 2 点前后，在团派作战部长（即：任传仲）带领下，用石块、长矛冲击在静斋后门的工宣队，把包围静斋的路打开了。

这里的“2 点前后”应该改为“1 点半前后”。

10：冲突升级与蒯大富离校有没有关系？

【引文】而就在他离校后冲突进一步升级，工宣队出现伤亡。吴德告诉蒯已经闹出人命，严历要求他服从。双方争执到晚上，约 20 时蒯大富才随市革委的人回到清华，在校外的清华园中学进行谈判。（第 30 页）

冲突是不是在蒯离校后进一步升级的？是！

冲突是不是因蒯离校才进一步升级的？否！

读秦文有很多感慨，你说水平很差吧？也不是；你说水平很高吧？更不是。但有时也确实很令人感到惊奇，仿佛其笔触有一种“宛转毫毛之间”的本领。

这里的这种写法能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冲突“升级”与“蒯大富离校”有什么因果关系似的。

实际情况是：无论蒯大富离校不离校，冲突都必然会升级。

因为，蒯大富离校前已经将他的政方针都布置好了。

①“抵抗还击”命令已经下达了，并通过电话、广播、派人等多种方法传达到据点；

② 蒯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拚了”。这是“肢体语言”！

③ 离开静斋时蒯又将数十发手枪子弹发给武斗人员。这是“无声的命令”！

下午5点钟蒯大富到了市委，上楼找谢富治没找到，见到吴德的秘书，就直接到了吴德的办公室。一见吴德就大声责问：谁把几万工人派到清华来？吴德只说是市委的决定，始终没有说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两人争执了半个多小时，吴德就让蒯在那儿等，一直等到晚上7点钟。这期间吴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电话，打电话。6点多，吴德在接到一个电话后告诉蒯：清华已闹出人命了。7点多谢富治回到市委大楼，与蒯大富谈话；8点多，工宣队军代表迟群、谢静宜带了几十名工人来到市委，在谢富治主持下，双方开始谈判。双方对“交出凶手”争执不下，最终达成了“停止武斗、撤消据点、交出武器”的三项协议。9点钟左右，谢富治让工宣队的人带着蒯大富回到清华去落实协议。迟群却在校外的清华园中学就“交出凶手”继续与蒯大富谈判。

我们不仅遗憾地发现秦文对“清华727事件”中所有的时间节点都搞不清楚，还发现他对每一个事件的具体过程也不清楚，但他先入为主的观点与结论却相当顽固。

11：9003 大楼的团派武装抵抗到什么时候？

【引文】达成协议后蒯大富回团派总部，说服他们带队撤离。（由于被分割包围，团派个别据点如9003大楼并未得到通知，在蒯大富等人撤离后仍抵抗了一段时间）（第30页）

如果你的身份是当年老蒯手下的一个兵，你的这种写法我们还能理解并谅解；可是你不是，你是一名学者呀！

什么叫“并未得到通知”？实际情况是根本就没有去通知！

什么叫“仍抵抗了一段时间”？实际情况是又抵抗了两天多！

蒯大富在达成协议后并没有回团派总部静斋，而就留在明斋。

所谓的“说服他们带队撤离”也不成立。团派重要据点化学馆、生物馆、明斋、9003、都没有撤离。团派控制的200号还关押着“蒋刘反党集团”、“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12人反党集团”的大批“案犯”。团派曾经将部分“案犯”转移至北航，后来又将他们转移到200号，直至十天后才被迫释放。

不要说“达成协议后”没有撤，即使在毛泽东“728召见”后也仍然没有撤。

如果蒯大富是一个有起码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的人，他在受“召见”回来后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亲自跑到9003大楼里面去，带领着团派弟兄们“肉袒负荆”地走出来向工宣队交械。

可是，蒯大富没有这样做，却放任9003的武装队伍加强工事，将防御工事搞得“固若金汤”。团派在该楼顶架起望远镜，每个楼角架起一门土炮，每个窗口处都放有硫酸瓶、手榴弹、暖气片等，大有决一死战的架势。¹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至7月30日中午。

7月28日中午后，毛泽东召见学生领袖的消息开始传播。一部分团派武装人员在沮丧之中捞到了稻草，固守9003的团派武装挂出3条大标语：

“雪里梅花开不败，井冈山人敢上断头台！”

“生做毛主席的红小兵，死做毛主席的红小鬼！”

“毛主席接见蒯大富是对井冈山人最大的爱护！”

在第三幅大标语上，他们刻意将“蒯大富”3个字写得大大的，然而却没有将“毛主席”3个字写得大大、更大大的。

¹ 唐少杰《清华七二七事件》。

这3条大标语确实有气势，彰显了“井冈儿女们”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头可断，血可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挂的位置也好，从五道口一下31路公共汽车站，就远远地看见了。

有些团派人员就觉得真长精神、真提气！

有些老四的人看了就偷好笑！你们还长不长脑子啊？你们这是在向毛主席表忠心呢？还是在向蒯大富表忠心呀？

至于工宣队员们看到后会是怎样的感想？难道还用问吗！

直至7月30日上午，工宣队代表与团派代表（10人）谈判放9003的人。谈判中团派个别代表态度仍很恶劣，最终总算是达成了协议。

7月30日中午，楼前开来几辆军用卡车，上百名解放军战士分两队左右夹道保护，把围楼的工宣队挡在三米之外，让9003的团派武装鱼贯而出上了车，清华园里最后一个武斗据点终于被撤除了。

“728召见”已经过去2天半了，这个据点撤除得太晚了。

蒯大富的政治智慧意识不到只要9003据点多存在一天，就表明他还没有放弃武斗，他在毛那里的印象分就会嗖嗖往下降；蒯大富也意识不到这3条大标语一定会被工宣队写入简报的，弟兄们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在帮倒忙，是将他往火坑里推呀！

12：蒯大富从来没有说过“事先根本没有得到通知”

【引文】与吴德所说相反，蒯大富的回忆是他事先根本没有得到通知，工宣队进入后是他找的吴德而非吴德找的他，这时清华已经死了人，而到这时吴也只要求他服从，仍没有告诉他是毛泽东的安排。（第31页）

读秦文还有一种感慨：真不知道它的“混乱与错误”有没有底线？

比如“蒯大富的回忆是他事先根本没有得到通知”。

蒯大富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这句话呀？

几十年来，蒯大富只是说没有告诉他是毛泽东的决定，但却从来没有否认过有“通知”。即使最近在《记忆》164期的文章中，蒯大富矢口否认7月27日上午吴德通知过他，也没有否认过上午11点半刘丰的电话通知。虽然当时他不在学校，但刘丰也是明确要求总部其它人转告蒯，蒯大富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没有得到过转告。

几十年来，蒯大富在这个问题上有过许多狡辩与抵赖，但也从来没有抵赖到秦文所说的这种程度。

2011年出版的《清华蒯大富》第370页记载：在“728召见”时吴德插言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过，他不听我的。”

2015年发表的韩爱晶关于“728谈话”文本中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两者有三个字的差别：“约”改为“找”；“我的”二字不见了。

两者的捉笔人都是韩爱晶，时间相差四、五年。这说明韩爱晶在如何表达时是经过思考和选择的。“找”与“约”虽一字之差，显然“约见”、“约谈”比“找到”更正规；“找到”、“找来”却比“约见”更主动；无论是“找”也好“约”也好，都是吴德一方的主动行为，都说明了这一行为发生在上午。

13：晚上11点钟，一个尴尬的时间点

【引文】他们晚上才回到清华，此后也并未发生吴德所说蒯大富背信毁约下令抵抗的事。（第31页）

秦文中的“断语无据”，时时又处处，一个又一个，此处又一个。

实际情况是：

双方于晚 10 点 45 分，在清华园中学达成最终“协议”。

清华园中学位于清华大学南门外的兰旗营，开车到明斋 10 分钟不到，所以如果明斋广播台与工宣队宣传车正常广播协议的话，时间都应在晚上 11 点钟左右。

而晚上 11 点，却是一个尴尬的时间点。

根据我们的研究，团派武装对 9003 大楼的反攻发生在晚上 10 点多，参加反攻的有 100 多人。反攻很快得手，得手后的团派武装迅速地进行清楼。

清楼的过程中，有数名工人遭毒打。其中，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厂革委会委员韩忠现，当时正在二楼（三楼？）一个房间跟同事谈话。一支长矛刺在韩的胸膛上，刺破了动脉。他按住伤口刚走到门口就晕过去了。同伴背起他还没走到楼梯，就咽气了。时间在晚上 10 点半左右。

守楼者们得到援兵，一部分人端着长矛守卫大楼，另一部分人赶紧加固工事。

从楼内撤出来的及原在楼外的工宣队有几千人，他们在楼外又对大楼形成了包围。但是工宣队的外面还有外围，那就是团派的武斗队伍。他们没有足够的人数形成反包围，只能在附近玉米地里和树林里偷窥。在这支偷窥的团派队伍里就隐藏着枪手，正伺机进行偷袭与冷射。

约 23 时 20 分，团派队伍里的枪手开了枪，枪声划破了清华园的夜空。

枪声响起，一名站在一片玉米地前站岗的北京橡胶四厂工人李文元倒在血泊之中，一粒手枪子弹打中了他的胃部动脉，他被抬到海淀医院时，已经来不及抢救了。

枪声响了不止一次，另外还打伤了北京光华木材厂工人邓广志和刘孝林。

枪声再次震惊了工宣队领导，他们没有想到团派在晚上终于开枪了。黑暗中，既不知枪手在何方？也不知有多少支枪？枪一响，人倒地，非死即伤。枪手在暗处，工人在明处，包围 9003 的数千工人就成了任人宰杀的目标，这太凶险了！

工宣队不敢再蛮攻，团派也没有再开枪，9003 大楼的攻守之势暂时维持了平衡。

韩忠现之死发生在 11 点前，李文元之死发生在 11 点钟后。

站在蒯大富的立场上，可以认为“9003 血案”发生在协议签定前；

站在工宣队立场上，可以认为协议墨迹未干，蒯即撕毁协议，制造了“9003 血案”。

迟群后来说：当时他们造谣污蔑，耍两面派，7月27日晚达成协议，停止武斗，让工人同志进去宣传毛泽东思想。当面说的很好，达成协议以后，工人宣传队广播了，他们回去不广播，搞两面派，给工人宣传队造成很大困难。就是这样也没有难倒工人阶级。

蒯大富讲：“双方又谈到22时45分，签字后，我和工人、军代表前往设在明斋的团广播台广播协议。”

迟群说团派没有广播，蒯大富的表述却是模糊的。只说他去了明斋，却没有说有是否及时广播协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号。

看过有关档案的唐少杰教授说：双方约于22时45分签字后，蒯与5名工人代表、1名军代表前往明斋团派广播台落实广播上述协议。到达明斋后，蒯把代表们搁置一旁，在另一房间召开团派头目及有关人员30多人参加的会议。¹唐文也没有明确团派究竟是广播了还是没有广播。

分析这些模棱两可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在协议签订后，蒯大富并没有将协议及时通知（或派人通知）9003的团派武装人员，更没有立即制止尚在行动之中的团派反攻9003的行动，结果又造成了团派开枪打死、打伤工人的事。

由此可见，秦文的结论“此后也并未发生吴德所说蒯大富背信毁约下令抵抗的事”是错误的。

14：毛的“保密指示”就54个字，请不要添油加醋！

【引文】谢静宜接着说：毛泽东在做出“捅马蜂窝”的决定后，首要的考虑就是对清华两派人士乃至一切与清华沾边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毛泽东亲自交代，

¹ 同上

参加行动的工人必须来自“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更有甚者，据谢静宜说：同样“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毛泽东不仅布置了严格的保密，而且让北京当局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的人”……（第31页）

在上述引文中既有毛泽东的话，又有秦先生自己的发挥，界限不清不楚。秦文的这种写法将毛泽东的“保密指示”也搞“混乱”了。

其实谢静宜书中关于“保密指示”就54个字（不包括标点符号）：“注意啊，工人要派大联合、三结合好的工厂，派性少的工厂，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谢静宜书第177页）

两者一比照，很容易发现秦文中“谢静宜接着说：毛泽东在做出‘捅马蜂窝’的决定后，首要的考虑就是对清华两派人士乃至一切与清华沾边的人严密封锁消息，而且做得滴水不漏。”是对“保密指示”的添油加醋。

秦文“更有甚者，据谢静宜说：同样‘为了不让北大、清华的人发觉’，毛泽东不仅布置了严格的保密，而且让北京当局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的人”也是“添油加醋”。从谢静宜原文中看不出毛泽东的“不仅、而且”，“以疑兵之计迷惑清华的人”也是有关方面落实毛“保密指示”时的自行发挥。

对于这“54个字”的原版，毛泽东自己并没有明确这是他的“保密指示”，是谢静宜、迟群等人及北京市委将其理解为“保密指示”加以传达与落实的。

我们认为，“保密指示”有其合理性。清华两派都有大量武器，如果事先走漏消息，武器就有可能被转移，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患。所以要保密，采取突然行动一举收缴。

写作者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理解，理解为“保密指示”或“注意事项”都未尝不可。但秦文将工宣队、北京市委在落实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措施也归于毛泽东的“保密指示”，这种做法很不好。过去叫“篡改”，现在可叫“塞私货”。

15：关于“路线”问题，秦文的一处大硬伤

【引文】这里要指出的是：按谢静宜的回忆，“宣传队”进入清华后，七·二七行动总指挥部曾同团派谈判，为缓解冲突，市领导决定“限工农宣传队只准走的路线，以及规定哪些路线、地区不能进、不能通过”。这本是保障有秩序地“和平解放”清华所必须的规则。……但是，毛泽东知道这一规定后却大为光火——（第34页）

这是秦文又一处硬伤，而且是一处大硬伤。

（一）秦先生看书太不细心，又将时间搞错了

这件事见于谢书180页，但此事发生在“727事件”四天后的7月31日。

秦先生看书太不细心了，又将后面发生的事挪到前面来说事。

（二）秦文删了两个字，原有的含义就没有了

秦文中的“市领导决定”，在谢书原文中是“最后市里一领导决定……”。

这里的“一领导”暗指谢富治。秦文将“里一”删掉了，虽然我们相信他是“粗心”而非“有意”，但原文的含义就没有了。

必须说明一下：并不是我们有意要挑他这个粗心的“小错误”，因为这个“小错误”其实并不小，关系到如何理解“727”后存在着的工宣队与谢富治的矛盾与斗争。

“728”后，谢富治直接受命于毛泽东来解决清华问题，不仅凌驾于清华两派之上，而且凌驾于工宣队之上。但他对毛泽东的意图领会不正确，更没有估计到毛泽东在“728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也是会变化和调整的，所以他对清华两派及与工宣队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处理是不正确、不得法的，引起了工宣队领导集体的不满。7月31日，谢静宜受工宣队领导的委托直接去向毛泽东告状，一告一个准，引起毛泽东“大为光火”，批评谢富

治是“路线错误”。谢富治遭此挫折后很快就淡出清华了。工宣队摆脱了谢富治的控制，这才逐渐主宰了清华园。

（三）秦文对该“决定”的具体内容毫无研究

史料记载：7月31日，谢富治等市革委的领导人再一次来到清华看望工宣队，并给工宣队作了“七点指示”。其中有两点直接涉及到“区域与路线”，摘录如下：

三、暂时分门分区，维持秩序。学校五个校门，工宣队负责南门，井冈山兵团负责北门、西门、西南门，四一四负责东门；

四、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在校内恢复一切正常活动之前，在目前两派对立情绪没有消失之前，主要在自己的区域内活动；

工宣队负责焊接馆、汽车楼、动农馆、招待所、附小、幼儿园等地，

井冈山兵团负责原东区全部、原西区全部和礼堂区全部，

9003大楼由解放军负责保护，

四一四负责主楼。

谢富治“七点指示”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一个清华分成“3+1”：规定工宣队在二校门以南、以东的一小片；将原414区域划出焊接馆、汽车楼、动农馆给工宣队；另将9003大楼交由解放军，而团派除了放弃9003和二校门南的区域外，原有地盘几乎不变。

“七点指示”维护了团派在新形势下的独立性与封闭性。

无论是工宣队还是414都会问一个为什么：对团派如此有利、如此具体的“好办法”，谢富治的脑瓜子怎么能想得出来呢？

其实，这“3+1”的原始创意仍然出自蒯大富自身的如意算盘，借力于毛泽东对蒯表示的关爱，居然说动了谢富治。

当时大家都没有估计到工宣队从此就在清华不走了，更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也不让工宣队走了。不仅谢富治、蒯大富没想到，连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是不明确的。

按照一般思维，工宣队是一支临时集结的队伍，成员组成也很复杂，既不是领导，也不是干部；既不能当老师也不能当学生；一旦武斗制止了，任务也就完成了，当然会拍拍屁股走人。那么接下来的清华会怎么样？很可能是新形势下的“两派之争”。

所以从“728 召见”回来后，蒯大富的主要心思并不是用在如何落实毛泽东关于制止武斗的指示上，而是用在其它几个方面：

1、蒯大富不得不向工宣队作检查，不得向工宣队中死伤者的家属认罪、道歉。

按照正常思维，工宣队是不可能原谅蒯大富的，死伤者家属及其所在单位更是恨不能将其生吞活剥。正由于谢富治再三做了工宣队的工作，才将工宣队的仇恨与愤怒情绪暂时的压制了下来。

2、蒯大富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持弟兄们对自己的信任。

为此，他反复渲染“728 召见”时“一进门，哭一场”和“临分手，再回首”的两个动人的小场景；夸大毛泽东对 414 不满的同时夸大毛泽东对自己的袒护。

例如，毛泽东在“召见”时说过“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蒯大富传达成：毛泽东说“十万工人进清华，414 高兴，团派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年轻时的蒯大富嘴皮子超一流，滚珠轴承似的叭叭叭叭。比起一般校友而言，他的确有语言优势。他反复向弟兄们证明伟大领袖不仅没有抛弃他，而且仍然偏向他；不仅没有追究他开枪杀人的罪行，而且还说“错误就不要再讲了”；不仅没有因为老四表现好而移情别恋，而是仍然喜欢我蒯大富，仍然倾向我们这些“老团儿”……

蒯大富本能的知道他只有这样讲，弟兄们才不会抛弃他，才会继续跟着蒯大富，才会让弟兄们相信继续跟着蒯大富就是继续跟着毛泽东。

3、他要继续捏住能将“414”置于死地的唯一的一张牌。

这张牌就是继续关押并审讯“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十二人反党集团”的“案犯”。团派中的“有识之士”也都能认识这是我们老团的“命根子”。

所以他们在 727 后将刑讯逼供得来的大量纸质材料、录音材料、照片等转移到北航。

为了不让工宣队发现并解救“案犯”，蒯大富一伙还曾于 7 月 29 日夜间将他们从 200 号秘密转移到北航，8 月 4 日又从北航秘密转移回 200 号。

为了能对这些“案犯”继续进行“惨无人道”、法西斯式的“刑讯逼供”，蒯大富们迫切需要继续保持不受监督的私密空间。

谢富治“七点指示”的实质就是“3+1”，“3+1”的目的就在于摆脱工宣队的监督与控制，继续整合队伍、私藏武器，继续加紧对“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及“十二人反党集团”的审讯，随时准备翻盘。

16：对“造反派，真的反了”的过度解读

【引文】他派三万大军进校就是去弹压“造反派”的，只不过他明显是要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事态、人为地增加三万大军与千余学生发生冲突的机率。（第 35 页）

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陈长江曾回忆，毛听周恩来报告说清华发生流血死亡后脱口而出曰：“造反派，真的反了？！”唐少杰先生认为这与谢静宜的回忆有所不同。其实现在看来，毛如果真讲了那句话，恐怕也不会是意外惊讶，而是计谋成功后的惊喜语气。正如唐少杰另一处评论的：“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第 35 页）

727 从上午 11 点起，全天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工宣队员受伤、流血的事，相对集中的大规模的“血案”有两次。

第一次是下午 5 点后至 7 点前发生的“东区大血案”，死了 3 个人，受伤人数三、四百，主要是团派武装以及混在团派武装中的“外地人武装”用长矛与手榴弹，还有砖头、石块造成的。那时校园内虽有枪声不时响起，却还没有开枪打死工宣队员的记录。

第二次发生在晚上10点后至12点前的“9003血案”，死了2个人，受伤人数可能又有上百人。

“9003血案”与“东区大血案”的重大区别就是团派武装动了枪。

727晚上毛泽东睡之前只知道“东区大血案”的伤亡情况，而对正在发生的“9003血案”一无所知，也没有及时得到情况汇报，所以他还是洗洗睡了。

而周恩来在728凌晨向他报告的内容则有睡前没有想到的令人惊骇的新消息：

①晚10点后在“9003大楼”发生的新“血案”，又有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了。

②团派武装竟然开了枪。开枪不开枪，性质当然是大不一样的；

③新血案发生在工宣队与团派的协议签定之际，签定后又继续发生。

如果能认识到这3条新消息确实是令人震惊的，那么对毛脱口而出的“造反派，真的反了”这句话就能够理解了。

如何解读这句话，也涉及到对毛的一些错误的认识程度问题。

比如“大跃进”也是毛的重大错误，它直接导致了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但毛为什么要发动大跃进呢？有人说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早日过上好日子；有人说是为了与赫鲁晓夫争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头头；有人说是不懂经济、瞎指挥；有人说是好心办了坏事；各种各样的理解都是见仁见智，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解读是错的，也是能够被理解的“错”。

但是如果有人标新立异，说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饿死人”。

请问，这种说法合理吗？你能接受吗？

同理，对于派工宣队进校这件事，人们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有人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用这个办法才能迅速制止武斗；有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好，应有更好的办法；有人理解是为了考验蒯大富的政治品质与政治智慧；有人理解为这是诱导蒯大富犯错误，乘机抛弃造反派。

对于“造反派，真的反了”这句话，不同角度、不同立场，也会有不同理解。有人理解为“惊讶万分”；有人理解为“失望至极”；有人理解为“实属无奈”；有人理解为“勃

然大怒”；有人理解为对“死了人”的满不在乎——各种理解都有各自的理由。

但是像秦先生解读为毛感到“计谋成功后的惊喜”，则是秦先生别出心裁，“独此一家”了。这样的解读显然不是理性的，而是一种情绪化的、发泄性的过度解读。

秦文紧接着引用别人评论“这再次印证了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语：‘政治斗争就是要引导对方犯错误’”（第35页）同样也是过度解读。

毛面对的不是当年拥兵自重的张国焘；不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王明；不是当了20多年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两届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也不是被称之为“亲密战友”，“接班人”地位被写进了党章的林彪；……毛面对的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蒯大富，毛会将他看作是一个“政治对手”吗？毛如想抛弃他，用得着施展“阴谋”吗？用得着让工人、解放军死伤一大批作为“垫背”吗？

第二部分：秦文关于“清华—北航黑会”的混乱及错误

秦文第三、四节专讲“清华—北航黑会”，第一句话就是“那么，——‘清华—北航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第37页）

可见秦文在主观上是想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可是它说清楚了吗？

一、有没有“清华会”？

《北航黑会》的存在历来不存在争议，有不同看法的是在“北航会”之前有没有一个“清华会”？如果没有，那么《清华—北航黑会》这种说法就显然不能成立了。

（一）秦文兜来兜去，始终没有兜清楚

秦文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只在叙述“对当事人的采访”中兜圈子。

① 采访武传斌

武传斌先生当时是广东“旗派”头头、广东省革委会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是我在北京参与串联，组织，主持，在北航召开了一次有十几个省，市在京上访的造反派大会”，即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时所说的“北航黑会”，“之所以拉上清华，那是因为在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但我从未听过‘清华、北航黑会’的说法”；“‘清华-北航黑会’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

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仅对各地造反派来北京，来清华表示了欢迎和支持，没有更多的讲话。7月17日的会是在北航开的。”（第39页）

秦文注明出自“武传斌电邮”，却没有标明日期，所谓“近年”不知是“何年”？

秦文这里所引述的两小段武传斌的话中有两项错误：

- 1、前面的“7月16日”应为“7月17日”，后面的“7月17日”应为“7月18日”。
- 2、蒯大富并没有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即“清华会”。

对于这两项错误，武传斌后来在接受阿陀采访时已经纠正了，但秦文却没有明确的纠正。

② 采访朱仁

秦文说：至于周恩来指为与武传斌一起成为“黑会主席”的朱仁，是七·二五接见中被多位“中央首长”连珠炮式审问追逼得最紧的一位。据接见记录，当时他在追问下“转弯抹角、吞吞吐吐承认在清华主持了这次黑会，说有十几个省、三十多人参加”。

2014年8月10日秦晖在南宁访谈朱仁：朱仁否认了“主持”之说，只是说自己发言介绍了广西的情况，并且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是在北航开的，没有在清华开过，如果清华也开了，那自己并没有参加。（第39-40页）

③ 采访钱文俊

秦文说：这个说法（指上述朱仁的说法）与当时作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钱文俊所说可以互相印证。

近年（指：2013年7月8日）钱文俊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但第一天通知他们到清华，却因为当时清华武斗，校园一片混乱，根本找不到会场，实际没有开成会，会是第二天在北航开的。（第40页）

④ 采访蒯大富

2013年6月23日秦晖在深圳访谈蒯大富：他对这个会已经没什么印象，但后来想起是有这么一个会，他当时就害怕跟各省这些人混在一起，但碍于武传斌他们的面子到北航去了一会儿。“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联合组织，我跟中央文革和周总理这些首长打过那么多交道，当然知道这是大忌，要惹大祸的，就断然否定了这个馊主意。有人又说那就办个联络站保持联系，我说即便搞联络站也要先请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确同意才能搞，否则是绝不能搞的。说完我就离开了。”（第40页）

从2013年6月至2014年8月，在一年多时间内秦先生起码作了这4次采访，但对于究竟有没有“清华会”？秦文兜来兜去却没有兜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他带着读者和他一起兜，将读者兜晕了，也将自己进一步的兜晕了。

（二）钱文俊的一篇文章早将“这回事”说清楚了

其实，秦先生只要多看一篇文章就不至于那样混乱了。

钱文俊在接受秦先生采访时没有说清楚的问题，自己却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网文《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下文简称为“钱文”）中早就说清楚了。¹钱说：

¹ 钱文军（原名钱文俊）广西南宁422的主要头头之一，“广西代表团”的正式代表。2006年发表的网文：《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

“白（鉴平）希望我能一同参加，我表示没多大兴趣，因为我根本看不起蒯大富。”

“——白鉴平总结道：那你能怎么办？力争一下总比不争的好。我们什么东西也不向中央反映，别人可没闲着，最后还不是等死？遂统一意见，管他三七二十一，去听听也好。”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几个从政治学院东北角爬围墙出去，到了魏公庄，高天寿等在那里。……高领着我们搭公共汽车到了清华。

清华园里乱七八糟，比几个月前我来时，武斗气氛浓烈得多了。蒯大富看样子没什么优势，“四一四”的广播喇叭显然更信心十足，我不禁觉得好笑，对白鉴平说：老蒯像蒋介石迁都广州时一样了。白鉴平说：你他妈的这把嘴就是不饶人，哪有那么严重？他的话还没落音，高天寿发话了，他叫我们别挤在一起走，分开点距离，不远不近跟着他。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来找亲戚朋友的，千万别说来开会。我抓住他的交代马上驳斥白鉴平，这次白也笑了，说堂堂蒯大司令，在清华也成了“地下党”，是有点不争气。然后又讥笑清华的武斗工事，跟我们去年刚开始武斗时水平差不多。七转八转，人都快转晕了，高天寿才找到地方，受了一通盘问，终于进了会场。

会议已经开始，我们属于迟到的。一位据说是蒯大富秘书的角色，打着官腔批评我们迟到。当时正好有一位老兄在发言，听起来像是吉林的。我打量一下会场，大约四、五十号人，看上去都面露忧愁与冤屈。

这天的会议不知怎么结束的。因为我已经跑出去看清华的“小儿科”级别的武斗去了。不记得什么时候，会议结束。说是被清华“四一四”发现了，可能不安全。并已经决定明天到北航继续开。

于是我们几个离开了清华，有人提议去吃烤鸭，白鉴平说那玩艺远不及广西的烧鸭好吃，于是我们到展览馆餐厅吃饭。”¹

¹ 摘自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文中所出现的白鉴平、高天寿等都是“广西 422”的头头。“广西 422”是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统称，各地则又有自己的名称。在柳州又叫“造反大军”，白鉴平则是“柳州造反大军”的头头。摘自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文中所出现的白鉴平、高天寿等都是“广西 422”的头头。“广西 422”是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统称，各地则又有自己的名称。在柳州又叫“造反大军”，白鉴平则是“柳州造反大军”的头头。摘自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 接见”》。文中所出现的白鉴平、高天寿等都是“广西 422”的头头。

看了这篇记叙详实、情节合理（不排除其中仍然有些差错）的回忆，谁还能说没有“清华会”！

秦先生有没有看过这篇钱文呢？我们猜测他是看过的。否则他为什么要采访钱呢？如果看过，却又为什么只字不提呢？为什么将钱文已经说清楚的问题又重新搞混乱了呢？这是我们百思而不解的。

（三）其实，从秦晖的采访中也能分析出“清华会”的存在

客观地说，秦晖的数次采访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采访后必须要进行梳理与分析。好比“做实验”，虽然做了实验，但写不出“实验报告”，这个“实验”就白做了。秦文虽作了采访记录，却没有进行梳理与分析。

这个工作，让我们现在来做一做：

采访武传斌：武所否定的只是“清华—北航黑会”这种说法，却肯定了“清华会”的存在。

采访朱仁：朱所明确的只是“如果有，他没参加”，却没有明确“有”与“无”。

采访钱文俊：钱倾向于“有”，又说“实际上没开成”，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没开成呢？钱给出的原因是“根本找不到会场”；

谁没有找到会场呢？是钱文俊及与钱一起去清华的几个人；

其它人是不是也都没有找到会场呢？其它人的情况，钱怎么可能知道呢？

常识告诉我们：有人或有几个人找不到会场是既不能证明会议没有开得成，也不能证明会议是开成了的。所以“实际上没开成”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但在上述三次采访中，有一次是作了肯定的。武传斌的“略作更正”肯定了“清华会”的存在，且有时间（虽然时间错了一天）、地点、情节，所以是可信的。

“广西 422”是广西造反派组织的统称，各地则又有自己的名称。在柳州又叫“造反大军”，白鉴平则是“柳州造反大军”的头头。

至于采访蒯大富呢？鉴于采访一开始时蒯已经声称对这次会没有记忆，后来蹦出来的那一大段话，可信度本身就打了折扣。再加上时间与情节上有明显的矛盾（这在后文中将有阐述），这次采访就变得无意义。

而在秦文中却又说：“笔者所知的与会者中，两校都去了的似乎只有白鉴平。”（第42页）如果这是可靠的，就有了第二个“个例”，同样证实了“清华会”的存在。

这是一个证明“存在”的案例。大凡这类案例只要有一个可信的证据就够了，何况这个证据来自于会议主持人武传斌；何况朱仁、钱文俊都没有明确的否定。

二、“清华—北航黑会”开了几天？

我们再来研究“清华—北航黑会”的时间与会期的问题。

（一）秦文似是而非，“对了”以后又搞乱了

让我们再次重复一下秦先生“对当事人的采访”：

在采访武传斌时，武传斌说：“……大会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请来上了主席台。”后来他又略作更正说：“68年7月16日第一天的会议是在清华开的。老蒯参加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

秦文紧接着又说：“而根据七·二五接见时四·二二参会代表白鉴平所说，会议是18、19日开的，与武传斌40多年后的回忆有两天之差，应以白鉴平当时的说法为准。”（第39页）

看来秦文接受了白鉴平的说法：会议于18、19开了两天。

这不就对了么？

但是，秦文既没有讲理由，表达上又不明确，给人以“不踏实”的感觉。

而且，秦文接下来就叙述对朱仁、钱文俊的采访。朱仁说：“他参加的会议只有一天，

-----”钱文俊说：“会议似乎是开了两天，……”

这样一来，原本就“不踏实”的结论又被搞混乱了。

（二）“阿陀访撰”中的叙述已经相当清楚

其实，阿陀先生有一篇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下文简称为“阿陀访撰”）早就将会期说得相当清楚了。

“阿陀访撰”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武传斌自述”；第二部分“阿陀九问”。

在第一部分“武传斌自述”中，武传斌说：

关于“北航黑会”，有人说是1968年7月16、17、18号共开了3天，第一天是在清华开，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也参加了，第二天才转到北航。这是不对的，因为会议实际只在北航开了两天——18、19号，蒯大富只是在18号北航会议第一天出现了一下。

17号在清华开的是碰头会，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的预备会，是小型的，“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贵州……”一共二三十人。我印象很深。¹

“阿陀访撰”是“多次专题采访当年会议的主要主持人武传斌，综合整理并经武先生反复修改以后”形成的。

所以，武传斌生前的最后结论是“北航黑会”于7月18、19开了两天。

¹ 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发表于《记忆》2015年2月28日第125期。采访者阿陀称：（该文）根据2012年3月24日多伦多访谈记录及2013年10月7日、18日和2014年6月5日、19日、23日共五次电话记录综合整理。2014年7月经武传斌多次审阅修改认可。笔者认为这是一篇关于“北航黑会”及“广东文革”的相当详实、可靠，极有价值的文献。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武传斌先生在多伦多医院平静去世。享年70岁。也就是说，阿陀先生的这份笔录完成于武先生逝世前两个月，更为珍贵。有关武传斌的生平事迹详见于阿陀《对武传斌的访谈（摘选）》

（三）我们在阿陀、戴维堤文基础上，搞得更细致一点

1、武传斌将“清华会”称为“碰头会”或“非正式的预备会”，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们认为所谓“预备会”一般所讨论的是会议规模、人员、程序等内容，而“清华会”虽然规模小一点、出席人数少一些，程序简单一些，但并没有讨论这些内容，并不具备“预备会”的这些特点。真正的“预备会”是在和平里开的。

请看：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时的一段对话：

康生问朱仁：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朱仁答：4月21日。

陈伯达：你们同谁联络？

朱仁答：我们联络在京的各地造反派。

总理：大家好好听听啊！你们开了什么会？

朱仁答：我们在和平里开了一个会，后改在清华开的。¹

17日召开的“清华会”一开始时就进入了漫谈，并没有更换会议地点的问题。只是因为会议结束时，有人说是被“414”发现了，可能不安全，这才决定第二天的会议到北航继续开。可见“移师北航”只是临时动议而不是原定计划。所以“清华会”本身也可以认为就是正式会，可以包括在“清华—北航黑会”整体框架内。

结论：“清华—北航黑会”的会期是17、18、19三天。

2、“清华会”只开了半天

又据“阿陀访撰”第二部分“阿陀九问”中记载：

¹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记录整理：《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见清华《联合风暴》247期1968-8-1。

武传斌：……基本认同钱文军，第一天预备会应该是17号。但不同意他说有四五十人，开了一整天，控诉很激烈，还介绍“柳州经验”这几条。人数应该没那么多，大约二三十人。也没开一整天，应该只是下午。

阿陀：看“7·25 接见”记录，朱仁回答清华开会是多少人问题时，说是30人。另外，如果是上午开，一批人应该有个如何集体解决中午饭的问题。你记得在清华吃午饭了吗？

武传斌：我和外地造反派不认识，都是通过朱仁去串联通知，陆续来的。也可能上午就有人到了清华，议论（控诉）开了，吃过饭后才把队伍拉过来一块谈。¹

显然，武传斌认为“清华会”只开了半天。

3、戴维堤书中说：“不出韩爱晶所料，据说由于参加会议的有未暴露身份的有关方面的‘记者特务’，所以会议的有关情况很快就被中央知道了，康生、姚文元等人立即表态该会是‘反革命黑会’，背后有‘黑手’。”“下午没开多久就听说中央文革联络员有电话来，不许再开了，于是不了了之。”²

这就是说，中央至迟在19日中午前就发现了“北航黑会”。

既然发现者是“记者”，记者们向上反映情况时当然是会比较详细的。

既然是立即叫停了会议，说明中央高层在第一时间就进行了研究与讨论；

既然在7月20日中央高层接见新疆代表团、7月25日接见广西代表团、“728 召见”中毛泽东与中央高层多次提到这个会，说明中央高层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于是，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¹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² 戴维堤著《逝者如斯》。

“清华—北航黑会”一共开了三天，包括7月17日半天的“清华会”，18日全天、19日大半天的“北航会”。虽然实际时间只有两天，但跨度是三天，仍可认为是三天会。

三、“清华—北航黑会”的起因

当我们将以上两个问题搞清楚后，接下来就应该研究会议的起因。

这是我们的思路。秦文的思路却是接下来讨论“朱仁是不是黑会主席？”

（一）秦文关于朱仁的议论是本末倒置

接着，秦文用较多笔墨议论朱仁。他说：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诬为“黑手”、周恩来指为“黑会主席”的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而是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第42页）

这段议论有三个内容：

① “朱仁并不是四·二二赴京汇报团的正式成员”。我们认为：这是事实。

② “汇报团已经在京多日后，由于南宁事态危急他自己决定上京‘报告情况’”。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而是错误。

据钱文俊回忆，广西汇报团是在7月中旬乘周恩来派的飞机到北京。又据朱仁在725接见时的答话，他早在4月21日就到北京了。此时已在北京将近3个月了。

我们无法了解秦文这样一些低级错误是如何产生的？

③ “甚至连车票也是自己买的”。这有可能是事实，但是废话。

秦文接着说：另一方面，广西四·二二只是受武传斌之邀与会的众多各省组织中普通的一个，既非会议的发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辽宁八三一那样在会有特别敏感的发言。当时七·三布告已经发布，广西屠杀正酷，在京的四·二二人员尽管极感冤屈无诉，

但恐惧远超于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态，哪里还敢挑头当什么“主席”？（43页）

朱仁是否“黑会两主席”之一？这远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呢？秦文又不是为给朱仁的“黑会主席”平反的文章。

文章的正题应该是说清楚会议的起因，及武传斌、朱仁各自所起的作用。

然而秦文对此却阐述不多，即使在不多的阐述中也是“混乱与错误”甚多。

而“阿陀访撰”对此就讲得相当清楚。

武传斌的回忆中有一句非常明确的话：“整个会议我和朱仁是主持人，但我很少发言，就是让大家讲。”¹

武传斌又通过回忆与朱仁的交往，说清楚了“清华—北航黑会”的起因。

因此除了“钱文”外，我们建议秦先生还要再多看一篇“阿陀访撰”。

“阿陀访撰”含许多有关“清华—北航黑会”的研究成果，《血腥之夏》正式发表在“阿陀访撰”一年多后，不知为什么他似乎是根本就没看过。由于秦文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吸收到阿陀先生的研究成果，自己另搞一套，于是“混乱与错误”不仅不可避免了，而且实在是太多了。

这都是“不做功课”之过啊！

“钱文”与“阿陀访撰”这两篇文章都不难找，网上就有。而且“阿陀访撰”同样也是发表在“记忆”上的。秦先生为什么没看过呢？或者虽然看过却草草了事呢？原因只能是一个“忙”字，实在“太忙”了。

可这是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啊！再忙也得找，再忙也得看呀？

想起我们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老作家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刻画了一位大忙人“华威先生”的生动形象，足可为当代的某些学者“写照”。

¹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二）“清华—北航黑会”的起因

“阿陀访撰”揭示了“清华—北航黑会”的起因。在揭示过程中，朱仁对会议的发起与召开的重要作用凸显无疑。

看了“阿陀访撰”后，几乎可以这样说：没有朱仁的参与，历史很可能就没有这个“清华—北航黑会”。

1968年7月初，武传斌和邱学科、林基球等一共七、八个人，带着广东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7月10号到北京，通过关系住在北航。11号给周恩来的一位姓谢的秘书打电话，第二天晚8点就去了中南海后门，通过谢秘书递交了材料，谢秘书答应了一定会转给周总理。

至此，武传斌此行的主要任务就算完成了。他原本就可以回去了，可是他想来一次北京不容易，心中还幻想着说不定哪天总理会拨冗接见他，所以就逗留在京没有马上走。武的这一逗留，偶然地遇到了广西自治区党校教师朱仁，而此前他们是并不相识的。

朱仁是“广西422”的活跃人物，既非“正式代表”，也非“正式代表”的随行人员，既不是“逃难”的，也不是“逃窜”的，他自动来京的目的就是为本派进行“活动”的。他在北京已经80天，认识的人很多，接触面也很广。

武、朱二人各自的活动能量都很大，但各有各的局限性。朱仁虽然认识很多人，但局限于各地在京的零打碎敲的造反派头头；武传斌认识的人虽没有那么多，却层次高，与北京“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大领袖”都有交往，凭着他“广东省革委会常委”的官位想见谁也不太难。

武、朱二人偶然相遇，优势互补，1+1大于2了。

朱仁先是向武传斌介绍了“广西422”的情况，带他去了和平里，参观了那里的“广西422”在京人员“难民营”，“难民营”的悲惨的生活状况感动了武传斌。武原以为广

东的造反派状况就很惨，谁知道发现广西比广东还要惨。历史上从来“两广是一家”，于是武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将“两广材料”集中一起向上反映。

朱仁又带着武会见了来京告状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这些人分散住在各处，各地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见面就诉苦。武毕竟有一个比较显赫的官位，大家见他来了，希望他能设法找人往上反映。武又发现全国造反派的遭遇比广州还要惨，这就又一次感动了武，于是一个新的想法就产生了，他请朱仁联络各地造反派头头，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

“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的想法就是这样酝酿出笼的。

四、“清华—北航黑会”与制止武斗的大形势背道而驰

秦文说：（“清华—北航黑会”）那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38页）

我们的看法与他不同。我们认为“清华—北航黑会”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而且不是中性的，更不是正面的，任其发展，后果也是危险的。

《七三布告》的颁发，标志着毛泽东对“武斗”的态度完成了本质的变化。也只有从这时起，“制止武斗”才成为可能。《七三布告》前后，全国面临的形势是如何迅速制止全国性的武斗、结束全国性群众运动，将政局导向稳定。

而“清华—北航黑会”则与大形势背道而驰，因而对其及时制止是合理的。

（一）从会议起因看

阿陀对这个会有一个定义：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广州“红旗派”头头武传斌（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朱仁一起）7月中下旬在北京航空学院联手召集的一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简单说，就是“7·3布告”后更陷入绝望困境的各地造反派坐到一起交换情况并探讨出路。¹

¹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阿陀的定义下得好：这是一次“交换情况并探讨出路”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

可秦文是怎么说的呢？秦文说：“广东的武传斌就出头让这些难兄难弟们（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搞了个聚会”。（第40页）

秦文“聚会”之说未免失之于“轻佻”了。“清华—北航黑会”不是一个喝茶、聊天、侃大山的茶聚会。

（二）从会议气氛看

从“钱文”看，在“清华会”上最出彩的无疑是“广西422”在柳州的地方组织“造反大军”的头头白鉴平（后来，武传斌回忆说白鉴平的发言是在第一天的“北航会”上）。他介绍了“柳州造反大军”如何被追杀，如何濒临绝境，如何学习毛主席“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终于打出一片新天地。他还得意洋洋地介绍了他们的辉煌战绩，竟将率领武装基干民兵进攻的广西鹿寨县武装部长张春峰击毙在武斗战场上，将他们所指的老保组织“联指”逼逃到柳北，“柳州造反大军”目前已经占领了柳州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盘。白鉴平还讲到取得初步胜利后的“柳州造反大军”如何组织生产、生活、治安等方面的经验。

白鉴平的发言在会上搏得阵阵掌声，各地造反派头头纷纷表示要向“柳州造反大军”学习，坚决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

第二天“北航会”一开始仍然沿袭了“清华会”的气氛，大家纷纷表示要向“柳州造反大军”学习。青海造反派则发誓要立即返回，用柳州的经验武装头脑，组织大家干。还有人要求白鉴平把柳州的经验写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学习。

除了介绍经验外，会议的另一个主题就是诉苦。“诉苦”就是“控诉”，各路造反派的头头们众说纷纭、怨声载道、怨气冲天、慷慨激昂地控诉当地驻军是如何镇压造反派的，抓了多少人，打死多少人，矛头指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控诉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引来“形势分析”与“原因探讨”。有人将全国文革形势

描述得一团漆黑；有人对中央内部斗争情况妄加猜测；有人认为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自相矛盾，是造成军队和造反派对立的根源；有人甚至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本人表示了不满；有人认为中央出尔反尔，搞实用主义，卸磨杀驴，把造反派当替罪羊。

控诉、形势分析、原因分析与“探讨出路”相结合，于是又有高人“出点子、找出路”。有人就像当年“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样提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自己救自己”。

（三）从会议焦点看

正是这样的会议氛围下，当会议进行到18日下午3点左右，“辽宁831”在会上建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请求中央批准，地点设在北航，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这一建议立即引爆全场。

有人反对：五大领袖已经分成天派地派，还怎么去轮流当头呢？

有人纠正：天派地派都是造反派，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打不起来。

又有人反对：清华不是打起来了么？

又有人纠正：414是老保翻天，算不得造反派。

有人提示：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是中央禁止的。

有人反提示：那就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准。

有人质疑：打了报告也不会批。

有人出点子：不如先成立起来，等中央知道了再申报。

主持会议的武传斌后来回忆说：

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提议，是18号下午3点左右，会议差不多结束时“辽宁八三一”提议的。……

谈到这个话题，蒯大富的代表陈岩不出声，很快就溜了，是不是回去请示老蒯我也不知道。我也征求韩爱晶的代表侯玉山的意见，他说：“哎呀，这事可能我们也不敢担啊，

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后来他也走了。当时我说：这怎么弄啊？要是真的要成立，那就看老蒯能不能牵头了？提出成立联络站的事比较突然。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事挺复杂的，得征求井冈山陈岩他们的意见，而且这事也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得由北京的造反派决定。再说我们广东的事已经够头疼了，我也不想揽下来。但是我不想直接得罪各地造反派，结果这事就成了有议无决，没有形成决议。我只是建议大家留下联络方式，以后彼此多联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散会了。¹

当时，中央高层正在聚精会神地逐省解决武斗问题、两派联合问题，以达到早日成立革委会的目的，这就是当时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中央高层高度统一的。可以想像，这项工作是何等艰难！也只有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才有能力担当。连江青也是不敢公开捣乱的。

当这项艰难复杂的工作正日以继夜地进行之时，传来全国造反派在清华、北航开会的消息，这样的时机、这样的人员组成，这样的“诉苦一控诉”的会场气氛，这样的五花八门的出格的言论，这样的焦点话题，势必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警惕；对于“黑会”背后的瞳瞳身影，也势必高度关注。这都是不难理解的。

五、韩爱晶与“黑会”的关系并非如他所言

（一）韩爱晶是怎样说的？

秦文说：首先，7·28召见时韩爱晶就已解释：“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就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

¹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开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之分，很复杂。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学院东方红）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39页）

韩爱晶的解释大家能相信吗？

老实说，我们一开始是相信的。

一方面因为韩爱晶讲的确实很通情达理呀！另一方面也想到韩爱晶毕竟是当着伟大领袖的面，他断不至于在毛主席面前也敢撒谎吧？

然而，我们仍然天真了。

（二）武传斌是怎样说的？

“阿陀访撰”第二部分“阿陀九问”中的第五个问题：

阿陀问武传斌：韩爱晶事前是否说过：“北京开会就是黑会”？7·28 接见，韩爱晶说：“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开会前你见韩爱晶时，他是这么说的吗？

武传斌：这是不可能的，他当时根本没这么说！如果有说过，后面两件事就不可能，一是会场地地点不可能同意在北航，二是他们也不可能派人参加。还不是一般的人，除了段孔莹从头到尾在场，侯玉山作为勤务组第三把手也出席讲话。

武传斌断言韩在“728 召见”时的讲话是“不可能的，他当时根本没这么说”，也就是断定韩当着伟大领袖的面说了谎话。

但是武传斌对韩爱晶的谎话并没有采取谴责，而采取了谅解与包容。武传斌说：“韩爱晶后来压力很大，可以理解。在北航开会，侯玉山也参加了，追查下来，他不得不有个交代，表明自己事前是反对开会的。”

两相比较，我们还是相信武传斌多一点。我们也愿意采取与武传斌同样的谅解与包容的态度。

但是，秦文引用韩的谎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就未免太不靠谱了。

六、蒯大富与“清华—北航黑会”的真实关系

（一）五点理由，判断蒯大富“泼冷水”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

秦文引用钱文俊的话：“有个清华的到场（钱说他不认识蒯大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讲了不长的话，主要就是泼冷水。辽宁八·三一的人提议各省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他大惊失色，表示这绝对做不得。也有人说，全国性组织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个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联络站怎么样？清华的人说那也不行，他们不能参与这样的事。弄得大家很丧气。最后也就是大家发发牢骚，觉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机四伏前途渺茫，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了。”（第40页）

秦文将此人描写成一个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力排众议的人，然后笔锋一转，断言道：钱文俊说的这个清华人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蒯大富。（第40页）

如此重要判断有何根据呢？秦文既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进行任何分析。

这也太一厢情愿了吧，简直到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程度！

我们的看法恰与秦先生相反，这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是蒯大富。

理由一：如果这番话是蒯讲的，那么中央高层早就掌握了，蒯在这一回合中的表现就为他加了分，连同韩爱晶在内也会一起沾光。何以在接下来发生的7月20日接见新疆代表、7月25日接见广西代表的两次会议上，中央高层还会严厉批评蒯与韩呢？

理由二：蒯大富是大名人，认识他的人很多。钱文俊不认识，旁边的人也会叽叽喳喳：听听蒯司令说的啥？可是这个现象并没有出现，可见说话之人是无名之人，更不可能是鼎鼎大名的蒯司令。

理由三：725 接见时有一段对话如下：

总理：你是造反派主席，哪有不参加完会议的呢？

朱仁：后来就改成广东旗派掌握的了。

总理：清华是谁去的？

朱仁：蒯大富去的，他说了几句。

康生：他说什么？

朱仁：蒯大富说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康生：哪两个司令部？是不是你们的司令部同我们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

姚文元：那你谈谈哪两个司令部是怎样斗争的？

朱仁：我记不清楚，他只说了几句。

据此分析：

① 蒯在会上谈“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确有其事的。如果没有，朱仁何苦没事找事地要编造这样的谣言？而且这样的谣言，朱仁也编造不出来。

② “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当然是十分敏感问题，蒯不可能长篇大论。朱仁说“他只说了几句”是符合情理的。

③ 虽然是几句，毕竟有几句。何况时间刚过去一个星期，朱仁对此是有记忆的。朱仁说“我记不清楚”，当时是情急之下的遮掩，既反映了朱仁的恐惧心理，也反映朱仁“大事化小”的理智。

④与会高层人物，无论是周恩来、康生、吴法宪都在这个问题上适可而止地转移了话题，说明了这些人物都认为这个问题在当下是不能深究的。

理由四：据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第 372-373 页记载：

7月23日：传来消息：

1) 总理对新疆代表的讲话。

2) 蒯、韩在北航开“造反派组织会议”，蒯作了发言：

①除河南、青海外，全国现在是保守派掌权；

②现在不是中央支持造反派的问题，而是反之；

③全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内战。

邱原书中的这一记载与朱仁的答话是吻合的。

理由五：武传斌回忆说明了当时的蒯大富并不在现场。

武传斌说：“北航18和19号两天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北航第一天上午。他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当时会上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武传斌还说：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提议，是18号下午3点左右，会议差不多结束时“辽宁八三一”提议的。……

可见蒯大富出席的是上午会议，上午就走了，怎么可能在下午3点后又重新出现在会场上呢？

据此五点理由已经足以说明秦文关于蒯大富“泼冷水”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同时也说明了前文中秦对蒯的采访中蒯的回答也是弄虚作假，没有价值。

那么钱文俊所说的这个发言者是谁呢？根据戴维堤《逝者如斯》，有可能是北航的祝春生。

《逝者如斯》在详述了祝春生讲话的内容与过程后说：“祝春生一番云山雾罩的发言，把外地造反派头头们骂得目瞪口呆，很不自在。许多外地造反派头头们起哄，中断了祝春生的发言。最后会议不欢而散。”¹

¹ 戴维堤著《逝者如斯》。

戴书中还有一段话：“谢天谢地，幸亏祝春生代表北航红旗作了这个发言，好歹总算同外地造反派的言论划清了界限。据说后来康生看到了记者上报的会议内容后，说：‘这个北航头头的发言还差不多。’”¹

秦文有可能将祝春生的这段话嫁接在蒯大富身上了。

但是这里又发生了新的矛盾：祝春生的发言也是在下午三点前，也没有涉及“联络站”的事。

所以这个人如果不是杜撰，只能是另有他人了。

但总之，绝不可能是蒯大富。

（二）反复唠叨，秦文竭力淡化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

秦文说：七·二五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恩来对情况已经很清楚，……但无论蒯大富还是韩爱晶，清华（井冈山）还是北航（红旗）都不是会议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第39页）

秦文又说：这份接见记录表明几点：1，“中央首长”们认定广西的问题并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统一的“黑司令部”，而“清华-北航黑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2，清华（当然是指“清华井冈山”）与蒯大富被置于这个“黑会”的重要位置。而且从反复点名追查清华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陈伯达提出韩爱晶和蒯都要“去劳动”外，当场再没有人提到韩，除并列指责“清华、北航”以外也没人单独提到北航，却几次单点了清华）的语气看，中央首长们已经完全把其看做整肃对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广西人那里，陈伯达还明确说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第39页）

秦文还说：……清华连接待方也不是……清华与这个会的关系比北航更淡薄。……但实际上，从七·二五接见时周恩来指责“清华、北航的黑串联会”，吴法宪说四·二二是”

¹ 戴维堤著《逝者如斯》。

向清华、北航汇报”，其他中央首长也反复追问清华有谁与会、蒯大富讲了什么，直到7·28召见时毛泽东指责的“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显然当局追究清华和蒯大富要甚于北航和韩爱晶。（第43页）

为了说明蒯大富是被遭中央高层误解和冤屈的，秦文反复唠叨蒯与这个会的关系比北航更淡薄。

我们的看法与秦先生恰相反，我们认为尽管后两天的会议是在北航开的，但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仍然比北航更令人瞩目。请看我们的分析。

（三）蒯大富与“黑会”关系的探究

1、会议通知是以蒯大富的名义发的

从武传斌与朱仁商定要开座谈会到“清华会”的召开，仅仅只有两、三天或三、四天时间。通知全国各地在北京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作全都由朱仁负责，武传斌的主要工作是继续与“五大领袖”联系。武传斌再次分别找了韩与蒯，得到了同情与支持，蒯、韩分别应允提供会议场所，并派人承担接待工作。

钱文俊“从黑会到接见”一文中回忆了他被通知参会的主要过程：

“大约在7月16、7日，白鉴平过来通知我去他的房间，到那里发现已经坐了许多人。高天寿正在说什么。大意是：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邀请了广东旗派、青海八一八、徐海踢派、四川反到底等各地造反派主要负责人，希望我们也去参加。……高天寿解释说，现在全国的老造反派都处于受压状态，北京的‘天派’同情各地老造反派的遭遇，需要收集一些具体情况，通过他们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把各地情况报告给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以改变这个状态。”¹

¹ 摘自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接见”》。

“清华的蒯大富召开座谈会”，这既不是武传斌和朱仁的话，也不是钱文俊的话，而是钱文俊引用高天寿的话。

高天寿的话从哪里来？有可能就是从会议主要联络人朱仁哪里来的。

朱仁的话又从哪里来？也许是他个人编造；也许是他与其它人的共同编造；但也很可能来自蒯大富本人的承诺：你们就说这次会是要召开的。

这样的话，蒯大富是说得出来的，这太符合他那张扬、狂妄的个性了。

这样的事，蒯大富也是做得出来的，而且他曾经就这样做过的。

1967年7月30日，蒯大富曾在清华主持召开过一次“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蒯大富在会上说：“下一年的战斗任务 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号召揪出徐向前，批倒批臭，并“表示清华红卫兵下去与外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¹当然，1967年事并不代表1968年一定会发生，但至少可以确认一点：这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是打着蒯大富的旗号通知并进行的。而且，第一天会议在清华召开的事实，第二天蒯大富带领鲍长康高调出席“北航会”的事实也佐证了这一点。

有了这样的事实，蒯大富“召开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的信息就不会是空穴来风。

2、“五大领袖”中只有蒯大富参加了

第二天在北航开会时，韩爱晶一直没有露面，二把手井冈山作为东道主“北航红旗”和韩爱晶的代表，端坐在主席台正中。

盘点一下“嘉宾”有几许？唯有蒯大富！

蒯大富不仅自己来了，居然还带来了二把手鲍长康，当然还有其它随从。这样一来，清华井冈山的大当家、二当家就成为会议的主要嘉宾，蒯司令与鲍长康同时被邀请在主席台上就座。

¹ 参阅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236页参阅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236页。

会前，武传斌给北师大谭厚兰也打了邀请电话，谭厚兰表示不会来参加。实际上是态度鲜明的“断然拒绝”。

会前，武传斌再次找了地院王大宾。王大宾说你们到地院开，我一定来。实际上就是态度暧昧的“委婉拒绝”。

武传斌心想北京“天派”与“地派”势不两立，如果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用不着权衡，蒯大富的影响当然比王大宾大得多，所以武传斌决定宁愿在北航开。

武说：“这事是我定的。我和不了这个稀泥。”¹

可见，如果不是考虑到蒯大富的个人因素，会在地质学院开的可能性也存在。这样一来，王大宾也没有参加这个会。武传斌回忆说：我记得开会时王大宾还是派人来了，只是在会上表现不大明显而已。²

至于聂元梓，武传斌就根本没有与她联系。

“五大领袖”中只有蒯大富一人出席了这个“全国造反派座谈会”，你说这个蒯大富，他是扎眼不扎眼？

这样的事实，周恩来能不掌握吗？周恩来会怎样想？中央高层又会怎样想呢？

3、蒯大富在会上讲“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再重复一下“阿陀访撰”中武传斌的回忆：“北航18和19号两天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北航第一天上午。他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当时会上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首先，这段回忆肯定了蒯大富是讲了话的。那么是否只讲了这一句呢？这可不一定了。因为他毕竟呆了大约一小时；蒯大富是否会长篇大论呢？也是不一定的，因为他毕竟只呆了大约一小时。

¹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² 参见阿陀采访撰写：《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蒯大富讲话除了表示欢迎、支持外，有没有其它的内容？这也是可以肯定有的，那就是朱仁所说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前述邱、原的书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在“728谈话”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倒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

林彪笑着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恩来说：“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主席说：“又说是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所说的这段话反映了在“清华—北航黑会”上蒯大富所谈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的一些内容，也反映了会上其它人就此话题展开的议论的内容。

4、外地造反派瞩目于蒯大富

武传斌回忆中说：谈到这个话题（即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蒯大富的代表陈岩不出声，很快就溜了，是不是回去请示老蒯我也不知道。我也征求韩爱晶的代表侯玉山的意见，他说：“哎呀，这事可能我们也不敢担啊，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后来他也走了。当时我说：这怎么弄啊？要是真的要成立，那就看老蒯能不能牵头了？提出成立联络站的

事比较突然。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事挺复杂的，得征求井冈山陈岩他们的意见，而且这事也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得由北京的造反派决定。

可见，包括武传斌在内的外地造反派都将“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能不能成立得起来寄希望于蒯大富的。

外地造反派为什么寄希望于蒯大富？

第一是由于蒯大富的名气大、影响大。

第二是因为蒯大富的胆子大，真敢干。

在蒯大富那里，支持全国造反派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而是有实际行动的。

当年住在10号楼的贵州411的一名骨干人物曾发表文章说：他们“在清华大学成立统一组织‘贵州411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把十号楼全部借给我们在北京设立联络站”；“十号楼鼎盛时住了一千多人，其中一楼和二楼分别住有‘广西四二二’、‘重庆反到底’、‘四川红城’、‘云南八二三’、‘湖南湘江风雷’、‘哈尔滨红旗’等其他省同我们一样命运被赶出家门在京设立的上访联络站。”

蒯大富支持外地造反派，外地造反派也支持蒯大富。两者的相互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他们有共同的文革理念，他们也是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在清华“百日武斗”中，团派的武器优势为什么这样大？还不是他从外地造反派那儿弄来的。他们用外地造反派输送的大量枪支弹药封锁了科学馆，打伤打死了414的人。

在“727事件”中，抵抗还击工宣队的“团派武装”中就有数量不小的外地人武装，最先用手榴弹炸死、炸伤工宣队员的就发生在“外地造反派”集中居住的10号楼。

我们再将蒯大富与“清华—北航黑会”的关系罗列一下：

- ① “全国造反派座谈会”是以蒯大富的名义通知召开的；
- ② 蒯大富答应他们在清华开会，提供会场与服务，第一天会议也是在清华开的；
- ③ 第二天的“北航会”，“五大领袖”中只有蒯大富出席，而且还带了鲍长康；

④ 蒯大富在会上讲了话，而且讲的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样的敏感问题；

⑤ 会上提出了要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建议；

⑥ 全国造反派瞩目于蒯大富，将“全国联络站”能否成立寄希望于蒯和韩。

这样一梳理，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由此而凸显，周恩来与中央高层反复追查蒯大富与黑会的关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结语：著书立说者应该有怎样的坚持？

老实说，读秦晖先生的这篇《血腥之夏》是一种痛苦。

让我们备感惊讶、也十分不解的是：如此知名的学者怎么会写出如此“混乱与错误”的学术论文来？

还让我们备感惊讶、也十分不解的是：国际上研究文革的学术界又如何能接受如此“混乱不堪”、“错误百出”的学术论文？

文革过去整整半个世纪了，反思，反思！反思？50年的“反思”捧出来了的竟然有一件如此这般的“代表作”？！

初中时期，在我所搜集的谚语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能品味食品滋味的是厨师；最能品味人生滋味的是作家。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一般将“作家”看作是一个高尚的职业，而把“厨师”看作是一个世俗的职业。这条谚语提示我们：高尚与世俗之间的一些道理是相通的。

十多年前看韩剧《大长今》，前半一半就是讲厨师的故事，后半一半讲医生的故事。剧中充溢着许多人生哲理，值得我们再三地去品味与回味。

比如有一集写到韩尚宫与长今师徒冒着风险，坚持拒绝为患有糖尿病的明朝使者做山珍海味，最终改变了使者的不良饮食习惯，促使了使者的觉悟。

这里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使者问长今：我毕竟不是朝鲜人，也不会在这个地方久留，我喜欢吃什么，你就随我的心意呈上来就好，为什么如此固执呢？

长今答道：奴婢只是遵从韩尚宫娘娘的教导。

使者问道：什么教导？

长今说：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千万不可以呈上对吃的人有害的饮食，这就是做食物的人该有的坚持。

我们想：“做食物的人”都应该有所坚持，那么“写文章的人”又该有怎样的坚持呢？

愿以此结束语与诸位同道者共勉！ ■

2016-11-11

【评论】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理论分析

陆伟国

一. 红卫兵的社会思想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出现的这场红卫兵运动，作为左倾暴力的极端典型，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尽管国内还很少有专著、论文对此作专门的论述，但如同“文革”中的派性组织一样，将会给以后的人们留下研究政治、研究历史、文学创作以无尽的材料，使人们能认清很多问题。

本文无意对红卫兵问题作全面的论述。如果要对“红八月”的这种恐怖现象，进行社会原因分析的话，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流氓无产者”的意识和行为对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既高度专制又极度贫困的社会里，有一大批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他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不但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固定资产可言，连最起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都没有，过着有今天没有明天的日子。他们除了仇恨和拳头之外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观念狭隘，崇尚暴力，思想偏激，行为极端，急于改变现状而可以不计后果，蔑视各种规则，敢于铤而走险，甚至仇视社会，想毁掉在他们面前出现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只知道通过损毁别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从不知道妥协和退让，更不知道和谐、共赢和多元化。这种意识是封建思想在底层社会的表现。看起来和帝王思想水火难容，实际上两者是经常相互利用、相互推动，甚至合为一股。

他们的革命性表现在敢于推翻一个旧朝代。“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他当得皇帝，我就当不得？与其他当，不如我当。可是，他们的局限性也正在于此。他们的革命只是换了一个皇帝，换了一个朝代，由他来当。至于这个新皇帝当得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全赖于他的个人品行。老百姓们有切身感受，当然也知道。但是，知道了，也晚了，没有用

了。治理社会的权力始终没有交给老百姓，哪怕是历尽千辛万苦、追随他们革命的老百姓。甚至连一起出生入死、共同奋斗的亲密战友，也不肯给一点。对于这些流氓无产者，如果引导得法，则可以作为社会革命的一支力量；反过来也极有可能被人利用，成为一股反社会的逆流，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破坏性。

今天，说起这些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行，还有些情况令人非常不安：一些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还在回避、不肯加以谴责（他们可以回避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当然也可以回避十年浩劫中各处肆虐的暴行），而一些没有经过这些事情的无知者则在喊叫着：文化大革命好得很，还没搞彻底，再来一次。这样下去，不用二十年，就会有人把这十年浩劫也说成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还会把这些红卫兵极端分子说成是意气风发的革命小将，“文革”中的某些惨痛事件说不定就会重演。这是最需要引起人们警觉的。

到了当代中国，尽管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也很少有人真的处于这种赤贫境地，甚至身处高干家庭、天天锦衣玉食，但这种思想意识和行为做派，却依然随处可见。在极左势力的鼓动之下，其破坏性倒是愈演愈烈。部分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暴戾行为，就是一例。

就是在今天，流氓无产者的意识依然有很大的市场。在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对这类行为和意识的过度表现、大肆渲染和太多太多的无原则吹捧。所谓的武侠，其实就是这样一批人：他们不务农、不做工、不搞学问，整天打打杀杀，最终不过就是或为盗贼或为地主鹰犬。这些影响，从网络上的一些语言暴力到个别颇有身份的人的出格表演，从宁左勿右不负责任的偏激到打着所谓爱国主义旗号肆无忌惮的伤人砸车，都能看到这些影子。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绊脚石。在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里，就有秦德才这样的流氓无产者的反面典型，和虽然身为局长而内心却依然是这类意识的程贵安。现在一些拥护极左的人，从思维模式到腔调、做派与当年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毫无二致，但是却没有人家那种政治优势，只能在那儿声嘶力竭地干嚎而已。

二. 社会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结构，简单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领袖层、执行层和民众。领袖层，或叫领导层，是指对国家大事有决策权的人。在民主体制里，它是一大群人。它本身就有完整的结构，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专制体制下，它集权于少数几个人，甚至集权于一个人，那就是独裁。他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比如皇帝。所谓的替天行道，纯粹是个胡编的幌子而已。

执行层，就是按照领袖层的要求，对社会进行具体管理的人。在我国，就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各级领导。这个群体既要向领袖层负责，又要向民众负责。但是，它既可以是勤勉的仆人、负责任的管家，也可以慢慢地自我膨胀起来，变成既独立于领袖层，又独立于民众，而志在攫取自身的超额利益，这时我们就叫它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它是否能存在以及独立的程度、攫取利益的能力，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知，执行层与领袖层的关系，可以是委托治理的关系、共事的关系，也可以是雇佣关系，也可以是主仆关系，甚至在皇权专制下几乎就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哪怕是宰相也不过就是个奴才。当然，也有反过来，连领袖层也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成了它的代言人。所以，在执行层与领袖层之间也有各种矛盾。在民主体制下，相对来说，这种矛盾它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化解的渠道。但是在专制体制下则不然，这种矛盾往往无以为解，非得搞到鱼死网破，其激烈的程度，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们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从某种角度看，也是这种矛盾没能处理好、不断激化的结果。一方面，领袖层与执行层的界限在逐渐上移。随着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发展，到1964年，“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变成了“毛主席、党中央”。中国的领袖层显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了。另一方面，由大跃进的失败而造成大饥荒的严重后果，导致不但是民众，而且在执行层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左倾政策表示不满，而这又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领导层与执行层的

矛盾迅速升温。毛把刘邓看作是执行层的代表和首领，当然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他俩就不奇怪了，尽管那时很多人还以为刘邓是领袖层里的人。

然而，毛泽东要打击的远不只是刘邓两个人，而是在他看来已经并不完全听命的整个执行层。所以他抛开各地各级所有的党政系统，自下而上地发动“文革”，把几乎所有的执行层无一幸免地全部扫荡在地。当然，问题的本质不在于领袖层与执行层的矛盾，而是在更深的层次。当时的执行层，就绝大多数来说，并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后来能拿得出手的批判材料也说明了这一点，几乎没找出哪个当权派真的是“走资派”。所谓防修反修，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不过是由头而已。毛泽东这样做，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效果，都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到“文革”中后期，刘少奇、林彪相继垮台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对这个执行层的机制、职能、体系作任何有意义的调整，只不过是换了个“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在他看来只要夺了权，能指挥得动，就行了。尽管他当时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做，但是没有，而是忙着搞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去了。有人为“文革”辩护说，“文革”是冲击官僚体制、打击官僚集团，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冲击执行层，只是部分的表面现象。

中国之所以出现“文革”，原因是很多的。这儿讲的是从治理结构失衡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视角，或许能解释一部分问题。笔者认为，“文革”这一现象要从多个角度去看。而且从治理结构这个角度来观察今天的社会现象，倒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三. 红卫兵的三种类型

红卫兵也是个混杂的群体，里面有它不同的类型。这里想从社会治理结构的角度，谈一下红卫兵的分类。

一是早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他们是执行层里高级官员的子女，比起普通民众最接近于领袖人物，最早得知领袖人物的某些想法。于是就急于跳出来表现自己，所表现的方式，

也是专制体制下那种特有的极端行为。高干子女红卫兵是“文革”急先锋，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虽然其性质也是个群众组织，但比起后来几乎全社会都参与的群众组织，不是一回事。然而，他们虽出自于高干家庭，知道的内情要多一些，但终究只是知道领袖的某些想法，而不是全部想法，尤其是更不知道、也不理解领袖深层次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们高喊的造反并不是毛泽东要的造反，他们也就不可能去完成毛泽东讲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任务。所以，当“文革”的矛头指向整个执行层时，包括他们自己的爹娘时，他们傻眼了，不知所措了，甚至也知道要起而抗争了。不过也没有用了，那么快地就被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堆。说起来，从法律角度讲，红卫兵不过是个非法组织。它的出现和它的消亡，同样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这儿所讲的高干，也是相对而言，不是像组织部门划得那么清楚。那时规定行政13级以上为高干，而高干子女的“高干”是相对而言的。在那些将军之子的眼里，13级算什么。而在县城里，他爹是个股长，就不得了啦。一般来说，此处的高干子女，就是不同于平民子女，也不同与一般干部的子女，可以叫做领导干部子女红卫兵。到“文革”中后期，他们为扩大队伍，也逐渐接收一些中干、乃至普通干部的子女。但那时，他们作为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特征和作用，已经大为减弱了。

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后期分化、重新站队，不在本节分析中。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父母后来的不同遭遇（如：解放的早晚、新给的官阶的大小、前后的反差等）有很大的关联。

二是保守派红卫兵。在那个体制下，执行层的下层和民众里，也有相对获益者、或自以为获益者，在“铁饭碗”里还有几粒可怜的米。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左倾做法的真实意图，只是想维持原有的秩序，在相对还有点了解的现有干部的管理下保持住那点可怜的利益，生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当然更多的是在响应号召，随革命大流。这就是1966年8月下旬以后大量出现的普通干部和民众子女的红卫兵。他们也喊着“文革”的口号，但没有那种激烈的行为。他们既不满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嚣张与傲慢，也反对改变现行的社会结

构和社会秩序，反对后来出现的可能会动摇他们现有（哪怕是很低的）地位的造反行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保守”的。说明一点，这儿和后面所讲的“保守”与“造反”，没有褒贬之分。保守派红卫兵，与作为“文革”标志性事物的高干子女红卫兵相比，其特征要平淡得多。这是第二类红卫兵，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红卫兵。

三是造反派红卫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对执行层的打击已从彭罗陆杨少数头面人物，向上直指刘邓，向下则开始了对各地各级执行层的全面扫荡。这时，极左势力既不能借助高干子女红卫兵，也不能借助保守的红卫兵。第三类红卫兵，此时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在专制体制下相对受压抑者或他们的子女。他们受到过各级执行层的直接压制和打击，他们是红卫兵群体中真的造反者（此处无褒贬之意）。1966年9月6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就是个典型代表。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该说，是他们最能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此时，他们这批红卫兵的内在含义已经和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完全不同了。当时，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然而，却也是最倒霉、最被愚弄的一批人。前面对红卫兵的某些叙述已经不适用于他们。对他们的阐述可以看后面对造反派的叙述。

还得说一下“三司”。北京高校红卫兵最早成立的联合体是8月27日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一把手是汪延群，二把手是刘平凡。由于“一司”容纳范围太小，另一些高校红卫兵在9月5日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临时指挥还是人大的周太安同学（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很快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召集人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这三个红卫兵群体，与这儿讲的三类红卫兵不完全是是一回事。“一司”、“二司”基本上都是第一类的。

当然，这三类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他们的组成和思想认识常常是相互交叉，有时还会相互转化和演变的。

四. 不赞同另一种分法

“文革”研究专家卜伟华先生 2007 年 9 月在香港科技大学所作“‘文革’与红卫兵”的讲座中，对红卫兵运动做了很翔实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但他把红卫兵分成这样的三类：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这一点，笔者不能赞同。

一是，他把 8 月 18 日前成立的他称之为的“老红卫兵”放在保守派红卫兵中，是不妥的。老红卫兵的特征，就是用“血统论”和“阶级斗争理论”纠结起来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在各省也有一些当地的高干子女红卫兵，尽管是在 8 月 18 日之后成立，但其性质是和老红卫兵完全一致的。这些红卫兵决不是“保守派”。说他们是“保守派”，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正是他们，最早扯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打砸抢烧杀抓，是他们先搞起来的（当然不是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搞）。只不过他们造反的对象是早已打翻在地、毫无还手能力的“牛鬼蛇神”，而不是毛泽东所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所要打倒的对象，包括了他们的爹和娘。这是他们这批红卫兵起来造反时绝对想不到的。由此，引起他们政治态度的急剧改变。但改变后的态度，也并不“保守”。把高干子女红卫兵也划入“保守派”红卫兵，恐怕是想减少对他们在恐怖“红八月”中所犯罪行的关注和谴责。

二是，卜先生把“五·一六”分子单独列为一派，叫极左派红卫兵。笔者认为，“五·一六”分子这些显然已经不属于红卫兵运动了。卜先生为“文革”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很多资料也很有价值，很多观点我也赞同。但他对早期红卫兵（包括西纠、联动这些）的错误、乃至罪行，轻描淡写，有所回避，令人遗憾。

所谓“五·一六”，是这么回事：1967 年 6 月 18 日，北京钢铁学院张建琪等组成“五·一六”红卫兵团，人数不足百人，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当年 9 月，便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无论从成立时间、参与人数，还是社会影响，都不足以单独列为一类红卫兵，而且也已经不是红卫兵运动的范畴了。倒是极左势力借此由头，大造声势，把这一事件加以扩大化，以表明自己也是在批极左。1970 至 1974 年间，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清查“五·一

六”分子，被审查人数达数百万，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请见：《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

五. 中学红卫兵与大学红卫兵

上面讲的对红卫兵的分类，是从政治态度而言。顺便讲下，从学历层次（或是年龄层次）的角度，还可以分为大学红卫兵（以四十年代出生的为主体）和中学红卫兵（以五十年代出生的为主体）。相对来说，大学红卫兵因为年龄稍长，学识稍多，因而相对要理性一些，对老师、领导干部的批斗相对要平和一些（这在同样是大学里的高年级和低年级学生之间也能看出不同）。而中学红卫兵“革命热情”则要高涨得多，头脑简单得多，行为更加张狂而缺少自控。那些高干子女红卫兵，则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从总体来说，五十年代生的那批人，是共和国历史上人生起伏最大的一代人，是命运最悲催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文革初被卷入革命狂潮，没学到多少知识文化，文革中后期又被无情地赶下乡。改革开放后，好不容易回了城，没有好单位不说，被第一批下岗潮淹没的又是他们。他们没有得到多少改革的红利，却又是最早被改革所淘汰。

当然，他们又是分化得最厉害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上所述，落在了社会底层。另一方面，今天走上领导岗位的，又有不少就是当年的中学红卫兵，有权有钱的，不少是他们。但这些“功成名就”的，主要是得益于他们的“红色家族”。而真正靠自己下海打拼，能发家致富的，在社会上是凤毛麟角。

再说得深入一点，这些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中学红卫兵，能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得逞于一时的，不过是中学红卫兵中的一小部分，即还是高干子女那一部分。说到底，红卫兵的分类，其实就是他们（或他们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的分类。在一个开放程度不够的社会里，社会阶层有所固化，两者呈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在一些红二代、富二代的身上依然能看到当年中学红卫兵的一些做派和影子，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述 往】

难忘的燕园 · 1969 年（二）

吴 琼

第三章 逃离燕园，在北京电报大楼和中山公园

上交材料之后，我想就应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想自杀以前，还应该给母亲和亲友们留下遗信，而遗信还必须能够让她们亲眼看到。所以，我想首先要逃离燕园，去市里北京电报大楼写几封信——这些想法，都是我在写交代材料之前，早已盘算好的。

而燕园又是可以逃出去的。我逃离燕园之前，已经分析过对我有利的三个条件或因素：其一，我刚刚交出交代材料，专案组 和红卫兵们决不会料到我在交出材料之后的第二天就逃出燕园；第二，东语楼里有两个楼梯，一个在东头，一个在西头。红卫兵值班室设在一层的西头，西头是哲学系监管所，他们对一层西头的那几个教室和房间把守得很严，但是，往往不注意一层的东头——而我只要登上一层西头的那个楼梯，上到东语楼的二层或三层，再从二层或者三层东头的那个楼梯沿梯而下，会很容易地到达东语楼一层的东头，进一步走到东语楼的楼门；而这个楼门平日又很少上锁，这样，我就会凭运气走出监管所；其三，两个多月来，我已身无分文，所幸妹妹和弟弟探望我时，给我留下 10 元钱。这宝贵的 10 元钱，足够我逃离燕园后乘公交车、买信封、信纸和邮票用的了。

1969 年 1 月 4 日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日子。那天清晨 5:30，东语楼内的一层一片漆黑，夜里值班的红卫兵有的还在睡觉，有的刚刚起床；监管所里的一两个犯人刚刚去洗手间洗漱；只有吴允曾先生早已醒来，轻轻地咳嗽，仿佛在警告我不要轻易妄动，然而，我已经顾不得这些了，我决心冒一次险。我在黑暗中穿好一件草绿色的绒里夹克，衣兜里揣好妹妹和弟弟给我的那 10 元钱，若无其事地走出房间，只见长长的楼道空无一人，只是洗手间

那里露出些许昏黄色的灯光和一个洗漱人的身影。我蹑手蹑脚地踏上洗手间后面的那个楼梯，上到二层；二层更是一片漆黑，一派死寂。我来到二层东头的那个楼梯，顺着楼梯下行，到达一层的东头——只见一层的西头有个刚刚起床的红卫兵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但是，他并没有发现我是个他应该看管的犯人，他扭头又朝西头的那个洗手间走去——于是，我加紧了行动脚步，拐个弯儿，飞快地奔到东语楼的门前。上天保佑！这个楼门果然没有上锁。

我一步跨出东语楼，回手轻轻把楼门关上，朝楼外东西两个方向望了望：只见东边的办公楼西南角的一个窗口，一道日光灯的灯光穿过一小片冬季里的晨雾，有几个蛾子在晨雾中飞舞；西边的北大西校门，只有半扇大门紧闭，而另一扇大门洞开。于是，我像一个早起锻炼身体的学生那样，边走边做扩胸运动，伸出双臂双手，又缩回双臂双手，我非常顺利地走出校门，再穿过蔚秀园，经过彭老总住过的挂甲屯吴家花园的那条土路，终于，来到一片极其开阔、黑黝黝、到处堆有零零碎碎雪堆的旷野里……西面的玉泉山上，有一两点微小的灯光忽明忽暗；东面的市区方向，有一小片湖水般荡漾的黄色灯火。因为是在冬季的清晨，天色还昏黑，我便朝东面市区那一片鱼鳞般闪耀着灯火的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去……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个人有自由是多么可贵啊！尽管是在严冬雪后的清晨，我只穿着一件绒里夹克，但是我不怕寒冷，一边奔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旷野里的新鲜空气——但是，我也到了即将结束自己年轻生命的时候。想起“文革”以来的许多事情，尤其是想起这次被“政治审查”以来的种种遭遇，我感到太不公平，我有满腔的怒火、悲愤和委屈，一路上不禁痛哭流涕，热泪不断夺目涌出，潜潜而下，泪水把绒夹克的前胸打湿一片……

天色微明时分，我发现已经幸运地来到高中母校北大附中的所在地——黄庄，而且，一辆几乎无人乘坐的32路公交车，正朝黄庄车站驶来。我连忙跑几步，一脚踏进车门，随便找个座位坐下，用衣袖擦干脸上的泪水……32路公交车不紧不慢地向前行驶，我不时张望车窗外平日那么熟悉、现在变得那么可亲可爱、今后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各色景致……

公交车已经到了北京动物园，我从动物园下车，上了另一路公交车，倒车两次，终于，来到西单高高耸立的电报大楼。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电报大楼里歇息片刻，我要写几封信，留下遗言，把遗信发出，然后，自杀。

因为还是清早时间，若大的电报大楼营业厅里只有两位营业员，一位在柜台后的一个角落里打盹，另一位低头整理邮件。我买了三个信封、几张信纸、三张邮票，随后，在大厅中央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旁，在一盏绿色台灯温煦灯光的映照下，站着写信：一封写给养育我多年、为我操碎了心的母亲；一封写给我心心相印、但不幸患有心脏病的未婚妻；另一封写给我的男友、情同手足的高中同班同学梁宝璟，他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已经分配到云南楚雄，在一个工厂的职工子弟学校教书。

我边哽咽，落泪，边把三封信写就，把三张邮票也贴在三个信封上。可是此后，我却开始犹豫，不知应不应该就这样把三封信全部发出。我设想她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和病中的未婚妻，接到这种信以后的反应，可能继而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反复思考后，我撕掉两个贴着邮票的信封，把写好的三个封信合叠在一起，都塞到那封寄往云南楚雄的一个信封里，把这封信果断地投入到信筒里——这时，营业厅的顾客已经多起来。我便走出电报大楼，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开始在西长安街以南的人行道上散步，边走，边痛苦地思索……

是的，自杀前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再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的心终于踏实下来，头脑也冷静多了。可是，现在，我究竟应该到哪里、以哪一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而且，不结束自己的生命就不可以吗？要知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保尔·柯察金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些话，是我少年时代就背读过，一直引以为生活座右铭的。要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一去就不会复返的啊！况且，二十四岁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与“虚度年华”、“碌碌

无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从少年时代便立下的雄心壮志，难道就这样烟消云散、化作一团泡影吗？就让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吗？这不是一种自我背叛吗？——然而，反过来，我又边走边想：此时如果不及时结束自己的生命，又有可能，不，一定会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可怕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身上戴着一副有形、无形的“反革命”枷锁，在这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环境中，一个“反革命分子”又怎样才能够有意义地度过一生，活得有些价值呢？

我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在逐渐热闹起来的长安街人行便道上，边走边想，所有的人和物，统统视而不见；所有的声音，统统听而不闻，心中痛苦极了，也矛盾极了……

忽然，脑海中金光一闪，我停下了脚步。我想到，在这生是死的人生紧要关头，不可以只是由我一个人来决断，而应当听一听他人的意见。而这个人必须正派，是个具有社会常识判断力的普通人，而且，还必须是一个北大军工宣队料想不到的、即便抓到之后也奈何不了一个普通人，于是，我想起了我在北大附中上高一时的一位同班女生郑金玲。当时，我和郑金玲都是班上的文艺委员，她在高考时，没有考上大学，在海淀区少年之家做音乐教师和舞蹈辅导员，“文革”后转为北京海淀区的一位小学教师。在“文革”中，她多次来到燕国，向我了解运动的情况。她为人真诚、冷静，或许能给我帮助。幸运的是，我还记得她所在单位的电话号码。于是，我又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回到电报大楼营业厅，拨通了她的电话。

“是谁呀？”

“是我。”

“这么早就来电话，有事吗？”

“有事，要紧的事，非常要紧。请你赶快来西单电报大楼。我在营业厅等你，要快。”

“就那么要紧吗？——好吧，我恰好一天没课，就去。”

一个钟头后，郑金玲便赶到。我情绪激动地向她诉说了事情的经过、目前的处境、生与死的心理纠结。她一直认真倾听，不置一语。我俩从电报大楼沿着人行道朝东走，一直

走到中山公园，买了门票，来到公园以西的水榭，落坐在一条三面环有树木和灌木丛的绿色长椅上。

天气很冷，阴冷阴冷的，是一种侵入人的骨髓那种全身麻冷。郑金玲身穿一件长长、厚厚的紫红色棉猴，头上还裹着一条长长的、深红色的毛围巾。她见我只穿一件御不了寒的绒夹克，没戴帽子，光着头发，双耳和脸颊冻得通红，边说边浑身打哆嗦，便果断地拆下棉猴上的棉帽，侧过身来，把棉帽罩在我的头上。然后，她才坐好，开始用一种不容置疑的严肃口吻对我说道：

“你的决定不对！事情也许还会有变化、有转机。他们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吗？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亏你还是个哲学系的学生，你不是坚信唯物主义吗？——你说的那些‘反动思想’，目前很多人都有。我承认，我自己就有一些，可是，我就不认为自己是个反革命……”

她忽然落泪，继而放声恸哭，又仰起头，遥望天空一点，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场运动就是有问题，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让人无法理解：批斗，抄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这叫‘文化’革命吗？全国武斗成风，到处停工停产停业，社会秩序大乱，有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含冤而死的惨事发生啊！你们只在学校里搞运动，哪里了解社会上发生的那些无法无天、骇人听闻、使人不敢相信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总会这样折腾下去，是是非非总会弄清楚，总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一天。你一定要等待那一天的到来，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要想到死。要咬紧牙关活下去，就是开万人大会批斗你，把你投入监狱，带上手铐脚镣，你也要坚持活下去。别人能坚持，全国那么多人能坚持，你就坚持不下来，受不了了吗？”

可是，也就是在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发觉周围的情况不对。我猛一抬头，突然看到在我面前的正前方，站立着怒气冲冲的工宣队员李元和，而且，我发现七、八个哲学系师生已经包围了我们这个绿色长椅——原来，在我逃离燕园之后，吴允曾先生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回房间，并没有作声，直到监管所在早饭前排队点名时，红卫兵们才发现我不见

了踪影。此事立刻惊动了北大军工宣队的领导，他们下命令，要哲学系军工宣队停止一切活动，发动全系师生员工和军工宣队队员，迅速去燕园内外、颐和园、圆明园、香山、玉泉山、北京火车站、我的母亲家和我的亲朋好友家，总之，要立即到我可能躲藏或自杀的地方进行搜查搜捕，“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碰巧的是，恰恰在我独自一人在西长安街人行道上，似乎在悠闲地散步时，一个哲学系心理专业的68届毕业生到西单办事。当他看到一个正在接受“政治审查”的我，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长安街上，旁若无人地自由散步时，感到非常奇怪，蹊跷。他没有让我发现，更没有和我打招呼，而是转身飞快地去打电话，向系里告发……

就这样，我终于在中山公园里被捉拿归案，又被押回燕园。

第四章 南阁一个月

自1968年8月军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以来，一场大规模的“清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以致搞得北大师生员工的多数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不得安宁。当时，燕园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捧腹却又令人气愤的真人真事：历史系一个男生，因为白天在报纸上乱写乱画，受到了军工宣队的批评，夜里在自己的寝室睡觉还愤愤不平，就在做梦时，下意识地说了“你们军工宣队有什么了不起的”之类的梦话，不料，恰好被走进这个寝室查夜的两个工宣队队员听到，马上，第二天就把这个说梦话的学生揪出，没过几天，凑齐了材料，就在东操场万人大会上展开批斗……

就这样，截止1969年年初，燕园里竟然忽啦啦一连串揪出四百多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最可恶的，竟然在不得不交代自己的反革命思想之后，第二天就逃出北大，还企图自杀。军工宣队领导班子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此事充分说明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他们认为：第一，这个“反革命分子”实际上是至死还要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和反动观点；第二，他是以企图自杀的方式方法挑战，向军工宣队示威；第三，所以，这个反动

学生实属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不贷。基于这样的一番分析考虑，他们便给北京市革命委会打了报告，把我的问题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还提出，为了推动北大“清队”运动向纵深发展，必须把我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先在全校大会上批斗，然后投入监狱。据说，这个报告已经上报给公安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而谢富治也批准了，说就这样办了。

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任何人也没有料到，在“九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亲自对北大的“清队”运动表了态。他说：北京大学在“清队”运动中搞了扩大化，抓出来四百个“反革命分子”，把“蚊子”问题夸大成了“大象”问题；他还说：“抓人容易放人难，难也要放”。此真可谓“天命靡常”——我的案情又发生大变化，果然出现了转机。

在那段时间，燕园里的人们议论纷纷，都在传说，原来的军工宣队因为犯了扩大化错误，准备从北大撤出；而以迟群、谢静宜为首的8341部队、以新华印刷厂工人为主的军工宣队就要开进北大，在毛泽东和江青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一场新的“斗批改”运动。

也就在两支军工宣队承前启后、相互交接和换岗的那段时期，燕园中自“文革”发生以来几乎所有被关进“牛棚”和监管所的领导干部、师生员工，都分期分批地被释放了；只有两个教员、一个学生没有被释放——这三个不幸之人都来自哲学系，显然，属于问题格外严重之列：一个是原哲学系的副系主任邓艾民；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到美国去了的郭罗基；那个不幸的学生，就是在下、本文的作者。这三个人都被转押至燕园里十分秀丽、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南阁”里。南阁和北阁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相对而立，中间只隔着一一条幽静的小路，两个建筑物都呈黑褐色，都分楼上楼下两层，每层都有若干精致的小房间，过去，曾经是燕京大学阔小姐们居住的阁楼。到了这时，南阁便用来充当关押哲学系三个师生的临时监管所。郭罗基被关押在南阁楼上，邓艾民和我被关押在楼下，楼上楼下分别有红卫兵们值守。

关押我和邓艾民先生的那个房间，“文革”前是哲学系的系办公室兼资料室。在这个房间里，摆放有两张木床，两桌两椅，靠西墙立有几个大文件柜，柜子里装满哲学系的教学档案和资料，其中有马哲史专家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列宁〈哲学笔记〉注释》，还有一套《列宁全集》。我和邓艾民先生就在这个房间里朝夕相处，师生真可谓亲密无间，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邓艾民先生可不是北大哲学系里的一个普通教员。他仪表堂堂，身宽体胖，也带着一付金丝眼镜，人长得有派儿，相当帅气。他很高傲，凡人不理，只有对经过考察、自己信得过、认为品味相投的人，他才会放下架子，敞开心扉，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深谈。他原籍湖南，西南联大生物系转哲学系毕业。上大学时，邓先生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曾经动员自己的母亲，变卖自家的田产若干，上交给组织，支持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他先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后调入北大哲学系任副系主任，因为任哲学系主任的康德专家郑昕先生是位民主人士，所以，哲学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实际上是由邓艾民先生主持。在哲学系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先生也是个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实力派人物。他在“文革”前北大“四清”运动中，本来站在反对陆平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一边，很为聂氏器重；但是，到了受到江青坚决支持的聂元梓在北大掌权的“文革”时期，邓先生因为看不惯聂氏一系列的所作所为，便与聂氏等人分道扬镳了——从此开始，聂氏等人便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把邓先生打成“漏网地主”和“阶级异己分子”，几次抄家、关进牛棚、批斗，甚至对邓先生多次进行毒打，对这位昔日的老战友展开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乃至军工宣队进校以后，聂氏一伙因为仍然得势，所以，仍然死死地揪住邓先生不放，把他从别人的“牛棚”转押进新设立的监管所南阁里。

在南阁楼楼下那间系办公室兼资料室里，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邓先生多次泪流满面，对我讲述聂氏打手们对他实施的令人发指、可以戴入史册的、典型的法西斯暴行。例如，十几个打手把邓先生围在一块空地的中央，这边几个打手几拳把他打到另一边，另一边几个人再踹几脚把他踹到另一边，拳头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落下，金丝眼镜的镜片破

裂，头部、脸部被玻璃片划破，鲜血直流，视物模糊；胸部、腹部被几只脚蹬踹，踹得他上气不接下气，疼痛难忍，人不知东南西北，两眼冒金星……如此这般，无止无休，直至他滚倒在地，昏迷、昏死过去。而类似的肉体折磨又不是一次，而是遭遇多次……

最痛苦的还是精神折磨。在与邓先生同室相处的那一个多月，我几乎每天夜里都睡不好觉，被他在睡梦中的呻吟声和惊叫声惊醒。有许多次，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令人恐怖的声音，于是披衣下床，把他唤醒，劝慰一番，接着二人上床再睡。有一天夜里，邓先生不知为何，在床上放声大哭，那哭声忽高忽低，十分怪异、瘆人，令人毛骨悚然，以至惊动了值班的红卫兵，前来连续敲门。我赶紧跳下床，把邓先生叫醒，一再地说：“老邓，老邓！别这样！别这样！快醒醒，快醒醒！”就在那天夜里，邓先生坐在床上，双手拉着我的——一只手，抽抽噎噎地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是觉得为革命奋斗这么多年，太不容易，太不容易……我看不到前途，两眼一抹儿黑……我自己倒没什么，50岁的人了，但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还小，他们没有罪过。可是，他们现在既上不了学，又参不了军，就那样耽误着，耗着……是我连累了他们……”那天夜里，我们握着手一夜没睡，直到天明。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邓先生很爱他的两个儿子，他处事也谨慎、老练，考虑问题周到、细致，有时，到了过分的地步。举个例子能够说明问题：

在南阁时，我们都是手拿着饭盆儿，到未名湖北岸的一个教工食堂打饭，身后有红卫兵跟随。有好几次，我发现在教工食堂以东的一片假山上，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脑门儿和脸蛋儿长得圆圆的，很像邓先生，总是站在两块山石之间探出身子，目光忧愁、可怜巴巴地朝我们这个行进中的队伍张望。接连好几天都是如此。而邓先生看到那个男孩后的反应也奇怪，只要远远地看到那个男孩，邓先生就马上缩起身体，低下头去，一副小心翼翼的羞愧样子。我就逗弄老邓，拿他开心，在队伍中小声说：“老邓，老邓，快看，快看呀！你儿子又来看你来了——来一趟不容易，你应该抬起头来。”而邓先生每次听到我这样说时，都拒不抬头，同时，紧张而严肃地小声回复我道：“去你的，别胡闹。那不是我

的儿子——真的不是。”多年后，我从河北衡水考回北大，做1978届中哲史研究生，除张岱年先生等几位导师外，邓艾民也是我的导师。有一次，在邓先生家里闲聊，回忆起在南阁度过的那段日子，我忽然想起未名湖畔假山上的那个小男孩，于是质问道：“老邓，老实回答，当时假山上的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邓先生听后，起初一愣，而后，又开怀大笑，不好意思地回答：“你的眼睛真毒！——那确实是我的儿子，是家里的老大。可是在那种时候，我不敢认，怕父子一旦相逢相聚被红卫兵发现，发生不测之事，儿子受到牵累……。”

1969年1月到2月，在与邓先生共处南阁的那些日子里，窗外经常下雪，而且，每隔一些日子，窗外便传来一阵阵敲锣打鼓声和人群的欢呼声、口号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那是因为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军工宣队带领北大师生员工们在庆祝。有时，我和邓先生从窗内可以看见抬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匾的游行队伍。

自从被关进南阁以后，红卫兵虽然命令我们继续交代问题，只准我们看《毛选》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但是，他们看管得并不严，我们的时间也富裕。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我就翻阅文件柜里的各种教学资料和《列宁全集》、黄楠森先生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有不懂的地方，就问邓先生。邓先生虽然搞得是中哲史专业，但对马哲、西哲也很熟悉，又因为主抓过哲学系的业务工作，所以，对系里无论是年老、年轻教员的业务特长和学术经历都门儿清。他曾经连续几天，给我做过这方面的情况介绍。这是更高级的学问，在一般的课堂上学不到。在中哲史领域，他推崇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三位都是大家，有真学问，为中哲史这门学科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后来，我考回北大，硕士论文的题目与胡适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受到邓先生的影响。

当然，作为那个时代、那种社会环境中的一个意识形态工作者，一个领导干部，邓艾民先生对于现实的政治问题也颇有兴趣和独到见解，只要得空，他就无所顾虑地与我探讨有关问题。他对我经过独立思考，能够形成有系统的“文革”见解很欣赏，认为这很不容易，对我的观点也表示基本赞同。可是，他几次直逼我的双眼，严厉地说：“今后你少参

与政治！”他还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你太真诚，性格太实在，不是个搞政治的料儿——知道吗？搞政治也需要有一定的天赋。搞政治与搞学术不同，各有各的规律……。”

我记得在南阁时，邓先生有些政治观点还有点儿超前。例如，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地理环境和时代条件有关，不是人为任意设定的；而西方世界并不像我们的报刊上宣传得那样差劲儿，英美治国多年，有不少正确的治国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他还多次说过，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这样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矛盾：一方面，他很早就立志“立言”，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立功”，身不由己地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而结果并不妙。所以，他劝告我，如果我的问题将来能够得到解决，还是要搞学术，少搞政治，要像胡适所说的那样：“首先要把自己造成个‘器’”，否则，什么也谈不上。邓先生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也有矛盾：一方面，他对这场“文革”运动报悲观态度，不知道中国要往哪里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坚信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从长远看，人民群众确实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历史必然规律是任何个人也改变不了的。他对我这样说过：“荀子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的话才是客观真理。”

正是在与邓艾民先生同甘共苦的那段难忘的日子里，在一个窗外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写了一首《钗头凤·在南阁》，给邓先生过目，受到他的赞许。那首词是这样写的：

“青剑冷，愤血凝。漫漫雪夜听远铃。

史书吼，笳鼓竞。沉思良久，心自不平。静，静，静……

江锢封，山危倾。旗舞冰飞风尚猛。

多痴情，实非病。一行南雁，万里群莺。醒，醒，醒……’ ’ ■

【述 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四）

——红卫兵运动

陆伟国

6. “联动”的结局

然而，”文革”的凶险还在于，这批狂妄无知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却是“文革”舞台上最早被赶下去的人。这批小孩子他们不理解，无产阶级司令部所说的“斗黑帮”，最主要是指斗“走资派”、斗“当权派”。而他们热衷的是残害、虐杀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和文化界的那些无权无势、毫无还手能力的人物。

1966年10月，中央再一次召开工作会议，提出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只会造牛鬼蛇神、死老虎反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已经没有用处，又一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红卫兵横空出世。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年的秋冬季，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优势，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连他们的父母也相继成为走资派而受到冲击，他们自己也就在一夜之间沦为“黑帮子女”、政治弃儿。这批”文革”急先锋，反过来立马就吃了”文革”之苦。他们在前期对别人的凶残手段，却在告诉别人，原来”文革”是这样搞的。随后揭竿而起的以在原有体制下长期受压制的人群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爹妈之身。他们的不解与反抗也就可想而知。12月5日，北京的几个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并发布了“宣言”。他们挂出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高呼：“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他们不知深浅地与把他们捧上去的中央”文革”翻脸，又六次冲击公安部。其结果，可想而知。

1967年1月17日，“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1月25日，“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被后起的由蒯大富带领的“三司”红卫兵攻破。卜大华等骨干成员百余人被先后逮捕。此时离他扯起红卫兵旗子，才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这批极端分子的这个下场，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手上有血，而是因为他们起而反对继续拉着极左列车狂奔的他们当初的江青老娘、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了。

1967年3月，我们去参观了这个被改成“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的曾经的“联动”的窝——海淀镇西面的八一学校。它原是满清皇帝从紫金城到颐和园途中的一个行宫，解放后改建为军队系统的一所高干子弟学校。里面楼台亭阁，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假山嶙峋，所过之处，一步一景，堪与大观园媲美。拍“红楼梦”，根本不需要找外景地，那儿就是现成的。在展览中，看见他们施暴的种种酷刑，他们狂妄无知又想傲居天下的政治宣言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奢华糜烂（这样讲，决不过分）。

解放后，才十几年的干部特权，就养出了这么一批干部子女。他们这些人，在他们父母政治特权的精心培育下（比如，林立果在初中时，林彪就给他看党内高层的绝密文件），培养出了强烈的政治优越感和所谓的政治才能。他们以为亿万人民浴血奋斗和千百万革命烈士用生命换来的江山，就是他们小圈子的天下；以为国家的权力，是从他们父母手里“接班”来的，而不是人民群众赋予的。诚如某位高干子弟说的大实话，“谁接班也没有我们接班好”，而他爹则说，“还是我们的孩子党性强，把班交给他们，我们放心”。把人民江山看做是自己家天下的内心世界一览无遗。顺便想指出，“接班”一词，很不科学。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不是从哪个人手里接过来、传过去、私下授收，不是封建传承。这些高干子女红卫兵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要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从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妄、那种傲慢、那种无知、甚至那种凶残，都令人瞠目结舌。即使是从阶级斗争理论的角度讲，“打江山坐江山”也是指整个阶级而言，而不是掌了权的人自己传给自己的孩子。

这个展览，如果拿给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看看，也不失为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对如何教育培养好“官二代”、“富二代”也极具警示作用。不要以为真正的贵族学校就

是这样用“骄奢淫逸”来培养贵族的。英国的伊顿公学，睡的都是硬板床。他们要培养的是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质。而我们看到的是些什么东西？

当下，有些人因为痛恨专制贪腐而向往极左时期，以为那个年代有多么的神圣纯洁。其实那时的专制贪腐的程度并不亚于现在，只不过那时专制贪腐的圈子更集中，信息封锁得更厉害，不像现在这个专制贪腐的圈子大了，信息流通多了，让大家知道了一些而已。从这个八一学校的展览，看看那时高干子女的骄奢淫逸，而当时普通群众的生活还极其清贫艰难；想想现在那些还在为极左时期叫好的人，真为他们感到可怜。就算是在极左时期，这些特权和奢华也是轮不到他们的，连点边都粘不上，想看也不会让他们看见。

后来，对“联动”成员的处理并不重，4月份就都放出来了。这年2月，有个由高层老领导发起的“二月抗争”（即四人帮所讲的“二月逆流”），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猛烈抨击。《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一书里有句话：“‘二月抗争’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既有政治的认识的原因，也不能不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这句话，倒值得令人深思。在他们乱打乱杀的时候，没有人出来加以制止和指责，而在他们受“委屈”的时候，却马上有人说“娃娃们有什么大错啊？”。这些老红卫兵的乱打乱杀，应该说也都是属于刑事犯罪案件。文革后期和文革后，曾对打人杀人事件有过一些处理，但主要是对文革中、后期发生的两派斗争中的事，尽管这些处理也有很多是带着派性的成分在里面。而对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打人杀人事件，至今没有过任何说法。

这些人，经过这次波折，思想上受到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其中相当多的人，对维护、扩展、享用自己特权的愿望更强烈了。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更猖狂，不敢反对中央“文革”了，却对“黑五类”下手更狠。面对那时出身低微的造反派不断狂吼：“斩尽杀绝黑五类！”“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而不需要任何的伪装。对后来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血腥争斗，起了恶劣的作用。

当然，他们中也有就此深刻反思的。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他们中有不少人积极

参加了反对四人帮极左势力的斗争。在又过了十三年之后，各人的表现又不一样了。

近来有些报刊，陆续刊登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忏悔，如2010年10月21日的《南方周末》。尽管这样做的人还不多，也不是一些主要责任者。有人说光是忏悔还远远不够，但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正视历史，反省错误，才能真正地跨过这黑暗的一页。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也有些当初的早期红卫兵头面人物，对被人指为亲自动手打了六个人（也有说是打了八个人），出来加以否认。能否认打人的事，至少说明，他（她）已经认识到打人是不对的。总比有些打了人还理直气壮、至今不肯认错的要好。

当初的红卫兵极端分子里，能够忏悔的还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主要是一些已经身处体制外的人，比如有的已经是美籍华人了。他们不需要从体制内捞好处，或不需要再看体制的脸色，而且他们自身所犯的 error 和直接责任也不大，所以他们对文革中所犯的 error 可以表示忏悔。但是绝大多数当年最猖狂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我说的是极端分子，不是普通的红卫兵），他们是不会忏悔的，他们连表面文章也不会做的。有几个打人者、杀人者，或某个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哪怕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流血事件），出来说过一句话呢（记得有过一个杀过人的出来反思，那是一个造反派杀对立面的，文革中那派失败当时就被判刑了，与文革初红卫兵杀人还有所不同）。有些打人者，坚持认为他们是在响应领袖号召闹革命，个人不承担责任，依然傲气得很。虽然一直没有追究他们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但是，他们自己没有良心和道德么？

即使是这样的道歉，也很难就此得到从肉体到心灵累累伤痕、乃至家破人亡的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就文革初的打人事件向受害人及其家属表示道歉。但卞仲耘的丈夫王晶珪先生特地发表声明拒绝她们的道歉。

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付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

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2014年1月27日¹

不要低估文革所造成的社会裂痕之深。这个裂痕至今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当年的这些人，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今天是特权阶层里的一个主要部分，有权有势有钱，而这些是靠着现行体制的弊端得来的。这个体制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在很多方面本质是一致的。现在虽然否定了文革，但没有否定这个体制，所以他们怎么会忏悔呢，怎么会去否定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呢？况且，文革不只是有错，而是有罪。这个头一开，哪怕是做做表面文章，他们也是很难收场的。而且他们至今依然处于强势，忏悔者（这已经很不错了）可以说当初不好意思打了谁了。但是反过来，很少有哪个被打者会出来说当初谁谁打了我？没有。至今，他们不敢说，他们的后代也不敢说。

我倒是在担心，有人在乘着少数几个老红卫兵的忏悔，在给那些当初又打又杀的“官二代”洗刷原罪。当初狂傲无比，恣意地伤人杀人，是他们；如今又可以装个样子“忏悔”，摆出高姿态的，也是他们。为减少人们对“官二代”的担心，有人出来说“官二代”只有4万人，人数很少，影响不大（意思大概是他们占不了多少位子，让他们占去吧，你们就别有意见啦）。生怕别人不信，还有人举例说，他那个高干子弟学校同班同学中做到局级的只有40%，意思是我们占的位子不多么。要知道，县长才是处级啊，你还想要多少啊？

¹ 请见2014年2月3日凤凰资讯的文章《文革受难女校长卞仲耘丈夫拒绝接受宋彬彬道歉》。

要是都当部长的话，都给你们一个班也不够啊。高干子女不是不可以当官，而是要公开公平公正，叫人民群众心服口服，做事为人能叫大家竖起大拇指。曾经乱打乱杀，如今毫无悔意，令人很不放心。在专制制度下，靠家族接班，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毁了国家毁了民族，满清的八旗子弟就是最好的例子，东面的那个邻国不也是那么回事么。

对文革的忏悔，既需要以国家名义的忏悔，也需要当事人个人的忏悔，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的情况是，两者都不够。

现在网上还有一些为“文革”叫好、为极左叫好的人，我不是指没经过那段血腥年代的年轻人，是指经过那个年代却还在为“文革”叫好的人。有意思的是，我们只听见他们叫好，却没有见过他们写的真实的“文革”回忆录。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网上，都没有。既然那么好，为什么不写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们所极力称赞的“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到底好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不说说他们当年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残害干部群众的呢？他们写不出来。他们也不敢写。因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如果不是作假的话，那就是打人杀人、残害群众、残害干部的罪行录。更不用说，有的当年打断过自己亲爹肋骨的“联动”头面人物后来还身居高官，却还是满脑子的左倾思维，还想为所欲为，重搞极左那一套。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手段，依然是狂傲、凶狠、手段毒辣而无所顾忌，满嘴的革命“红歌”唱给别人听，自己“打黑”却比黑还要黑。重庆不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吗？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高干子女红卫兵都是这个样。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今天他们中的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在他们身上却还遗留着不少当年中学红卫兵的意识 and 做派。

7. 人民大学红卫兵的演变过程。

[1]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

在人民大学，有两派红卫兵，而且各自有它的演变过程。了解这一现象，对于研究红

卫兵问题，是挺有价值的。

最早出现的“人大红卫兵”基本上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开始时，他爹是个处长都不让参加。按现在的说法，那时要当个红卫兵也得“拼爹”。这样一来，由于人数太少，在学校里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影响和生命力，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子。不多久，九月，中央“文革”要求高干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其原因：一是用不上他们，二是一定意义上是在保护他们，缺德的事、危险的事让别人去干，让他们留到事后去摘桃子。只一个月的时间，“人大红卫兵”实际上就剩了一、二个人。

到九月中旬，另一部分思想比较活跃、更愿意跟上“革命大潮”的学生，以“八一二串联会”为主，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无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他们反而成了“人大红卫兵”的主体，有点像是现在的“借壳上市”。会上推举曾国乱同学为司令，曾后来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这个“人大红卫兵”与原先高干子女的那个“人大红卫兵”，除了借用了这个名称，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的关系。

到了十月，除了人大红卫兵，又有相同观点的红卫队、红卫军等靠拢过来。到年底，红卫军等一些零星组织或融入人大红卫兵，或纳入另搞起来的一个“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习惯上又统称为“人大三红”。红卫兵，是以学生为主体；红卫队，是以教师为主体；东方红公社，则算是外围组织。三者大体上是个以人大红卫兵为主的同心圆结构，通常是以“人大三红”的名义进行活动。有的文章把“人大三红”说成是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的统称，是不对的。

这时，早期红卫兵的某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已不明显，而开始带有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特征。他们从早期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蜕化演变过程，比较特殊，也比较顺利。这也是和高校红卫兵的爹妈不在学校当地有关，冲击走资派对于他们的心理影响不是很直接，比起爹妈就在眼前被挨斗的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更容易接过造走资派反的旗帜。

而人大的“八一八”红卫兵，最初应该说是属于保守派红卫兵。1966年底，随着形势的发展，“保守派”已难以立足和生存，“八一八”红卫兵逐渐解体。1967年初，从湖北

造反回来的赵桂林同学竖起了“新人大公社”的旗子，原“八一八”的力量(包括相同观点的教工群众组织“赤卫队”)基本上聚集其下。2月22日晚，以原“八一八”红卫兵为主体，加上北京公社、遵义兵团等，在大教室举行了“新人大公社”成立大会，主要负责人为赵桂林、张祖义等，实际上是“八一八”的重新组合。这时的“新人大”，自己也不屑于“保守派”的帽子，已经有了造反派红卫兵的一些特征，比如也去造一部分不合自己口味的“走资派”的反。(补充说明：赵桂林同学离校后，很长时间里不知他的去向。前段时间，我很想促成人大两派群众组织的一把手赵桂林和孔宪龙两位的会面。他俩还是经济系同一年级的学友，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经多方打探，不久前(2016年)从辽宁校友那儿得知，赵桂林先生已于五年前去世。非常遗憾和痛惜。赵桂林生前在辽宁铁岭供销社工作。)

[2] 我的态度

说明一点，在这个恐怖的“红八月”里，以及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们班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过批斗、抄家、抓人、打人、砸东西、烧东西等等这类打砸抢烧杀抓的行为。在“文革”初期，是中学生比大学生起劲。到后来的两派争斗，又是低年级比高年级起劲；理工科院校比文科院校起劲。其原因可能是高年级的、学文科的，相对来说，独立思考和政治头脑更多一些，盲目和冲动更少一些，不那么容易被煽动、被利用。红卫兵运动所以首先从中学生里鼓动起来，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讲这段话，毫无自我标榜的意思。我只不过做了个正常的人。

由极左势力鼓动和呼唤出来的红卫兵极端分子的残暴和血腥，反而使我清醒了，冷静了，看清了极左势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原本为保护郭影秋而去跑市委、找康生两天两夜不睡觉的那点政治热情没有了。原先振臂高呼的手，落下了。当然，前些日子想要支持郭影秋的做法，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更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群体的肯定，是对党的形象的肯定。

但是，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样真诚的政治热情，不需要这样对党、对党的干部真诚的

肯定。文化大革命需要的，正是这些的反面。红卫兵冲击的是“地富反坏右”和所谓“文艺黑帮”，并要借此来显示他们的政治优势和接班的意图。极左势力借此要摧毁的是“走资派”最后尚存的可能有的一点力量，来彻底打垮他们认为的政治对手，扫除对“绝对权威”的任何妨碍。他们在借助红卫兵的手，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任何的反抗和异议，都将会立即死无葬身之地。

狂暴的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非，1990年初，在他的小说《逃往火狱》的开头也写道：“人在集体暴虐起来时，是多么凶狠啊！那简直就是汹涌的洪水，对挡在它面前的人毫不怜悯、毫不留情……集体的暴虐，那可是最厉害的一种暴虐——谁能阻挡滚滚的洪流？”（请见：《南方周末》，2011年9月29日）看着满街奔突肆虐、牙缝里滴着鲜血的群狼，我只能后退，我只能自我保护。不去咬人，首先还要不被人咬。当然，我也不同于完全的逍遥派。在冷却的外表下，内心依然是热的血，依然在关心着、思考着，但决不参与那些极端行为。

所幸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打过别人，也没受到冲击、没挨过别人打；既没有那种咬牙切齿的夜夜愤恨难平，也没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快感和从巅峰滚下的失落；既不是直接的害人者，也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不过是在漫天风暴中，一粒随风飘飞的沙尘。这也是我今天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写这篇回忆录的又一个原因。我所写的，既不同于马识途他们受苦受难的《沧桑十年》，也不同于那个复旦红卫兵司令的《我不忏悔》，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是一个处于漩涡中心边缘的普通大学生的经历与思考。我作为首都红卫兵，参加了一个普通百姓所能参加的许多重大活动。现在再写下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感受和现在的思索。我希望我的回忆录，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论述相结合、回忆与反思相结合，能给读者有所启示，就很可以了。■

【述 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九）

——“五七干校”（上）

宋翔雁

一．风潮的兴起与再认识

毛主席于1968年9月30日针对黑龙江柳河干校的一篇报道，批示道：这是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搞好斗批改的好办法。该批示见诸报端后，各中央和省市机关就陆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偏远落后地区选点兴建五七干校。并以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为借口，将众多下台干部和成立革委会后未被接合的干部群体，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起，迁往这些尚未建成的干校所在地，边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边修建住房、食堂、中小学校等生活设施，边学习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边斗私批修，再度掀起了新一轮针对广大干部的整肃和迫害。

有趣的是，办干校的批示原本是针对各类机关暂时未被结合、没能安置适当岗位的干部群体的。但到1969年中，在京各高校，由北大、清华的军宣队牵头，很快各省市的高校也纷纷开始效仿，掀起了大办五七干校的热潮。让四年未招生的高校教师群体（少数除外）不得不走下讲堂，步入（相当一部分老师被迫只能携家带口地步入）“学堂”——五七干校。让他们丢弃（或言中断）其所学的专业，集体去参加农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地院军宣队也不例外紧跟潮流，大约是和地质部军代表（当时中央各部委均已被军管，由军代表主持工作和运动）商议后，各自分别在江西峡江县仁和镇龙陂原“共大”旧址和隔江相望的水边兴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会有人去向军宣队质疑主席关于五七干校的批示是针对未被结合和暂未安排工作的干部群体这个问题的。因为，一方面被质疑一方不仅很轻易地就可以说：教师也是干部编制予以反驳；另一方面，搞不好一上纲，这就会成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问题，落得个悲惨下场。但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民和当时被涉及到的干部、教师们，不仅有权质疑将众多干部、教师驱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这种劳民伤财做法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而且应当进而揭发、控诉当时这种做法的非人性和迫害性的一面，从而让善良的人们能够认识到所谓“再教育”的伪善性。

当今，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军宣队领导时期，所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走资派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是对干部、教师和学生群体进行残酷迫害这一事实。但对五七干校在迫害干部、教师群体方面的严重和残酷程度上，却认识估计不足。只看到了兴办干校浪费钱财、资源，破坏环境等负面因素的一面，却认为干部和教师们只不过是参加参加体力劳动而已，没啥大碍，甚至还觉得客观上还有利健康呢！在回忆地院五七干校从兴建到搬迁再到消亡的这段历程后，我认为，运动中的“清队”等手段与“干校再教育”，都是文革时期执政党对干部和教师群体（即知识分子）进行整肃和迫害的手段，二者是互补的。从整肃知识分子的角度讲，这两种手段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被列为打击镇压的对象，后者针对的则是被列为改造的对象。对前者，偏重于政治层面上的清洗和迫害，属于敌我矛盾；而后者则美其名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说得直白一点，即将这部分人，列为人民中的异类），是今后国家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中还必需要使用的一类。即既要用你，又要对你实施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改造，比如集体去干校接受再教育。

但应当看到，按毛泽东关于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在历次运动中对打击面是有所控制的。一般定为3--5%，最多不会超过10%（个别地区和单位，因领导为邀功而更左，导致打击面往往可能会有所增加），故对打击对象而言，它只占干部、教师群体中的少数。整肃后，这些人中的多数仍被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所谓中国特色的群众专政），

表面上与常人无异，但在待遇上（如行政级别、工资级别、住房和医疗等）会有所调整。但其中也有更少数的人会直接受到专政机关的镇压（监禁、流放、劳教等），而丧失了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但对改造对象而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是针对整个干部、教师群体的，除运动中暂时仍需留用的部分干部、教师外，该群体的其余的部分则均包括在其内。我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我估计这部分人员应占到干部、教师群体总数的60%左右，涉及面之大，远远超过前者。基于五七干校这种再教育手段涉及面如此之宽，异地从事体力劳动时间很长（从几个月到一年以上），生活、医疗条件又较差，加之当时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等影响，可以说五七干校对干部、教师群体的迫害是不容轻视的。其迫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改造（或被教育）对象，赴五七干校的人员是由军宣队决定，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而非人们真正的自愿选择。在失去选择上的自主性后，留给当事人内心上的感受只能是被驱使、被奴役的伤痛。

尽管在表态会上，有人会激昂慷慨高调地要求奔赴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多数人也表示响应号召愿意前往。但在这些表态的人中，其真实的思想却有极大的差异。其中，有些是善良的“臣民”，习惯于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多数则是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言，迫于政治环境和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极个别军宣队依赖的骨干们，用现代词语讲则是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的“托儿”。如当时被群人戏称为“五朵金花”之首的水文系的梁桂芝，她乃军宣队入院后的依靠骨干，其配偶是院外职工，手下还领着王兆姬、朱思贵、赵璧媛等一群拱卫和追随者。她高调申请赴干校接受再教育，获得军宣队的肯定和表扬。但到干校后，时间不长就被调回北京，离开学校这块是非之地，去地科院任职了。而王、朱、赵等均成为军宣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各专案组负责人，残酷迫害被清查者，为地院广大正直的教职工们所唾弃。但他们却得到文革后当政者们的青睐，王、朱等还被提为副局级，这就是中国的人事特点——被领导看中提拔的，往往却是被群众憎恨、唾弃的人；

2、在安排赴干校的干部和教师的名单时，基本上很少考虑其本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困难程度，如年龄、身体状况、家属和亲属的具体情况。采用一窝风、连锅端的驱赶方式，一批奔赴干校。干校原址（龙陂）当时连住房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不带家属的职工均按性别分开居住在“集体宿舍”中。所谓集体宿舍，是指在一间大房子里，搭起了上下两层的通铺，每人可获得 $0.8-0.9 \times 1.8-1.9$ 平米面积的睡觉铺位。而全家同迁的人员，则被安置在距龙陂远近不一的农村中，在老表家里腾出的房间里居住。由临时改建的伙房、锅炉房向学员集中提供膳食和饮水，分散住在农村里的学员及其家属，起初则需往返数里到十数里，来“院部”龙陂打饭打水，后来才逐渐自己单独起火，使生活条件得到一点改善。

3、对干校学员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和亲属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诸如老人的生活照顾、子女的求学和托儿、老少的医疗等）基本不予考虑或很少予以考虑，造成部分干校学员不得不举家同迁的不幸场景。也就是说，原本不属于“再教育”对象的家属、子女和亲属，在这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中也被裹挟卷入其中，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个别老者和体弱者还命丧异乡。如干校曾出现过所谓“草葬”电报的“丑闻”（该事件是一干校女学员在回京探亲期间，留在干校家中的母亲病故，干校工作人员发电让她速归处理，但她竟回电“草葬”二字了事）。为此，涉事人广受众人的谴责，认为其无德、不孝。但我以为，除当事人应当受到谴责外，人们是否还应该进一步思考一下：该谢世老者为何会来到干校遭此不幸结局，客死他乡？难道军宣队要求干部、教师前往干校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就没有责任吗？就我所知干校期间人员的死亡事件还有：干校学员，原体育教研室主任刘冠军教授就猝死于干校的劳动中；原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而自尽于深山老林；

4、可以说利用五七干校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对仁和地质学院五七干校而言，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欺骗！——既是对上级和中央的欺骗，也是对广大地院教职工的欺骗。地院峡江仁和五七干校从建校开始，到中间迁校湖北沙洋，至最终解散的整个过程中，无

论是原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军宣队，还是后来的湖北省军区的军宣队，都没有任何领导组织过当地或地区的贫下中农来干校与干校学员一起活动，具体实施对学员的“再教育”，而且也从未派学员们出去向贫下中农学习过。也就是说，军宣队既未邀请过一位有代表性的贫下中农来校介绍个人或地区贫下中农群体在过往斗争中的英雄业绩，也未派出任何学员或学员代表出去参观或走访当地贫下中农群体的斗争事迹。他们在领导干校兴办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是利用这一平台，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利用学院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技工的力量，并以广大学员做劳动力，修建职工住房并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军宣队从未和广大学员一起参加过任何劳动，而是一群典型的不拿枪的督导者。就农业生产而言，主要是插秧、种稻、养鸭、种菜等。对此，军宣队则完全是放羊式的领导，不计成本，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如乱砍乱伐对林木和水土保持的破坏和影响）；其二是，通过“清查五一六”，继续对广大地院学员（学员中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在京或不在京单位的学员）进行整肃和残酷的政治迫害。而且，因干校地处偏僻的山沟里，加之众人均来自北京，在此无亲无友，除书信外，大家没有对外联系的其他渠道和条件，故众人犹如被禁闭在集中营里一般。因此，在这里搞运动，没有在北京时的时间限制。即没有上下班一说，只要需要，每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可用于清查工作，形成一种“全天候”的清查模式。这种集中营式的“清查”平台，也只有在五七干校这一特有的场合下才可能出现和存在。

二. 明曰自愿报名，实则身不由己

当时基层单位每天除学习柳河“五七干校”的相关文件外，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表态——表明个人的志向。这时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但此时的选择条件和环境，与大学刚毕业时的情景已完全不同。那会儿刚毕业，满身豪气，志向高远，献身精神充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几乎成为每个有志青年人的不二选择。应当说，这也是当时政治思想

工作最大成功的反映。而今情况迥然不同了，连像我这样可以说是年岁最小的教员，也已32岁有余，且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如何做出选择，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此时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号召力，也远非文革前的情况可比。在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之久后，面对社会的动荡、生产的停滞、正常工作和教育秩序的中断，广大群众人心思定的想法明显上升。而且，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大量问题，也是使党政领导的威望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对领导缺少信任，对前景缺乏信心的政治环境下，让群众做出选择更是难上加难了。

当时对全院教职工来说，只有三个选项：教改试点（探工系主要地点是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全院性干校，地点在江西峡江县仁和公社原江西共大的旧址——实际上只有几排房子）；北京留守点（维系原校的存在和保障教改点和干校点的后勤需要）。在这三个选项中，表面上是自己报名，实际上是军宣队与个别领导成员按教改和留守的需求，事先就已作出挑选后，余下的人员只可能有一个选项——去干校接受再教育了！而且军宣队的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干校筹建和赴干校人员的“动员”上面。

除了上述三个地点（或说任务）选项外，对地院教职工也做了三类不同工作性质的划分，作为军宣队安排时不同考虑的依据。一类，工人。他们表面上不属于“再教育”的对象，安排他们去哪里都是工作需要，因此是轮换式安排，没有举家搬迁的要求。是否按出差享受补贴则不得而知；二类，各级干部含政工人员。除少许至各个点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属于再教育对象外，其余也属于再教育对象；三类，广大教学人员。这些人属于接受再教育的主体，若非教改试点需要，其余将全部奔赴干校。

在对待教学人员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动员过程中，一些政策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近乎残酷。如对于双职工均是教师的家庭，一般都要求全家老小均前往干校安置。如若不愿意一起同迁时，则老小在京的照料问题需自己解决，组织上或留守处均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对不同行的孩子原来享有的统筹医疗福利，也就随即终止。军宣队正是想利用这类不近人情的挤压措施，迫使教师举家同迁。

如前所述，也正是因为这一规定，当我们前往干校而将未满周岁的孩子留京委托一位大师傅的家属照管。未曾想到，三个多月后孩子即被烫伤，并险些送命。为了抢救孩子生命，仅花销的医疗费用就达一千余元，全部是由我们自己筹款承担的。在双职工中，若另一方为非本校的在京职工，则双方可自己选择举家同往对方干校安置。该措施被在京中央单位普遍采用，以减少同迁干校的阻力。若另一方为京外职工时，政策也允许京外职工随地院职工同迁江西干校，但工资、人事关系不变，今后根据学校教改的情况，可优先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调动问题。

面对当时的局面，我们心知肚明没有别的选择，与其被分配到干校，还不如自愿报名前往干校，起码还落个名声。但是举家全迁还是我们自身前往，确实让我们和广大教工们感到两难。尽管当时军宣队的头头们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房子和孩子们的学校、幼儿园会很快建立起来，生活设施也会很快完善……。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已过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美丽的谎言岂能令人信服？！就我们自身而言，孩子当时仅八个月；岳母已七十三岁有余，且是缠足女性，还患有较重的肺心病；侄子不足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将他们老小留在北京，在京城无亲友照看的情况下，万一有何需要时，如何解决？而若与我们同迁，那只能在干校周边农村中的农民家里租房暂住，由我们劳动后回家照料。但侄子的上学，幼儿的照看如何解决？面对如此窘境，确实令我们一筹莫展，日思夜想也难找出解决难题的良策。但时间是不等人的，在军宣队正式宣布去干校的人员名单后，随即宣布了赴干校的时间（我记得大约是十二月上旬）。面对仅有一个半月的准备搬迁的时间，让我们已无回旋余地和犹豫的可能。故决定举家迁往干校。困难自己家有，别人家同样也有，只不过各自的困难程度有所差别罢了，别人可以克服，自己也一定能够克服！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就积极地从事各方面的准备，首先就是购买各类包装用品，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包装后方能启运；另外就是与昭明在京外的兄姐们打招呼，告知准备全家外迁的决定，若有何异意望速告或来京相商。当我们的准备工作已近尾声时，昭明在沈阳的兄长回京进一步面商。因他是大夫，知道其母身体的实际情况，说一旦去到江西，老人这个冬天都很难熬

过，所以绝不能全家举迁。还是让老人和他儿子留下。并建议我们，让仅八个月的儿子也留下来，托付给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帮带，等那边条件好些、孩子也大一点后再接去。若万一老人有事就请留守人员打电报给他，因他们离京最近，再请假回京处理。就这样我们又决定孩子老人都全部留下，我们自己去干校接受所谓的再教育。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儿子四个月 after 险些丧生，造成家中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但这完全是因所托付的人不负责任所致，而老人则能健康地又活了七年，至 80 高龄方才谢世。

应当指出的是，军宣队在安排教职工去干校的做法上，可以说完全是强制性的，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因接受再教育是最高指示，不前往者就有抗拒最高指示的政治风险，因此即使再困难，也只能就范。他们在一味追求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使其成为顺民、愚民的同时，也株连到干部、知识分子的家属和亲属，等于将他们驱离了原本尚属安居的环境，而变成了居无定所，学无定校的可怜的老少群体。这种非人性的举措，完全背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来宣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因为他们并未认真考虑职工家庭亲属的实际困难，表面上虽说可由职工本人决定随迁与否，但若不随迁，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如生活、就医照顾等不但跟本不予考虑，而且随着人员的外迁，还人为地造出一些难题，增加更多的困难。如家属区的冬季集中供暖就被取消，改由自己解决；双职工子女的就医统筹被立即取消，改由全部自负等。面对这种非常不得人心的作法，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也只能无奈默默地去承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9 年的初冬，对地院广大教职工群体，特别是被驱往干校的教职工群体来说，是他们心灵上最为凄惨的一个严冬季节。军宣队毫无人性的恶劣作法，使他们完全处于一个令人摆布而又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他们不得不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背井离乡，而且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和至亲也要随之浪迹天涯。与古代中国统治者和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强迫少数民族整体迁徙相比，从本质上讲，其残酷性可以说毫无二致。

经过极其紧张的整理，将所有随迁物品交至学校指定的西饭厅接收点后，昭明随第一批人员一起，于十二月上旬，经上海、樟树（清江），奔赴仁和镇（属峡江县管辖）后，

再到干校所在地龙陂。我则因当时仍处于半休期间，半休后需再做一次检查，故允许我检查后再走。这样，我于1970年1月1日只身经同样路线赶往龙陂干校。从此掀开了我们在文革经历中的另一难忘篇章。

三. 成老师挨批，宁师傅仗义

当我奔赴干校报到后，我仍在探工系所在的五连从事最初安顿方面的辅助工作（因当时我仍持有半休的医院证明）。在一次与正在接受批判的成嘉式老师的闲聊中，我问到他挨批的情况。到干校后，校部调他去负责管理柴油发电机组（因他是学热工机械的，在学校是教热工和内燃机的老师）。半个多月前，下班落闸停车后，因疏忽，没有注意到寒潮来袭的预报，忘记将柴油机缸套内的冷却水放空，而当夜气温确实因寒潮到来骤降，致使冷却水结冻，导致柴油机缸套胀裂。因无备用的大马力柴油机，故干校连续多日停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件事被定为重大责任事故，成老师为此已连续多次检查，接受军宣队专门组织的班子，对其进行批判。尽管他已承认错误，而且对因自己的不慎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不便深感愧疚，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赔偿。但事过近一个月了，军宣队仍未将其放过，原因何在，这还要从成老师的个人经历说起。

他是上海交大解放初的本科毕业生，后又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用现在的语汇可说是“学霸”。但因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故在院系调整时，其研究生学业尚未结束，就于53年底被提前分配到地质学院，讲授热工机械课程。54年我们入学后，他因已无条件去教堂，加上有很大的无形压力，故他就不再在公共场合里，从事因习惯而做的宗教习俗礼仪，如在学校食堂里，饭前作祈祷等。久而久之，人们觉得他似乎已放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

在日常生活上，他较少与旁人主动交往，经常独来独往，人们对他的这种作风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在政治层面上，除规定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和活动外，其他各类政治活动

他从不参加，而且在各类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几乎也从不发言。所以在政工干部眼中一直将其视为异类、是为落后分子。但在行政领导眼里，因他的业务能力较强，给予他的各项工作和教学任务，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地完成的，故师生关系挺好，也让领导放心，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教师。加之他出身没有大的问题，本人除信过基督教外，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又是单身，社会关系简单，故在他结束学业后的历次运动中，包括文革在此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直接触及到他。而今这次事故，再怎么批也无法说成政治问题，故拖着不放的理由也就只能认为是故意整人罢了。拿班子里的人“有意”放出来的话说：“就是要打打他那权威似的态度”。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干校，尽管各类批判会都被冠以是对被批判者的“帮助”、“挽救”等美名，但骨子里却是要把被批者改造为一个顺从者、驯服者。不达此目的是不会罢休的！

事实上，成老师也知道班子里放出来的话，所以，他对我说道：我并不是权威，但我看不惯那些自己不懂，还要瞎指挥的人！我听出来他对眼下的情况有看法，也感到此事发生前，他肯定与相关领导有过一些争执，但我不便也不想卷入其中，故我未进一步再问，只是劝他不要太介意，也不用背包袱。而且告诫他，对有些批判你不同意的，可以回避暂不表态，若一定让表态时，千万要注意态度。

闲聊分手后，有一天我遇到了地院车队的原负责人宁师傅，他是元旦前因运设备从北京过来的，但卸货后被要求留在这边帮帮忙而未归。当我对他说起成老师的事时，宁师傅说到：也算他倒霉，我们这边的六辆车都没放水，没一辆冻了的。他算白信上帝了，说毕还做了个鬼脸。对此我说道：您也是的，人家挨批您还挤兑人家，太不厚道了吧！？他忙解释道：小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总怀疑这里有问题。我问他啥问题，他说道：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你想，他拉闸下班都已经是十点半以后的事了（干校规定十点半熄灯），机器停车时温度很高，再说气温低点，也就零下两三度，一时半会儿哪那么快就会冻裂了？

宁师傅是解放前学徒出身的技术工人，开车、修车都是院车队里的顶尖儿的一把手。听后我也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但我心想，不管时间长短、温度低不低，缸套内水结冰应

当是肯定的。故我接着问道：但不管怎么说，缸套里的水总归结冻啦！宁师傅接着说道：我没说缸套内的水没有结冻，但我认为结冻的时间不长，也不可能冻透，否则，车队的车为何都没冻坏？我说：那可能是因为你们那六辆车比较集中，降温结冻的时间比发电机组一台机器要短一些吧！宁师傅继续说道：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我的怀疑是发电机组的柴油机质量上有问题，或者缸体原来就有裂纹但没裂透，故还能照旧使用，而且表面看也没事，这次稍有冻结就给撑裂了。不信你等换缸套后将报废的缸套砸开，如果只有一条新裂纹那没的说，如果有陈旧裂纹存在，那就可证明我的说法。

听罢宁师傅的分析，我不得不服气！但我说道：看来用不着砸了，因现在军宣队正让化学教研室的黄××老师和我们系的钱天宇（宁师傅认识）搞高温树脂粘合剂配方，准备粘结裂缝来修复呢。宁师傅说到：小宋，你不懂。如果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那就算了。但如果真要给成老师个什么处分，那我还得说道说道，干嘛欺负人家老实人呀！我有把握，砸开验证，肯定我说得对！听到此，我内心深处就不仅仅是服气了，而是宁师傅的一身正气深深地震颤着我的心灵。想起两三天前，我因不愿进一步卷入，而未与成老师深谈的心境，真觉得汗颜、羞耻和渺小了。而且，就我所知，宁师傅与成老师并无多少交往，相互间也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只因成老师的个人经历和为人与一般的人有较大差异，而为地院的老职工们所熟悉罢了。最终，因粘合法修复成功，成老师的问题也未再追究，所以宁师傅的验证也就不需要实施了。但这件事情中衍生出来的“人物故事”却深深地印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没有忘怀。

尽管柴油机的问题给成老师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度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坏事变好事，干校之行后，也给成老师人生历程带来了一次转机。即干校结束后，他又回到北京。在1975年中，地院迁校去武汉后不久，在系行政领导的照顾下，同意他调往上海。回沪后，他在上海工业大学任教（钱伟长任校长），在沪，他很快就并被评为优秀教师，可谓大器晚成了。

四. 调到木工队

到干校快一个月了，一天我去木工队电锯组那里，准备捡拾一些废弃的木料，加固宿舍通铺的铺板。经电锯组阮天健老师同意后，我到废料堆处挑选。选好后，我借了一把手锯，将较长的板材按所需的尺寸断开。当锯好后我去还手锯时，木工组的王贻伦师傅见到我问道：小宋，你看这个砂轮片中心眼比砂轮轴大一圈，有办法解决吗？因当时我还不认识王师父，虽我在校工作已十二年，但从未与木工班的师傅打过交道，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又不大明白。所以我放下手中的板条块，不好意思的反问道：我不大懂您的意思，您再讲一遍成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带我绕了个圈走到砂轮机处，只见砂轮机已经拆开，旧砂轮已经不能再用，卸下后扔在了一边。王师父将手中的新砂轮片往砂轮机轴上一套，并说：你看！这下我明白了，就说道：需要量好尺寸，加工一个轴套就行了。但要保证加工的同心度精度，否则砂轮轴的转速太高，不同心时离心力太大容易出危险。听后，王师傅说道：这个我明白，但这里没有车床，没法加工轴套。确实，巧妇难为无米炊，而我这时也准确地懂得了王师父的问题所在了！于是我问他：您很着急要用吗？他回答道：很急，因电锯盘等着打磨，否则很快就得停工！这时我用卡尺测量了砂轮盘的孔径和砂轮轴的轴径，二者的直径差约为5 mm，也就是说轴套的壁厚约为2.5 mm。我内心盘算了一下后对王师傅说道：可以用手工做一个木质的轴套试试，但需要一块不太硬而且韧性较好的木料，木料最好是顺纹的，外径尺寸和厚度比轴套略大一些作为轴套加工的胚料。类似兰考的枹桐树那样，但质地要比它硬些才好。此外还需要手动木钻和几把细木锉和平铲刀、曲面铲刀作加工工具。听后，王师父问我，你能帮忙吗？我回答道：我可以试试，只要木料合适，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为说明这点，我将自己的想法和为什么成功的把握较大的原因坦率地告诉他了。听后他很高兴，觉得我的想法有道理，并说道：你要求的木料这里有的是，就是樟木。它的韧性很高，而且纹路比枹桐树要好许多，易于手工加工。说毕他问清

我住的宿舍，说准备好后去找我。分手前，我再次仔细地测量了砂轮片的孔径和砂轮的轴径后，我拿了刚才收集的板材就回宿舍去了。吃过晚饭后，王师父和木工队的李文章师傅带了木料和工具一起来宿舍找我，并带了一块垫在桌上的厚胶皮板，既防滑也可避免加工时损伤桌面。他们问我大约要多少时间，我说因过去没做过木工活，不好说准，但我想明天中午前应能做好的。他们没表示异议，嘱我注意安全后就走了。为不影响他人，晚上我只是在胚料上将线画好，为增加可靠性，我画了两个胚料样，准备第二天早上其他人上班后再开始加工。第二天我很快将两个木质轴套加工好了，当我带去木工班时，也就十点多钟。我将木轴套交给王师父看后，他很满意，说肯定没问题。我们先将木轴套压入砂轮片，再将装有木轴套的砂轮片轻轻地敲打套入砂轮机轴上，最后拧紧固定好再装上防护罩。然后我又用手转动砂轮机，检查了一下砂轮转动时的对中情况，确定没有问题后，王师父即让合闸开机。结果一切正常，这让王师父和随后赶过来看的李师傅非常满意，连连夸我的主意好，手也很巧，搞得我还真的不大好意思了。因毕竟帮助人家解决了一个难题，自己内心还是挺高兴的。但我还是自谦地说道：您二位别夸我，给你们当学徒得份都不够呢！可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却给了我一次转行学木工的机会。

就在修好砂轮机后两三天，连领导通知我第二天去木工队报到。当我问起原由时，他告诉我是木工队的王师父找军宣队蒋喜亭要的你，说木工队需要一名懂机械的人管理和维修木工班用的各种机械。这样，我到干校不久（大约一月中下旬）即离开五连去木工队上班了。到木工队后我才知道为要我去木工队，王师父还与军宣队干校负责人小有争执呢。当王师父提出要我去木工队时，蒋开始并不同意。对王师父说：要懂维修机械的可以在五连找其他人去，干嘛非找他呀？而且他身体也不行，现在还半休一个月呢。这时王师父才把修砂轮机的事说了，并说，他身体不好搞木工班的机械维修正合适，属轻体力劳动。只要他能保证我们的机械运转正常，我们就能保证基建的进度计划按时完成。最终，蒋出于确保基建进度考虑，才勉强同意了王师父的要求。

报到后王师父对我说：今后你主要负责机木工这块的机械，确保它们的正常运行、定期维护，还有就是电锯盘、机刨刀的修磨及电锯盘的整平工作。除一米、一米二、一米四直径的电锯盘修磨整平比较费力外，其他工作的体力消耗都不大，你应当能胜任。大锯盘修磨整平时，可找人帮你一把，成吧？！听后我说道：木工机械的运行和维护我需要先熟悉一下要求，估计掌握起来难度不大。但刀具的修磨、修整，我从未接触过，恐怕得有一个学习过程。我注意到王师父他很注意听我的回答，一直两眼注视着我，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一样。当我说完后，他笑道：刀具这块儿我会教你，我相信你会很快掌握。我知道你和薛师傅学过锻工，锤头上的功夫应当可以，这也是我非要你来这儿的原因之一，锯盘整平需要眼力和锤头上的功夫。机械维修那块儿，让李师傅带着你做一遍，然后你自己看看说明书，按上面的要求去做就是了。都交代清楚后，他又问起我的身体情况。我简单地告诉他是胆红素增高症，除了体力上较差容易疲劳外，其他方面的反映不明显。并附带说道：感谢他要我到木工队来干活，我会努力干好的，身体不会拉我的后腿。话毕，他让李师傅带我看了一遍机木工用的各种机械，以及各台设备的检查、上油部位和时间间隔。他特别向我强调的是：在检查、维护每台设备前，不但必须先将这台设备的电闸拉掉，而且，因这里都是临时搭建的工棚，线路设施相当简陋，因为没有锁，所以拉闸后还必须将闸上的熔断器取下来，并带在自己的身上，以防他人误合闸时造成事故。当相关的机械都看完后，李师傅又给了我几本说明书，让我拿回宿舍再看，并让我自己建一个设备维护档案，记下每次的维护内容和时间，以防疏漏。言毕，我又去找到王师父，他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后就让我先回去休息，明天上班时教我锯盘修磨和整平的方法。

此后，我就到机木工处上班。开始王师父给我讲解并做了一遍锯盘、刨刀的修磨，看后我觉得掌握起来难度不会太大，关键是手要把稳工件（锯盘或刨刀），眼要看准并始终跟着修磨点，压紧力不能太大以防过热锯口退火变软，但压紧力太小时工件会跳动，而难于把持。当王师父修磨好一个锯盘并检查一遍后问道：你能看出点道道吗？我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也坦率地讲了自己归纳的稳、准、力三个要点。但补充道：中国有句老话，看

着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好恐怕得练不少日子吧！听后，王师父对我概括的三点非常满意，笑着说：教你们比带学徒要容易多了，多读点书还是好呀！你懂道理后，做起来就不是照葫芦画瓢了。出点问题自己就能找出原因，掌握起来就会快得多。不要急，注意安全最重要。后来，他又找来一个中号锯盘（直径 800 mm），教我整平。他指着锯盘上一些鼓起来的部位说道：由于锯盘开木料时转速很高，虽有冷却水淋冲，但中心部分还会因过热而变形，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面就会鼓起来，导致夹锯。这时就必须停下来，卸下锯盘将其整平。否则，继续开料时推进阻力太大，人的体力消耗就太大了，而且锯缝也变宽，出材率降低浪费太大。接着他边敲打锯盘边说：整平很简单，就是那儿凹敲那儿。而不是那儿敲那儿。边敲打边观察，直到敲平为止。整平的快慢，决定于你敲打的力度和准度。一是，开始时要敲击凹部的中心处，而后逐渐外移，力度逐渐减轻；二是，先整平内圈的凹处，逐次整平外圈的凹处，直至全部找平。我边看边听边琢磨其中的道理，看着他那轻重不同、位置不同但频率几乎不变的敲击，我觉得掌握起来有相当难度，远比修磨要难许多，得反复练才行。但琢磨后，我觉得道理却很简单，我认为就是利用敲打调整金属材料的内应力（即冷作硬化），达到让内应力平衡的目的。一旦内应力平衡了，锯盘也就处于平整状态了。想到此，我突然有所感悟地问道：那您调好的锯盘放一段时间后，岂不又会变得不平了。那到用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再整平呢？对于我的问题王师父明显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说：你的悟性确实很高。一般锯盘调平后下一个班就需要用，否则就会又不平了，但不平度比调整前要小得多，再用时只需作些小的调整即可。所以一般长期不用时不用急着整平。说毕，王师父让我接过他刚整过的锯盘说道：你看看哪儿还需要继续整整，试试吧。我仔细观察了很久后，对王师傅说道：我觉得还有这几个地方（边说我边指着该整平的部位）需要进一步整整。王师父听后说道：差不多，你自己试试看吧，记住开始时力度不要太大，别想一下子就矫正过来。整平是个慢活，你整平的越快，它回弹得也越快。王师父说完后，我就拿起小锤按师傅教的方法开始了我学徒整平锯盘的生涯，师傅看了一会，点

点头说，不错，你很快就能出师，好好干。这下电锯班的锯盘就不愁了。并又嘱咐了一句注意安全后，就去忙他的事了！

当时因急于盖房解决干校学员的住房问题，所以对木料（木板和方木）的需求量很大，只要大的圆木一运到干校，就被立即送到电锯组，等着开料了。电锯组主要是地化教研室的老师和实验员，我记得的有：阮天健、沈庸立、余××等，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即使这样，面对直径50—60 cm的圆木，开锯时也是非常吃力的，李师傅说这是非常重的重体力劳动。确实一根圆木开下来，他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但没有一个人在抱怨，都把尽快建成干校当作自己的职责，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出来知识分子。为了减少开料时阻力，我向阮天健建议道：只要感到开锯时阻力变大了，就立马停下来换锯盘，我整平锯盘的劳动量远比你们开木料要小很多，而且，这对延长锯盘的寿命，增加出材率都有好处。他（电锯组的组长）接受了我的建议，下班时还在班务会上表扬了我。我并不在意他的表扬，但从中然我感到他的为人是正派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逐渐掌握了修磨、整平的技术后，我对电锯组的工作程式和要求就比较清楚了，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主动性，而非刚开始时的穷于应付。这样，不仅可以比较从容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还有时间帮电锯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当时主要是让我另外开了一台小的电锯台（直径400 mm），帮助做些开小板条的工作，以供应木工队建房的需要。此前小板条一般也由大电锯来开，既浪费又影响大板料和方木的供应。让我开小电锯也是电锯组的同志们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当时我半休已经结束）而采取的措施，因为开大木料的体力消耗对我来说可能还一时难于胜任，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

第五节 军宣队的打击报复

四月下旬的一天，在全干校大会上炫耀自己是侦查员出身的军宣队蒋喜亭的副手（姓名记不得了）突然来到电锯组东看看西看看，并说道你们得加紧干才行，料供不上，现在已经影响基建那边的工作了。

因大锯正在开圆木，忙得不行，谁都没有理他。可能对如此怠慢他有些不满，就放大声音地说道：跟你们说话要注意听，光低头干活不行，要注意政治，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确保基建的进度，但你们的工作却没有做好，料供不上，影响了进度。这时，我看出他确实因众人没有一个理他的而有点生气了，但阮天健他们的大圆木这时刚开到一半左右，确实不便停下来，去听他那不了解情况的“瞎唠叨”。出于怕他因不懂开大料时不便中间停车的特殊性而更加生气，于是我停下了自己的小电锯，走到他身边说道：×副指挥，大木料开到一半左右时，是不便停下来的。而且，开大圆木比较危险，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所以阮组长也不便答话。要不，等这根料开完后您再来跟大伙儿聊聊？

没想到副指挥长抓住“聊聊”两字发火道：什么“聊聊”，我是让你们在接受再教育的劳动中，要注意政治。从你刚才的话中，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政治，脑瓜里想的只有生产上的危险性，要高度集中这一套。

副指挥的无端指责也激起了大伙儿的不满，阮天健老师这时也将大圆木向后撤回十多厘米，大喊了一声拉闸停车！他抹了一把满脸带水的锯末，掸了掸前胸防水的围帘，走向副指挥长说道：您有什么指示请说吧，并招呼大伙到工棚外堆放圆木处“听训”。这位号称有一双侦查员眼睛的副指挥，似乎没有看出大伙的怒气和不满，倒反以为自己一发火，就让大伙变服帖了而自得。在他也走到木料垛边时，又开始了要注意政治，确保基建组的用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等训话。当说道，由于你们供料不及时，基建组建房的速度已经受到了影响时，地化实验室余××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来反驳道：副指挥长，房建进度受阻与我们无关。圆木是今天才运到的，料一卸下来，我们就马上开锯了，一点时间都没敢耽误。木料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这才导致大板材和方木断档，使房顶施工停了下来。尽管小余打断了副指挥的训话让他有些不悦，但他讲的是事实，副指挥也只能自吞苦果，既不好辩解，更不能发火申斥。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面子，还是喃喃地说道：我讲要注意政治是大的原则。你们不要纠缠于具体问题而忽视大原则，要领会精神实质。这次的教训也值得注意，生产环节的顺畅关系，特别是运输环节，今后更要周密考虑。很明显，运输方

面的问题和电锯组的工作根本沾不上边，他只不过想以此为自己的瞎指挥所造成的尴尬圆场罢了。

军宣队进院后，我与这位副指挥长碰面交谈还是首次，他那种以改造他人为己任不可一世的救世主做派，真令人恶心。尽管短暂的交谈，他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好的印象。但反过来看，估计他对我非但不会有的好印象，相反，自反干扰以来积累起来的问题，很可能在他心里已经有了要拔除这根“眼中钉、肉中刺”的决定了。

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事过没几天，在4月27日晚，五连的领导到宿舍通知我说，自明日起，去采石组上班。当我问到是否我应先去电锯组打个招呼，将那边的工作做一个交代呢？连领导说，不用了，军宣队会和他们打招呼的。简单生硬的几句话，让我明白了这是军宣队的决定，没有任何理由，完全是政治上的迫害行为。即使如此，我心想自己也没啥好怕的，今后言谈上多注意些就是了。如果那天我不主动去向他说什么，估计他也不会立马儿就找我的茬，还是自己总觉得是个主人，而没有将自己定位为改造对象所惹得祸。

总之，在大讲阶级斗争的那个年代，不懂得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已经被执政者所圈定，盲目相信那些“重在表现”的骗人套话，再努力改造、表现，也不可能变成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至多也就是一个驯服工具让干嘛就干嘛而已。即使有个别出身不好的人被吸收入了党，也只不过是政治上或统战上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例证，让众多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信服党所提出的那套政策是真心的而已。

第二天一早（4月28日）我就随五连采石班上山去了。为避免日照对人体的伤害，采石班均早出晚归，故原想走前与电锯组打个招呼的想法也未能实现。但傍晚回到干校后，就听人说起电锯组今天和军宣队的头儿干起来了。起初我没太在意，后来听说是为我被调走的事而争起来的，所以我就比较注意地打听了一下。原来当电锯组的人知道我被调往采石班后，阮天健老师等就找到王师父反映，并一起去找军宣队询问原因。因话不投机大伙儿就与副指挥争起来了。副指挥一再强调，大家到干校来主要是接受再教育，而不是搞技

术。让宋去采石班，也是为了五连能更好地监督他的缘故。你们需要一个懂机械的，可以再派一个人去，不要觉得没有他电锯组就不行了。王师父看出军宣队的决定已不可更改，再争也无意义。就说了一句：您别以为培养一个技工那么容易，我也不想再费这个劲带别人了，既然已经定了那就算了。说毕就和大伙儿一起回到电锯车间，双方的争执也就不了了知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嘛。

听到大伙儿为了能留住我而与军宣队的头头争论，心中还是暖融融的。我在电锯组前后近三个月，此间彼此关系融洽，相互关心，也让我有机会结识地质系的一些老师和木工王师父。三个月的经历说明，大家接受了我，也肯定了我。同时也预示了，今后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只要自己认真去学，踏实去干，就一定能被别人认可，并被社会接受的。只要坚持这样做，就必定是会有前途的。■

【述 往】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摘选）

——1967年北大再次大乱（五）

王复兴

20、外出串联，登泰山，临曲阜

8月上旬，我和马西沙及两个“井冈山”的朋友“搭伴”，4人外出串联，实为遊山玩水。先去泰山，登上“南天门”，到达峰顶，心旷神怡，极目鲁天舒。在山顶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观日出，而后下山。第二站去了曲阜。进了孔庙，惨不忍睹，墓碑、华表、石龟等雕塑已被北师大“井冈山”当地造反派砸的七零八落。北师大谭厚兰在戚本禹、林杰授意下，于1966年11月，带领北师大“井冈山”200多人，来曲阜造反，与当地造反派一起把孔庙、孔墓；孔府、孔林都砸了，破坏严重。我们看到孔庙被砸成这个样子，已无心情去孔府、孔林。离开曲阜，我一个人先行回了北大。马西沙三人南下去了江南遊览。我此次出遊，仅用了七、八天。8月中，我一回到北大38楼，就听王渊涛对我讲，全国反军浪潮很猛烈。8月9日“井冈山”在38楼前集会，牛辉林有个反军演说，说全国各地造反派正和军内走资派做殊死搏斗，“新北大公社”是“老保”，支持各地保守派。王渊涛说“公社”现在很被动。我们俩人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的想法是，坚决顶住，静观其变。

21、牛辉林的“8.9演讲”

王渊涛所指牛辉林的反军演说，发生在1967年8月9日，在北大38楼前“井冈山”集会，牛辉林做形势报告。他这个演说的背景，正是在武汉“7.20事件”及《红旗》发表“八一”社论之后，全国掀起“揪军一小撮走资派”的高潮。《红旗》的“八一”社论讲“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

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后来得知，这个社论是由林杰、关锋、王力起草、发表。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令。）

牛辉林在这个演说中，分析全国的形势，极力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重、尖锐，举了很多全国各地军队镇压群众和造反派冲击军区、军队的事例。号召“井冈山”再次开始新的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反军内走资派”。下面是他演说的摘要（据油印传单记录稿）：

“66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已经揭发。他们曾经决定将兵变转到67年2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制造者。”“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说：根据陈再道过去的表现，知道他会暴乱。”“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园开秘密会议，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全国大乱。”“从此可以看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军内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新北大公社在外面，支左还是支保？”“聂元梓公开支持‘保’字号组织，简直不能容忍。”“38军是坚决支左的。（暗示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聂反38军。）”“聂孙他们在校内外挑起武斗，企图在全市挑起更大规模武斗，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新北大公社是聂孙的御用工具。”说北大井冈山“已走了1300人，我们在各地基本上有人了。”

以上是“牛辉林8.9演说”的摘录，占他全篇演说的五分之一的内容。那时就真有脑袋这么发热的。他在报告里，小道消息猛忽悠。他的这个“演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紧跟《红旗》社论，明确提出“军内一小撮”、“军内走资派”；点了三个老师的名字：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表示“井冈山”已有1300人到全国各地反军；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支持保守派；重提陈伯达“6.5”讲话，说聂“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三天之后，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8月12日，“井冈山”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又“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

牛辉林当时在北大，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历史已回答了这个问题。对于牛

辉林而言，这当然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是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上了《红旗》的当。

“新北大公社”没有参与各地的反军活动。当时有谣传说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反38军，牛辉林也造这种舆论。为此，聂元梓专门派了卢平和赵建文二人专程去保定拜访了38军军部，进行辟谣，与38军首长座谈极好。¹此事最有力的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对聂元梓讲“你们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你们访问38军这事做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权威性的历史证据。聂元梓文革后提起此事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抛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历史观，探究历史的真相，聂元梓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

22、王、关、戚垮台

1967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盛夏，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外交代办处的事件，全国阶级斗争的温度也达到了顶点，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高涨，到处发生抢枪事件和大规模武斗，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为稳住军队，握牢军权，抛出了王力、关锋做替罪羊。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示“还我长城”。并指示杨成武回京转告周恩来关押、审查王力、关锋。对戚本禹暂时没动。

8月26日，周恩来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揭批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批判了王力的“8.7讲话”是企图打倒陈毅，在外交部夺权。会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8月27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冲派的对立面）抄了林杰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室。《红旗》杂志小车班的人把这消息告诉了北大，好消息马上在“新北大公社”内传开。

¹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273页，第十三章第10节。

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在出席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时，王力、关锋没有出席，大家明白王、关倒了。江青在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力、关锋。江青发言时，不同于以前，多次强调要批极左，反极左。江青说“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捣乱，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他们‘反总理’，‘到处揪军内一小撮’，‘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江青这些话是指谁？当时红卫兵的头头们都明白。

9月，北京两派斗争形势骤变，“学部红卫兵联队”、潘梓年、吴传启迅即跨台，吴传启逃跑，不久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周景芳（戚本禹安插在北京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及潘梓年、林聿时、洪涛、刘郢、王恩宇都被北京卫戍区收监。

那时北大校园内的气氛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个个兴高彩烈。我们原“66”的一帮人到海淀下了好几次“馆子”，聚餐，“改善”，喝啤酒，高兴。相反，“北大井冈山”的个个垂头丧气，不高兴。当时，聂元梓及“公社”总部三令五申，不许“公社”群众游行、欢呼、贴大标语庆祝。“学部总队”（学部反吴传启一派）到北大贴了大标语“新北大是坚定革命派！”“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据校友胡宗式回忆，1967年9月中旬时，他在校园遇见“井冈山”头头候汉青，候汉青对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胡宗式对此评道：“这才是北大人的科学态度和胸怀。”

1967年底，我在家里对哥哥王复东说，“王力、关锋倒了，下一个是戚本禹。”他吓了一跳，对家里人说，“复兴反中央文革的戚本禹。”为我担心。没过多久，1968年初，戚本禹也垮了，被抓捕、收监。

23、关于反左、反右之争

下面，是我对1967年1月至9月，北大两种思潮斗争的反思：

那时“新北大公社”的骨干成员与聂元梓、孙蓬一的观点一致，认为当时从上至下的

主要错误倾向是极左。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吴传启、林杰以及他们的后台（聂、孙已认定后台就是王、关、戚和谢富治）。北大“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受了极左思潮影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于避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毛泽东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而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则是当时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常态。“井冈山”的个别头头是无辜的革命群众，他们属于认识问题。）必须正视的是，从1967年1月至9月，在全国、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的进步因素，具有重大意义。

反左与反右，何谓左？何谓右？左与右是指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态度分野。对阶级斗争采取激进态度是左，采取保守态度的是右。当时无论反左或反右的两派群众都不可能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是政治正确。“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于1962年党的八届10中全会上，由中央全会确定的路线。文化大革命是贯彻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大实践，也是人为地推动阶级斗争到达极端的阶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都跳不出这个基本路线的框架，但仍有激进和保守的区别，有紧跟与抵制的区别。1967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当时这一派人虽还认识不到毛泽东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潮、极左人物的总后台，但已达到自觉反对极左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的高度。而当时中央的这些人正是文革中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客观上，新北大不自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新北大反极左的斗争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亮点，它脱离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宗旨，它的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它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政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它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是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乞今为止，人们受制于官方的定调及曾经的对聂元梓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判刑之制约，没有能还原这段历史的真相。

文革中清华的“414派”及“414”思潮也属于偏保守的倾向，但“414”主要是在学

校范围内主张解放、依靠大部分干部，并认为“打江山的不能做江山”，意即清华造反派（团派）不能在清华掌权“坐江山”。把“老四”这个观点深入推理下去，岂不是在中央的文革暴发户中央文革，也是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吗？难怪毛泽东对“414思潮”反感。“414”的核心成员曾公开贴出反陈伯达的大字报。清华“414”与新北大公社的倾向相近，当时都被视为偏右、保守。但不同点是，新北大派对极左的代表人物采取了进攻的态势，形成了群众运动，这是人民群众在文革不断觉醒的过程中，走的更早、更快、更向前的一个群体。

下面有一个事例，有力地证明了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是坚决反对极左路线的。1968年3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首都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列席，北大聂元梓、马云龙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上，林彪宣布毛主席决定打倒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江青在此次大会讲话中，说王、关、戚是形左实右，他们是被中央文革端出来的，有人想借王、关、戚倒台搞右倾翻案，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笔者认为：江青担心王、关、戚倒台后，如进一步反左，会反到她和中央文革的头上。）江青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会后，关于大会的内容，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向全校做了传达。

我于2015年4月，在北京向校友马云龙核实江青在“3.2大会”上讲的这句“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马云龙肯定地说，“我在笔记本上做的记录，回校也是我传达的，肯定有这句话。”校友索世晖、扬子浪也都记得这件事，肯定江青是这样讲的，马云龙传达的。

3月27日，中央文革在首都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林彪出席，公开打倒杨、余、傅，称杨、余、傅是“变色龙、小爬虫”。江青在大会讲话中，再次批评聂元梓“反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在这次10万人大会之前，3月2日军队干部大会之后，在两个会中间的3月8日凌晨，陈伯达、江青接见聂元梓，对她讲“你要反右，不要反左。”据“公社”动态组负责人胡

宗式对我讲，当时江青对聂讲得最重的话是：“你们为什么抓住王关戚的问题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刘少奇吗？”（王关戚当然和刘少奇扯不上。江显然是话里有话。）江青在那段时间，接二连三敲打聂，训斥她不可反左。对反左很紧张。我记得那时“新北大”写作组开会时，商讨写一篇系统批判王关戚极左路线的大字报，讨论时中文系曾镇南说：“我们批王关戚，江青肯定不高兴。”曾镇南的直觉和判断很准确。戚本禹在其《回忆录》中说，1967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指示，宣布王力、关锋因反军乱军、“毁我长城”，进行“请假检讨”，实为“隔离审查”。戚本禹把王、关送到钓鱼台二号楼软禁后回到会场，这时周恩来已离开。戚本禹看到：“江青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哭得很伤心。”¹

而聂元梓却在那段时间，在北大俄文楼的一个小范围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口号，我们提我们的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

在杨余傅倒台之前的1968年初冬季，我也曾直接卷入左右之争。在一次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时，江青发言时强调“王关戚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其实质是极右。”当时在场的中央文革成员及谢富治、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叶群、温玉成等大员，非常奇怪地一个一个强烈表态：轮流发言，表示同意江青讲话，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捍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等等。北大传达了这次会见及江青讲话后，我连夜组织“新北大”写作组写了一篇大字报《反左防右》，题目是我定的，中心思想是：极左是主要危险，目前主要任务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肃清王关戚的影响。但同时要防右，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反扑。这张大字报是与江青讲话“拧着”、“顶着”，坚持反极左，但提出“防右”是为了不明显地违抗江青讲话，对其讲话做出自己的“解释”。大字报贴出后，“公社”有人贴出《王关戚是形左实右》的大字报相呼应。“井冈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新北大”曲解江青讲话，当前应反极右。当时出现了许多两派关于反

¹ 《戚本禹回忆录》664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

左反右的大字报，形成了一场左右之争的论战。过了一、二天，李文告诉我，聂元梓对他讲，“新北大”的大字报写的不错，“这批人挺有头脑。”表示赞赏。文革中反极左还是反极右之争，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级上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

1973年春，我在河北安国县中学高中任教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展大批判，我写批判林彪的文章就是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批判林彪对党政干部打倒一大片的罪行。我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国家真是折腾的够呛了。自己从北大毕业，被贬到农村教中学来了。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观上认为，文革已到后期，应借批林，肃清极左路线影响，尽快实现安定团结，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结束文革。当时思想上还认识不到应否定文革，也认识不到毛泽东是极左路线的总代表，但对批极左路线十分执著。没料到的是，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毛泽东批评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批判他批林要批极左是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让周恩来管《人民日报》。1972年8月1日，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批林要批极左路线，但遭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对。王若水坚持按周恩来的指示批极左，在10月14日《人民日报》上用整版发了三篇文章，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结果遭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严厉批评。王若水不服，于12月5日上书毛泽东，提出《人民日报》批林整风应批极左，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姚不同意批极左的问题。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右的不能再右了。”随后，王若水在《人民日报》遭到批判，被撤职，发配到大兴红星公社劳改。在此次王若水批极左的事件中，毛泽东在反左反右之争中，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名为批王若水，实为批周恩来。当时我明白了一件事：反对批极左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引起了思索。

综上所述，今天看来，反左反右之争始终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而且从中央到基层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激烈斗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开展极端的阶级斗争这样一条极左路线。反之，从中央到地方也始终存在着对其进行抵制的力量，

存在着批判极左思潮的进步潮流。

文革中的反左反右之争，直到毛泽东去世，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有了基本结论。据郭道晖著《四千老干部民主评议党史》记载：1980年10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之后，曾召开4000多名高级干部进行大讨论，征求意见。实际参加此次大会的有5600多人。这次会议比较民主，与会者大多是劫后余生的老干部，他们体验深刻，畅所欲言。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大多数干部的主流意见是：毛泽东自1949年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制订并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许多参与讨论者，反对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分开论述；反对说文革前17年没有错误路线；反对把毛泽东与“四人帮”区别开来。强调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代表。但大部分高干（包括陆定一）的正确意见，却不被邓小平、陈云接受。邓小平10月25日对“决议”起草组的负责人胡乔木、邓立群讲：“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重大错误。”多数人的正确意见未能写入“决议”。但主流共识存在，它是大多数人的认识。邓、陈为维护党的形象，维护毛泽东遗留的党国体制，并掩盖自己在十七年协助毛泽东制订、推行极左路线的“助纣为虐”的错误，否定了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但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制订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而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4000人大会及对解放思想起了极大推动作用的“理论务虚会”后期，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则，是以阶级社会、阶级斗争为前提的，要坚持以中共的专政手段解决阶级矛盾。于是，邓小平搞了一个折衷主义，提出两个基本点：一个“改革开放”，一个“四项基本原则”，二者平行，为“改革开放”留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尾巴，并为坚持一党专政提供了依据。邓小平管那叫“两手硬”。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每隔几年便会出现一次左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罢免对改革开放有重大贡献的两任总书

记胡耀邦、赵紫阳，直至“六四”镇压开枪，镇压法轮功，这都是在“四个坚持”旗号下进行的极左干扰和罪错。

以上论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反左反右之争。在这个大历史的背景下，回过头来审视 1967 年在北京、在北大，左、右两种思潮的斗争，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的斗争，其历史意义应是很明晰的，无容质疑的。觉醒有个过程，反极左无疑是向着完全觉醒的方向前进。反极左是个正确方向。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并不自觉，主观上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聂、孙及“公社”在当时（1967 年）并不是政治完全正确，无论是北大的“公社”还是“井冈山”，无论是北京的天派还是地派，当时在“拥毛”、拥护文化大革命，反对刘邓路线这个最大政治问题上是一致的，都是政治不正确。两派都拥护文革，都被毛泽东所利用。

24、骑车去北戴河

1967 年 9 月中，王、关倒台后，我高兴且轻松，想累累身体，放松一下精神，出去玩玩。我和马西沙、陈双基决定骑车远征北戴河，拥抱大自然，到大海里游泳。于是每人带上水、地图，骑着自行车，向东北方向急驶而去。北京到北戴河有 400 多公里。一路上芳草萋萋、鸟语花香、树影婆娑。我们或走公路，或穿小路，日行 12 小时。晚上借着月光狂奔，两侧树影呼呼向后退去，幸亏没撞上大树，否则非伤既残。中途在小旅店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傍晚到达北戴河大海边。一路上口干舌燥，吃不下饭，净吃西瓜和桃了。到了海边，松了口气，看到涛涛大海，那个畅快！改善伙食吧，每人来了一份三鲜饺子，美味之极，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食？到那里住？旅馆太贵。三人一合计，走吧，去秦皇岛，

找个澡堂子准便宜。一打听，要走20多公里，小菜一碟。于是沿着海堤马路，一个多小时抵达，找到个澡堂子，安营扎寨。一躺下来，全身散架，昏然入睡。第二天吃过早餐，骑回北戴河。找到一个海滨浴场，沙滩开阔，白砂细软，没个人影。于是三人来了个天体浴，冲入大海，随波畅游，上岸后大字形仰天躺下，享受日光。傍晚返回秦皇岛。如此三日。第4天起个大早，踏上返程。我一马当先，劈风前进，二人紧跟。走了很多山间小路，天黑来到源河大桥。到了大桥，三人傻眼，大桥入口，铁门紧闭，入夜封桥，卫兵把守。怎么办？回头吧，荒山野岭，天色已暗，筋疲力尽。莫非要在野地里睡一宿等天亮？情急之下，紧急相商，计上心来。“卫兵同志，我们是北大的红卫兵，中央文革有紧急任务给我们，要赶夜路，请放行。”卫兵不敢做主，电话报告县委书记。县委书记急急赶来，一听，立马下令“马上打开铁门放行！瞧瞧人家红卫兵的革命精神，你们要好好向红卫兵学习啊。”于是过了桥，顶着月光骑了十几里。找到一个大车店，有股刺鼻子的马粪味。顾不得了，凑合吧。过了一夜，第二天上路，曾错走了一段废路，只好折回，找对道路再走。下午骑到通县，都骑不动了，两腿如同灌了铅，沉重之极，只好推车步行。看到个卖大碗茶的，还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凑钱，三人一摸口袋，总共凑了三分钱。卖茶的说一分钱一碗，你们有三分，只能喝三碗。于是每人大口灌下一碗。再推车前行。正好后面来了辆军用卡车，忙举手拦下，我说“解放军同志，他病了（指指马西沙），骑不了车，劳驾，能搭个顺风车吗？”“去那儿？”“天安门。”“顺路，上车吧。”我们赶紧把自行车搬上了卡车，很快到了天安门。下了车，再三谢过司机，各自回家。这趟自行车远征，真够累的，可挺痛快。

25、厌倦派性斗争，力争两派联合

1967年10月至12月期间，“公社”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的一批人，对北大无休止的派斗，越来越厌倦，觉得这样下去，看不到运动的前途和出路。在10、11、12这三

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群众组织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宣传大联合、三结合、解放干部、制止武斗，进行斗、批、改。负责文攻任务的“作战部”成员很注意学习中央党报、党刊的这些指导性的文章，经常讨论，寻找运动的出路。头脑日益清醒并主张停止派斗，实现大联合。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编辑部社论”，号召学习、执行“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社论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当时我们反复讨论，觉得毛主席的指示非常符合北大的实际。北大两派师生，那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本来都同在北大生活、学习，又共同响应中央号召投入运动，现在仅仅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就相互把对方视为“敌对阶级”。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仇视；本应平等相处，却要压倒对方；本应相互合作，却要残酷斗争。这本来是很明白的道理，但两派群众的大脑都被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观念搞乱了。“66”早在6月11日“起风雷”的大字报中就曾批评孙蓬一“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来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表现出“‘左’的可爱”，进而“打击不同意见。”其实“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打击不同意见”，两派同样存在，但人家的缺点错误应由人家自己讲。“66”核心成员到了10月更坚定了“反对夸大阶级斗争严重性”的立场和认识，但受历史条件局限，还认识不到应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

10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指出，要实现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要告诉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作战部”认真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识到要实现与“井冈山”的联合，有两个关

键问题，第一是必须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在当时“公社”内部很难被大多数人接受。即使“井冈山”的个别头头跟着王、关、戚跑了，那也是“受蒙蔽”，“不能压”，一“压”就没法联合。第二是必须多做自我批评，批评本派的缺点、错误。这是促进联合，双方走到一起的唯一途径。一味指责对方，还是“打内战”，八百年也坐不到一块儿。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逐渐把批评的重点指向了校文革打“内战”的强硬派孙蓬一。以至于到了68年初，我们被“公社”内部许多人指责为“策略派”、“机派”。所谓“策略派”是指一味讲究“策略”，缺乏斗争性。这是好听的说法。难听的说法是所谓的“机派”，“机”是指“右倾机会主义”的“机”字。指责我们放弃了对“井冈山”的路线斗争，“右倾”。但我们认为正如毛主席所说“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不仅是“可能”，而是孙派正在犯错误。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极左思潮，夸大阶级斗争，以极左态度对待对立面群众。记得当时索世晖告诉我，他们中文系的庄明泉对他讲，“孙蓬一他们说你们是‘机派’，你们应该说他们才是‘机派’，他们阻挡大联合，是左倾机会主义。”我们这一派在当时“公社”内部是少数派，这一派有：“作战部”的几个人索世晖、王复兴、陈双基、扬子浪、任瑚琏、张绍清、马西沙。有原“66”的一些骨干：刘庆柱、王渊涛、俞政、黄虹坚、曾镇南、庄明泉、金崇顺、王兰亭、王冠英、黄诗云、陈建民、徐森、张文虎、杨桂香、钱凤娟、吴丽珍、孟关霖、程仁双等人。在公社总部有：李文、阎志胜、李长啸、沈永友。还有驻首都红代会的代表马云龙。“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孙月才，虽然是由“联战”推举进入总部，但他比较倾向李文。李文是我们这一派的代表。在聂元梓周围她比较依重的人中有几名教师：宋一秀、魏杞文、赵建文等，与我们一致。“公社”内部两派斗争发展到68年，我们与孙蓬一的矛盾甚至超过了与“井冈山”的矛盾。但始终处于“斗而不破”的局面，始终控制在内部不同意见争论和思想斗争的范围内。

关于“公社”内部的这种派系分野和思想斗争，“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孙月才在他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这部书中，第260页的第81条注释关于“李文”的条目中，有清楚的记载。此条目写道：“李文，生物系学生，干部子弟。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他以‘策

略派’著称，和孫蓬一观点相左。其人好思，对文革较早取批判态度。198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社居然还派人来上海社会科学院找我调查李文在文革中的活动情况。。”孫月才在回复《人民日报》的材料的“附言”中写道：“当李文对文革已有所觉醒时，你们《人民日报》还尽在放屁，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有像样的检查吗？”

当时，“新北大”写作组曾由曾镇南起草了一篇长篇大字报，批判本派的派性，论述实现大联合的必要性，主张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文中批评了本派在大联合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当时“公社”内的大多数还接受不了这些意见，犹豫再三，因担心引起内部激辩，造成分裂，便没有贴出此字报。可见两派联合阻力之大。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聂元梓、孫蓬一有分歧。聂元梓主张承认对方是“革命群众组织”，反对“压服”，反对武斗，主张大联合。孫蓬一则坚决反对聂的意见，主张“摧毁”“井冈山”，认为与“井冈山”的斗争是路线斗争，说“路线斗争是不能调合的”，搞大联合是“右倾”。聂元梓在一次“公社”战斗队队长联席会议上，提出“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两派大联合’的主张。结果遭到绝大多数战斗队的否定和“炮轰”。当时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井冈山”的一些人流传“公社”分裂为“聂派”和“孫派”。但我们这批人从未承认自己是“聂派”，只承认在内部，更多地支持聂元梓。由于聂比较摇摆，她在“井冈山”的攻击、谩骂及“公社”孫派内部指责的双重压力下，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反对派性，促进大联合的主张，后来甚至卷入了两派武斗。聂元梓被派性所绑架，始终没能以无比的勇气和智慧挣脱出来，那么她做为处于主导地位的校文革（权力机构）主任，便只能在文革后期吞下苦果，承担打派仗、搞武斗的重大责任。

到了12月，“井冈山”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有条件地“承认校文革”，实现两派联合。他们有个“天安门论坛”的组织就持这种主张，我和杨子浪曾多次与他们接触、谈判，并于12月25日与他们达成联合举办两派的学习班，商讨两派怎样实现大联合。双方签署了协议书，“井冈山”方面承认“校文革”为权力机构，“公社”方面承认“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当时“天安门论坛”的人告诉我们，陈醒迈（“井冈山”总部成员）下次

将参加联合学习班的活动。我和扬子浪也表示会参加。随后，“井冈山”广播站广播了杨克明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支持联合学习班，表示承认校文革的领导，但要求“改组校文革”。（他们“改组校文革”的要求，我们并不认为不合理。）到了12月28日，风云突变，“天安门论坛”突然撕毁了协议，举办联合学习班之事，功败垂成。12月30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井冈山”强硬派突然绑架了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崔雄崑（新成立的中共北大领导小组付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原北大教务长），校文革立即举行了抗议大会。两派对立情绪突然升温。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的希望破灭。看来“井冈山”方面的“大联合派”也是少数派，且压力极大，他们卡在“井冈山”大部分人不同意承认“校文革”是权力机构。“井冈山”总部被强硬派所操控，他们绑架崔雄崑，是有意破坏两派鸽派的大联合努力，把两派斗争推向激化，推向武斗。

当时历史系的两派教师曾相互接触，商讨历史系教师大联合的事。魏杞文找了“井冈山”教师头头李源，说“学校上面两派不联合，咱们历史系先联合”李源赞同，并到魏的家里商量。但在学校两派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这种小范围的大联合无法推进下去。

两派大多数人互不承认。不承认对方，怎么联合？这便是当时的局面。由此可见当年派性泛滥之严重程度。所谓派性泛滥，实质是阶级斗争观念的极度泛滥，两派的大多数群众都以宗派为依托，把对方视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即孙蓬一所说的“路线斗争不能调合。”两派都想压倒对方，使自己在运动后期能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当时没有私有产权，人们的利益述求主要体现在本人的政治地位。对政治地位的追逐就是对利益的追求。即列宁所谓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派别斗争十分激烈，派性十分顽固。至于在全国泛滥的派性斗争，其所暴露出来的民间所蕴藏的强烈宗派性，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这应与我们民族深远的文化与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有关。此问题笔者将在其他章节阐述。

北大的两派斗争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都陷入了派别斗争，武斗升级，运动严重失控。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这证明文革并非始终如一的“毛泽东的文革”，毛不是神，他没料到全国会出现如此大混乱的局面。他在9月

16日视察杭州时说，“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他想不通了，蹦出这么一句大白话，他是真的想不通了，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的全国各地两派斗争，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反省、市委，还是保省、市委。而到了1967年下半年，两派之前都曾共同批省、市委的资反路线，而现在却因为结合不同的干部，或者是斗争策略的分歧，或是争座次，互不服气，争论谁更革命等原因，便重新分裂成两派。而军队却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冲突激化，武斗升级。群众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泛滥成灾。这时的两派斗争虽没什么大原则方面的分歧，都反对刘邓路线，都拥护毛泽东的司令部，却比66年的派斗激烈的多得多。扬子浪在1967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很多偏激的东西，对立面的两派有时各执一词，闹的不可开交。”扬子浪的这段“日记”，记述了当时的普遍情景。群众运动并非天然正确，人民群众也会犯错误，那段时间的人民的文革是个错误潮流，无政府主义泛滥，一片混乱，对社会具有巨大破坏性。同时在那时间，群众运动也离开了毛泽东的旨意，离开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毛泽东不是神，运动失控了，他穷于应付。毛泽东1967年夏、秋一再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结束。”“接着召开‘九大’。”但事与愿违，他想结束却结束不了。群众运动脱离了他的轨道，不按他的意志行进。毛泽东的历史观是“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他在文革之初，把“阶级斗争”从“潘多拉”魔盒中放了出来，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运动严重失控，尔后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了全国军管及工军宣队进驻高校的手段，才控制了局势。军管及工军宣队比之刘邓的工作组，对群众的控制厉害得多。毛泽东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也不是不要工作队领导运动，只不过是要看那个司令部的党领导，那个司令部的工作队。“九大”的召开，比毛泽东予计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年。“九大”结束后，毛泽东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路线斗争，文革仍无法结束。■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